

Elisa和Marcela
朋友和恋人“。

DeepL翻译

"引言

1993年的一个下午，准确地说，是5月9日，如果我的电脑没有混淆的话，我正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历史档案馆研究加利西亚教师职业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所遭受的纪律程序。突然，出现了一个文件，其中包含一份《加利西亚之声》的副本，对应于1901年6月22日，其中可以看到以下标题。

噪声假设

没有男人的婚姻

我读了这篇纪事，感到很惊讶。这件事在当时确实很“吵”。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婚姻，尽管记者选择了负面的标题，即强调没有一个男人。两人都是教师，其中一个，即积极的那个，已经被解雇了。这个故事并不符合这些纪律程序的通常类型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完全或部分放弃教学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是真实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不那么真实。也经常有道德性质的指控，特别是交际，这很普遍，尤其是在教师中。但是他们都没有记录到像《加利西亚之声》所报道的内容。

"我很感兴趣，决定追随伊莉莎和马塞拉的脚步，因为活动的主角被称为伊莉莎和马塞拉。大约两个月后，1993年7月16日，我去了Dumbría，他们在事件发生时住在那里。我接触的第一个人是两个小老太太，她们在教堂的中庭等待牧师，因为今天是卡门日，她们必须去做弥撒。我问他们是否听说过Doña Marcela和Doña Elisa，他们说没有。但他们一定认识一个老师....。但他们一定认识一位老师.....。是的，一个叫伊诺森西亚的女士，她已经在村里呆了很多年了。在伊诺森西亚女士之前，他们不记得有其他人？其中一个人，现在想起来了，想起了什么。根据她从公公那里听到的消息，以前有两个人住在一起，最后在阿科鲁尼亚结婚，其中一个人扮演的是男人，"因为他们不给未婚教师上学"。当他们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回到邓布里亚时，这个骗局被发现了，所以他们被迫"匆匆"离开村庄。

"在其他几次尝试之后，我感觉到口述来源不会有很大成效。人们记得很少，尽管有一个人似乎能够提供相关信息，特别是关于婚姻的动机，但她不太愿意谈，因为有传言说她的一个亲戚参与了这一事件。有必要求助于书面资料，这些资料更容易被遗忘，也更不容易被审讯。媒体对这个故事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我查看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

在档案馆里，我还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文件，尽管我的一些研究被证明没有结果。教会当局对在阿科鲁尼亚举行的婚礼进行的调查，以及两位教师在波尔图受到的审判，还有伊莉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次婚姻引起的法律诉讼，都没有找到“。

„前三章，在该书的前一版本中构成了第一部分，是用这些材料写成的。他们讲述了Elisa和Marcela的故事在其展开的连续场景中的情况，重建了学术和司法当局的行动，并分析了事件的公众反响。“

"调查本可以到此为止，但本作者仍然认为，历史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应该设法解释这些事实，或者至少是理解这些事实。在本案中，这是一个理解独特婚姻的存在理由和意义的问题。而且我们不得不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这样做，因为我们几乎没有来自两位主人公的直接证词。

他们留给我们的唯一明确的线索，可能是假的，就是雌雄同体，所以我们开始拉这个毛线球，却不太清楚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很快，我们来到了女同性恋，在被认为是一种性选择之前，它在解剖学中寻找锚点。紧随女同性恋之后的是异装癖，伊莉莎练习了大约三个月。最后，女权主义也可以提供一些解释的线索“。

"在我看来，雌雄同体是不在场证明，异装癖是伊莉莎用来证明她与马塞拉的爱情关系的工具，而女权主义的要求使之成为可行的。

这些不同的观点在该书第一版的第二部分得到了发展。在本版中，这些内容在前三章中以很小的剂量被稀释，在第四章和最后一章中被浓缩，标题为"朋友和情人" (Amigas y amantes)，主要讲述伊莉莎和马塞拉的故事，并为这个新的更新版本起了副标题。我以这种方式回应我的朋友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乌里亚向我提出的建议，最近我的同事海伦娜以及我的朋友爱德华多-冈萨雷斯-古里亚兰和哈维尔-卡斯特罗也重申了这一点。虽然我决不否认最初的方法，但我认识到，第

二部分的长度和离题对于那些对性爱历史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可能是过度的。注释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印刷版中的附录也被省去了，可以在莫拉塔网站上查阅“。

"可以看出，前三章和第四章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构建材料上也是如此。前三章基本以资料为基础，第一和第三章的新闻资料比比皆是，第二章是档案资料。在第四章中，也有资料来源，但书目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在本版中，可以省去的书目已被删除，几乎没有增加其他书目--对书目的修订使我得以进入我并不十分熟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试图巧妙地行动。

本书最后有一个后记，其中我讲述了自2008年以来传到我这里的关于马塞拉和伊丽莎的消息--对我来说，经过25年的关系，他们几乎就像家人一样。最令人喜爱的消息来自两位阿根廷女士。其中一位是马塞拉的曾孙女，另一位则向我们讲述了„艾莉莎阿姨“。

故事

"Elisa/Mario和Marcela在波尔图的Aljube酒店

如果你注意到我
我给你讲个故事
发生在拉科鲁尼亚的事件
并必须保留在记忆中。
(浪漫的 "没有男人的婚礼") 。

玛丽亚-伊莉莎-卡门-桑切斯-洛里加于1862年9月8日早晨7点在阿科鲁尼亚出生。她是曼努埃尔-桑切斯和玛丽亚-洛里加结婚后的合法女儿，两人都来自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是阿科鲁尼亚的邻居。第二天在圣豪尔赫教区教堂举行了洗礼，安东尼奥-博克特担任教父，玛丽亚-品担任教母。伊莉莎会在另外两个同样庄严的场合回到这座教堂，现在她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有机会看到"。

"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于1867年6月27日在布尔戈斯市的圣阿盖达教堂受洗。她是曼努埃尔-格拉西亚和马塞拉-伊贝斯的女儿，前一天进入临终关怀医院。她的教母是玛塔-圣玛丽亚 (Marta Santa María) ，她是本市人，也是安养院的居民，她被托付给圣约瑟夫和圣阿加莎。直到十年后，即1877年5月2日，她的父母在阿科鲁尼亚结婚，她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就我们所能重构的而言，两者的故事发生在三个阶段：在阿科鲁尼亚和邓布里亚之间，在葡萄牙城市波尔图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科鲁尼亚和杜姆布里亚之间

我们不知道艾丽莎和马塞拉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可能是在阿科鲁尼亚市的一所公立学校学习。不过，似乎马塞拉在卢戈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在蒙福尔特-德-莱莫斯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她的父亲在返回阿科鲁尼亚之前曾作为士兵驻扎在这两个城镇。

"最后，看到马塞拉佩戴着皮拉尔圣母像，葡萄牙《北方报》的一名记者问她是否在宗教学校接受过教育，她回答说她接受过，"就像西班牙几乎所有的妇女一样，她们在青春期被从母亲的亲情中撕开，去接受修士的教化。在她的案例中，这种感情的缺乏是更早的，因为她在被合法化之前的十年中被剥夺了感情，我们推测她一定是在安养院度过的。在这种死亡率极高的机构中，男孩和女孩仅仅为了生存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²我们不知道的是，她在临终关怀中心的日子（这无疑给她的个性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之后，她是否在宗教学校有过其他教育经历。

"无论如何，在上完小学后，埃莉萨和马塞拉决定进入阿科鲁尼亚师范学院--这是当时负责培训男女教师的中心的名称。教学研究有三种模式，称为初级、高级和普通，分别持续两年、三年和四年，尽管其

中最后一种模式是在1882年为妇女设立的，但只在马德里的Escuela Normal Central de Maestras教授。当时在加利西亚有三所女子师范学院，其中一所是迄今为止最繁忙的——在1884-1885学年，有205名学生入学——位于阿科鲁尼亚的玛丽亚-皮塔广场。该校于1845年作为师范学院开办，四年后关闭——与其他省份的师范学院一样——并于1865年作为女子学校重新开课”。

“进入师范学院是妇女学习的主要和几乎唯一的选择，因为直到20世纪，她们实际上被排除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之外。在整个西班牙，妇女占“1900-1901学年中学入学人数的0.13%，1919-1920学年占8.40%，这些数字在大学阶段分别减少到0.05%和1.60%。直到1910年，他们需要得到学校管理部门的特别授权才能进入这种学习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师范学院学习的唯一目的是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尽管其他许多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进入职业”。

„在进入教师行业时，妇女受益于父权制社会本身提供的论据。父权制社会理解她们的主要职能是抚养和教育孩子，甚至认为母亲是一种全职职业，至少对某些社会阶层来说是这样，无产阶级妇女被迫在工厂里给孩子喂奶。因此，教师职业被认为是归属于他们的自然教育功能的延伸。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信念，我不想剥夺读者对他的话：

„我们已经说过，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初级教育应被视为每个母亲的义务：与在童年的最初几年指导他们的生活一样，是一项严格的义务。前面我们引用了古典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观点。戈麦斯-奥卡尼亚从可敬的曼琼神父口中接过这个同样的想法，实际上这在教育学中是普遍的。[那么，如果每个母亲都能以养育子女的方式，亲自引导他们接受教育，就能达到完美的效果。但是有很多母亲没有能力或时间，也有很多孩子没有母亲。而对他们两人来说，在学校的时间都会更有收益，越是像母亲一样教导他们，甚至损害学术智慧。歌德说过——而且是多么深刻的真理——“我们只向我们所爱的人学习”；这句话告诉我

们母亲的全部教学价值，如果没有，则是教师的教学价值，比明智的、母性的4"。

„阿科鲁尼亚市在1887年有37251名居民，该市的学校包括师范学校、中学--在那里也教授商业研究--美术学校、各种学院和公立学校、几所公立和私立小学以及大量的幼儿园，这是照顾烟草厂工人的后代所必需的。如果我们看一下1900年的识字率分布，阿科鲁尼亚的小城市地区受到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在雷亚尔、奥尔莫斯和阿马里尼亚街道，67%的人口能够阅读和书写，而在奥佩鲁莱罗、圣罗克德福拉和内勒，这一数字下降到20%"。

"危险的友谊

在1877-1878和1878-1879学年，伊莉莎接受了小学教师的培训。在第一年，她通过了基督教教义和圣史、阅读理论和实践、写作理论和实践、西班牙语语法和算术等科目，在第二年，她通过了劳动、教学方法和地理与历史等科目。除了《写作理论与实践》和《教学方法》被评为"良好"外，她在所有课程中都获得了合格的分数。她还必须按要求完成学校的工作实习。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教学上，这都是一个极其有限的课程"。

"1879年9月，也就是他完成学位的同一年，他申请参加获得学位的考试，考试包括书面练习、口头练习和实践作业；在所有的考试中他都获得了合格的分数。他直到1888年10月才支付文凭费用，1889年1月16日才将文凭授予他"。

„另一方面，马塞拉选择成为一名高级教师，这意味着要进行三年的学习，她在1884至1887年间完成了学习。首先，她报名参加了基督教

教义（良好）、阅读练习（良好）、写作练习（良好）、西班牙语语法要素（良好）、算术要素（良好）、针织和缝纫（良好）、地理（良好）和应用于手工艺品的绘画和几何学概念（良好）。在第二年，他学习了神圣历史（良好）、阅读理论与实践（良好）、写作理论与实践（良好）、继续学习语法（良好）、继续学习算术（良好）、教育原理（合格）、西班牙历史（良好）和继续学习针线活（优秀）。在第三学期，他参加了基督教教义和神圣历史的扩展课程（良好）、表达性阅读（良好）、书法练习和文件写作（良好）、语法扩展（良好）、算术扩展（良好）、卫生和家政学（良好）、教育学扩展（良好）以及Primor和Adorno的劳动（优秀）。在这三门课程中，他都在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进行了实践工作”。

“由于1881年各省师范学院的重大改革，这一课程的范围大大超过了艾莉莎采取的课程。马塞拉的成绩似乎也很出色，从她获得的分数可以看出，她的工作能力突出，这构成了女性教育的核心科目，无论是在教师培训中心还是在小学。

1887年6月，她参加了获得高级教师称号的考试，并通过了所有三项考试。1890年3月，她缴纳了相应的费用，同年9月10日，她获得了毕业证书。

“我们的主人公在80年代中期相遇，当时伊丽莎大约23岁，马塞拉18岁。有一天，马塞拉回到家，热情地谈论着一个新朋友：“哦，妈妈！”-如果你能看到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好朋友就好了！我很高兴。我在学校认识了她。她是女校长的亲戚。她不学习，但她去那里工作。这位朋友被称为“女校长”。她不学习，但她去那里工作”。这位朋友的名字叫Elisa，她在完成学位后，在做教师之前，在师范学院工作，可能是做行政或服务工作⁵。她与该校校长华金娜-奥塔诺-埃米达

(Joaquina Otaño y Hermida) 的亲属关系可能为她获得这样一份工作提供了便利。

妇女之间的这种友谊通常被认为是无害的，有充分的培养空间。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马塞拉的父母很早就反对她与埃莉萨的关系“。

"不赞成的原因是他们之间建立的纽带的强度。在一起的需要是势在必行的。他们不能容忍缺勤，无论其时间有多短。有一天，当她的母亲生病并需要照顾时，马塞拉想去师范学校与她的朋友在一起。她被阻止了，伊莉莎在晚上出现在她家，要求她解释她的缺席。

为了结束这种状况，马塞拉的父母（她是唯一的孩子）决定将她送到马德里。听到这些计划后，在离开的前一天，马塞拉精神剧烈崩溃"，并写信给伊莉莎。伊莉莎很快就去了她朋友的家，但尽管她做出了努力--她甚至去找曼努埃尔-格拉西亚对质--她还是没能见到她"。

"职业生涯

当马塞拉从马德里回来时，她在那里呆了四个月，埃莉萨在科里斯坦科市库索（Couso）的不完全学校担任临时教师。她于1888年9月4日上任，并将于1889年12月31日被确认担任同一职务。⁶当她听说她的朋友回来时，她去了科里斯坦科市，他们俩在那里定居了几个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觉得他们的职业实践将为他们的关系提供一个比首都更有利的环境，因为在首都，马塞拉的父母是一个主要障碍。

„因此，马塞拉决定申请她的第一所学校，也就是位于科里斯坦科的特拉巴学校，离库索非常近；1890年2月13日至7月11日，她在那里担任临时教师。同年4月25日，她签署了一份申请书，参加提供学校的竞争，申请任何一所公布的学校，尽管她表示更喜欢她所经营的学校或库索和阿瓜拉达的学校。他被分配到卡洛（Vimianzo）的那个地方，他于1890年7月12日接手，1897年8月19日离开"。

"同样是在1890年4月25日，在一份几乎相同的请求中，他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一起写的，伊莉莎为她暂时经营的库索学校、阿瓜拉达学校或另一所广告中的学校提出申请。似乎最初她没有获得任何一项，但在11月4日，她被任命为卡斯特雷洛（Vimianzo）学校的代理教师，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

卡洛和卡斯特雷洛的学校，以及几乎所有不完整的学校，每年都有250比塞塔的捐赠款。他们的主人也有权得到一栋房子居住和学费，也就是说，那些不被认为是穷人的孩子必须为公共教育支付的费用，尽管收取这些费用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工资不多，但它提供了当时大多数妇女所缺乏的自主权。

"这种类型的学校几乎总是混合入学，因为隔离式学校教育--统治精英们大多赞成--会大大增加成本。因此，经济学比意识形态更加强大。起初，它们通常由教师管理，但在1888年，部长当局决定优先考虑女教师。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能够同时教育女孩和男孩，而教师则不同，他们缺乏教授"[女性]工作"的技能。但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拓宽妇女有限的职业视野。性别主义和女权主义齐头并进，使正面歧视合法化。这一规定在男教师中引起了很大的阻力，使女教师开办的不完全学校的比例从1885年的7%上升到1903年的41%。其中两位受益者是伊莉莎和马塞拉；前者得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正如我们所知，正是在1888年7"。

"虽然她在卡洛呆了七年，但在此期间，马塞拉通过竞争性考试（1891年、1892年和1897年）或通过考试（1893年、1895年和1896年）在其他学校尝试。他试图参加1893年的竞争性考试，但最终没有举行，这引起了政府的诉讼，因为他没有遵守法律手续就离开了他的专业岗位。省初等教育监察员Tomás Luciano y Carreira认为，该教师放弃学校一

个半月是有证据的，她违规使用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校长、当时负责加利西亚所有公共教学中心的Maximino Teijeiro授予她的两个许可证。“检查员还让校长知道，马塞拉自以为得到了他的保护，而其他被他以类似理由告发的教师也指责他在此案中的行为有失偏颇此案最终以对该教师的简单训斥而告终，该教师不得不为当地政府指定的替代她的人所提供的服务付费-尽管马塞拉曾提议由Elisa来替代，但她并没有负责学校的工作”。

"除了这一事件，这两名教师的专业、道德和政治行为在多个场合得到了当局的认可。当局曾多次这样做。1889年、1890年和1898年，在科里斯坦科（Coristanco），应Elisa的要求，以及1890年在阿科鲁尼亚（A Coruña），应Marcela的要求，情况就是如此。

在1897年的竞争中，马塞拉被授予库索（Coristanco）学校，这是伊莉莎临时工作的第一个学校。她的年薪是500比塞塔，是卡洛的两倍，这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有了重大进展“。

"马塞拉一直在库索，直到她搬到Dumbría，这个镇子有一所完整的女子学校，她于1899年5月19日接管了这个学校。这一变化很重要，因为以前的学校是不完整的学校，有混合入学，而这所学校是完整的，只为女孩准备。财政捐赠也大大增加，因为年薪达到了625比塞塔。这将是她作为教师的最后一次任务，至少是在加利西亚。

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塞拉的身边都有伊莉莎，她有时会代替她履行教学职责。例如，在1896年举行的竞争性考试中，情况就是如此。离职是在伊莉莎获得一个临时职位时实施的，尽管所查阅的记录没有显示她在1890年11月至1900年2月期间负责过任何学校。在后一个日期，她被任命为卡洛学校的教师--也就是马塞拉以前开办的学校--她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九个月”。

"当环境迫使他们分开时，他们尽一切努力去见对方。当马塞拉在邓布里亚，而伊莉莎在卡洛时，如果我们相信《加利西亚之声》的话，

她每天晚上都要走过分隔他们的11公里："为了在有人攻击她时保护自己，她总是带着一把出色的左轮手枪。据说，他通常使用一把刀或一把小匕首，他从不离身"。据《O Primeiro de Janeiro》报道，他们不是每晚都见面，而是每个周末都见面："埃莉莎每周六去看望马塞拉，只在周一离开"。

当艾莉莎不做教师时，她在她的同伴教书时照顾家务："他们一起生活在绝对的隐私中。他们没有佣人。是伊莉莎去河边洗衣服，从泉水里打水，做饭和照看房子"。

"两个未婚女教师的同居，原则上既不令人惊讶，也不令人怀疑，原因之一是这是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婚姻状况，1885年为55%，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农村妇女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适应性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来自城市和小资产阶级，就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两个人情况一样，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基本上是陌生的世界里寻求适应。有时，他们由一个亲戚--通常是他们的母亲--在一定时间内或长期陪同。马塞拉"由一位也是教师的朋友陪同，这样她就可以帮助她进行教学工作，并在她不得不缺席时代替她，同时也使这一职业更容易忍受，从而防止她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将学校交给非法的代课人员管理。

然而，在Dumbria逗留期间，他们卷入了几场争吵，使当地人思考和议论。我们不知道在他们以前居住的其他地方是否有这种冲突，所以我们必须怀疑这些冲突是否不是他们计划实施的计划的一部分"。

"有一天，几个人被尖叫声惊动了，他们来到教师的房子里，发现马塞拉仰面躺在一只靴子上，伊丽莎一手捏着她的脖子，一手挥舞着斧头。还有一次，当马塞拉宣布她打算搬到她母亲那里去住时，伊莉莎试图用鸦片酊自杀，所以不得不叫医生。一段时间后，她把一根绳子绑在横梁上，以达到鲁莽的目的。

其中一些争吵的动机是伊丽莎对马塞拉的追求者的嫉妒。据这些人说，至少有两名男子起诉了她，尽管没有什么成效。伊莉莎向其中一个人

提出决斗的挑战，但他拒绝了。这位自诩使用左轮手枪的老师并不缺乏张扬："我从来不会不带闹钟到处走，"有一天，她在维米安佐展示闹钟时说。由于她粗暴的性格和阳刚的外表，邻居们都称她为El Civil。

"伊丽莎完全支配了她的朋友；以至于有时她好像更害怕她而不是喜欢她，如果当时的新闻报道是可信的。她显然向她提出了"可怕的建议"，这更增加了她的恐惧。马塞拉本人不止一次地抱怨她的同伴的行为："Auszug a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根据Marcela的指示，医生Pomar先生与教区牧师Varela Rol ó n先生达成一致，写信给Marcela的母亲，描述了她女儿的情况，让她看到如果她继续与Elisa生活在一起，她的好名声会受到威胁。

Ibeas夫人遗憾地回答说，鉴于Elisa对她女儿的恶劣影响，她无法从她女儿那里得到什么。她或多或少地说："我这个主宰我丈夫的人，可以主宰一个团，马匹和所有的人，"对她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人说，马塞拉为了摆脱她，竟然从她的工资中每天拿出一个比塞塔给他--当时她的年薪是625美元--以摆脱她。这个提议被粗暴地拒绝了："忘恩负义!-他说："这就是我对你的期望吗？

"Elisa成为马里奥

1901年春天，冲突仍在继续。其中之一是对马塞拉杀死了一些狗的事实。他们又吵了起来，吵得很凶，有几个人不得不出面干预，以实现和平。这些争吵使艾丽莎有理由离开邓布里亚，搬到阿科鲁尼亚。她的意图是去哈瓦那，她在那里有亲戚，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适当的宣传"。

"马塞拉则宣布，她要嫁给伊莉莎的一个表弟，叫马里奥，他很快就要到西班牙了。她还预计，两人之间的相似性非常明显："我没有见过任何与伊丽莎更相似的东西。她有同样的身高，有同样的声音，有同样的举止，甚至有同样的脾气！简而言之，如果他们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会显得他们是同一个人"。

与此同时，埃利萨在阿科鲁尼亚开始了他的转变过程：他剪短了头发，穿上了男性化的衣服，留起了适度的胡子，抽起了烟，自称马里奥-桑切斯-洛里加，还不忘给他的未婚妻寄信，作为他未来的丈夫，她在邓布里亚全面介绍了这些情况，给邻居们读了最深情的片段“。

"要拿到证明他新身份的文件比较困难，但马里奥知道如何进行：最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也就是接受洗礼。考虑到这一点，他去了圣豪尔赫教堂，在那里向贝拉辛神父忏悔，贝拉辛神父是马塞拉住在城里时为他解除良知的耶稣会士。告解持续了很长时间，告解结束后，这位耶稣会士与教区牧师维克多-科蒂埃拉（Victor Cortiella）通话，让他知道马里奥的意图，并安排了一次面谈。

"在这次会面过程中，进入圣堂吸烟的马里奥向维克多-科尔蒂埃拉讲述了他的故事--"一个悲伤的故事"，他说。他于1869年9月8日早上8点在Calle de la Perillana出生。在查阅圣豪尔赫教区的受洗者登记簿时，登记簿上显示了伊莉莎-桑切斯-洛里加，奇怪的是，她与马里奥同年同月同日出生，虽然早了7年又1小时。她是他的妹妹⁸。另一方面，他没有接受洗礼。根据他出示的证明，他的父亲在1869年就去世了，在他出生之前，他的母亲不久就嫁给了一个住在城里的英国人，姓多德，是个新教徒，是个老师。八岁时，他被带到了英国，在那里，他一直在继父的兄弟在伦敦拥有的一家工厂工作“。

"当他回到加利西亚时，大约四年前，他的姐姐伊莉莎把他带到她和一个叫马塞拉的朋友共同居住的日子里，他爱上了这个朋友，他打算尽快与她结婚，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伊莉莎对这些关系感到不安，并

与她的朋友拉开了距离，她乘坐最近从阿科鲁尼亚港出发的阿方索十三号船前往哈瓦那。

据他的一位朋友告诉《北方报》的一位编辑说，科尔蒂亚拉听了他的话，先是好奇，然后是越来越感兴趣。他让他知道，这些事实必须由教会当局核实，而且只有在他获得圣地亚哥大主教的授权并学习了"El Noroeste „的教义之后，他才能接受洗礼。他让他知道，这些事实必须由教会当局核实，而且只有在他获得圣地亚哥大主教的授权并学习了慕道课程之后，他才能接受洗礼。

"是的，先生；我对教义一无所知，因为你明白，先生，在伦敦这样的首都，周围都是新教徒和无神论者，与天主教教义相悖，这一点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我最没有想到的是[要]记住有一个上帝。我希望启迪自己，我希望喝到天主教的泉源，我祖国的真正宗教，总之，我希望洗礼之水能洗去我可悲的存在。你认识伦敦吗？“

"教区牧师回答说是，马里奥在说了几句他的对话者听得懂的英语后，问他住在哪里。

-在皮卡迪利街。

-哦，是的，在意大利酒店附近。

-在同一家酒店。

-我知道，因为我和我继父的兄弟去过那里几次。

这个故事可能是可信的，至少在没有进行相关检查的情况下。相信这一点符合教区牧师的利益，因为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新教徒中的人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争取到天主教的。

„科尔蒂拉还特别关注新教在该市的传播。1895年，也就是六年前，他曾提醒圣地亚哥大主教区注意福音派在庞特韦德拉广场设立的小教

堂中的活动。参加他们礼拜的人数不多，因为在小教堂运作的二十六年里，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人，但令人担忧的是，其中有几个来自师范学校的学生，如果他们能设法办好一所学校，就能为传播福音教义作出贡献，蒙特阿尔托附近的一位教师已经是这样了，她以新教的圣歌结束她的课程9"。

„马里奥无疑意识到了这些担忧，所以他用最适合他的目的的论据来构建他的故事。在可以理解的传教愿望的鼓励下，科尔蒂亚拉开始办理洗礼的手续。在此之前，马里奥有必要学习教义，为此，他为他提供了一份《阿斯泰特》的副本。慕道者说，职业为教师的马塞拉会帮助他学习，几天后，据媒体报道，三天后，他再次拜访了教区牧师，牧师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进步感到惊讶"。

"大约在同一时间，马里奥拜访了他母亲的一个亲戚雅各布-洛里加，请她做他的教母。他去这位女士家抽烟，并为男人的这种"顽皮的恶习"推脱责任。他告诉她与教区牧师相同或相似的故事。尽管在亲戚中，"不乏有人注意到她与伊莉莎的相似之处，但他们最后都认为她如马里奥所说的那样，已经移民到了美国。洛里加夫人已经有大约15年没见过她了，可能是从她开始教书起。教父是教区圣职人员曼努埃尔-普拉多。

5月26日下午，举行了洗礼，其记录保存在圣若热教堂受洗者的第34册：“....."。

"在这次活动中，马里奥穿了一套深色的西装，几乎是黑色的，还有黄色的帆布鞋。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上面装饰着一条黑色的丝带，戴着一个他玩过的手镯，右手戴着三个戒指。"当需要用盐在他的胸前划十字时，他摘下领带，迅速解开衬衫的扣子，没有人会相信那是一个女人，"教区牧师后来宣称，不免有些钦佩。

接受洗礼后，他要求获得洗礼证书，并获得了该证书。但这份文件对他来说只有工具性价值：它是获得证明他与马塞拉结婚的证书的基础，而这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因此，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马里奥最初寻求马塞拉的母亲伊贝斯夫人的合作，或者至少是同谋。5月的一个下午，他去看望她，告诉她他要代表她的女儿和她说话。这位母亲后来告诉记者，她没有认出马里奥-伊莉莎，她只是在楼梯口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走吧。我不需要知道关于我女儿的任何事情。而马里奥退出了，但之前警告说：“你会知道你现在不想听到什么”。

“这种说法与邻居的说法不一致，据他们说，这两个女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伊贝斯夫人否认了这一点：“我只看到了一个人，我不想理会他”。在记者的坚持下，她还否认自己是通过声音认出伊莉莎的：“那个声音对你来说肯定是无懈可击的，正是因为它是如此令人不快.....”。

似乎很清楚，伊贝斯夫人把马里奥认作是伊莉莎，他们之间的交流足以知道她的女儿要嫁给他，也就是她。第二天，她拜访了她的邻居里卡达-富恩特斯（Ricarda Fuentes），沮丧地告诉她婚礼的消息，并流着泪。里卡达很惊讶这样的仪式会引起这么大的悲痛，悲伤的母亲不得不说明：“她要和她母亲的刽子手结婚”。

“她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场婚姻--就像她和她的丈夫在世时没有足够的力量结束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马塞拉的母亲选择了消失，让事情顺其自然。她离开房子时说，她要去圣地亚哥，在那里她将接受一个医疗手术，尽管有人声称她在她住在阿科鲁尼亚的圣罗克社区的朋友家寻求庇护。

“因此，当马塞拉-格拉西亚来到阿科鲁尼亚，打算结婚，去她母亲家时，门是关着的。她在那里找到了她，陪同她的是一个背着靴子的男

孩Ricarda Fuentes，她正和她的朋友Francisca Ramos从墓地回来。当他们问她为什么来首都时，马塞拉回答说是因为她即将结婚，并向他们介绍了她未来的丈夫。他在不远处观看了一场几个男人之间的冲突。当时该市正在经历严重的工人冲突，受到国民警卫队的残酷镇压，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¹¹。在母亲不在的情况下，马塞拉让人把靴子和她的物品带到了卡莱-德-圣安德烈斯的一家旅馆”。

„第二天，里卡达-富恩特斯在教堂见到了新娘和新郎，弥撒结束后，她邀请他们去她家。很自然地，他们谈到了婚礼。马塞拉对她母亲的缺席表示遗憾，但马里奥说，仪式不能因为这种情况而推迟，因为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他补充说，马塞拉的母亲知道一切，因为他曾去看望她，向她的女儿求婚，尽管他对没有适当听取他的意见感到遗憾。他们需要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来担任教母，在他看来，里卡达-富恩特斯就是这样的人。她抵制，声称正在服丧，但最终同意了。不过，他自己也打听了一下伊贝斯夫人的下落，因为他知道她对女儿的未婚夫持否定意见，他可能想在同意之前和她谈谈，但他无法找到她。

„当教母表示同意时--他们之前曾试图说服雅各布-洛里加，但没有成功--教父已经安排好了。马里奥觉得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人是米格尔-赫米达，一个被他称为叔叔的亲戚，一个加列戈信贷公司的雇员。于是他到他家去求婚。1900年底和1901年4月，伊莉莎曾来拜访他，但那时她像往常一样穿着裙子。看到她现在穿得像个男人，她的叔叔感到很惊讶。

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她告诉我，我们对她的性别都有误解，因为她是个男孩。她告诉我关于她的新洗礼的一切，我完全不知道。他还说，他要结婚了，因为由于他和一个年轻女人的婚姻生活，她已经怀孕了。他要求我帮忙；他要求我做婚姻的教父……”。

"可以预料，马里奥会要求她对这个故事保持谨慎，因为它与他告诉维克多-科蒂埃拉和里卡达-富恩特斯的故事不同。而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在婚姻中重合，所以有必要避免对比矛盾的版本。

也是米格尔-埃米达帮助马里奥获得了vecindad证书，他以失去以前的证书为由申请了该证书。负责这些行政程序的人告诉他，他必须提交一份书面申请，并附上某种担保以证明其身份。而赫米达是该市的一个知名人士，他显然充当了证人，并允许他以新身份获得文件。

"马里奥是圣豪尔赫教堂的常客，试图获得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信任，他的教区牧师告诉马德里《El Suceso Ilustrado》杂志的编辑：“每当他来到教堂，他总是向他们提供雪茄，每当他拜访我，他总是嘴里叼着一根烟。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小的镍瓶里”。

„维克多-科尔蒂亚拉同意为这对夫妇举行婚礼，他亲自写信给邓布里亚的牧师佩德罗-瓦雷拉，要求加快宣布的速度。当他们被宣读时，没有人反对，大家都祝贺马塞拉即将结婚。佩德罗-瓦雷拉证明了这一程序，并写了一封信，委托科尔蒂拉主持婚礼。这两份文件都是由马里奥和马塞拉交给他的，他们三人之间确定了仪式的时间：6月8日星期六，非常早，早上七点半”。

"在此之前，必须向民事登记处申请授权，马里奥在6月6日做了这个申请。他要求里卡达-富恩特斯代表马塞拉的母亲陪同他，但她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因为她觉得承担更多的责任太过沉重。对她来说，成为教母已经足够了。于是马里奥独自前往法院，设法安排"文件，辩称他和他未来的妻子都已达到法定年龄。

从阿科鲁尼亚的圣豪尔赫教区教堂的第13本婚姻登记册（1897-1911）中复制的结婚证书内容如下：“

"在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六月八日。我，拉科鲁尼亚市圣豪尔赫教区牧师V íctor Cortiella Somoza博士，受新郎和新娘居住的圣欧拉利亚-德-邓布里亚教区牧师Pedro Varela Rol ón的委托，在宣读了三份教规和其他教规-法律要求后，一方面参加了在这个圣豪尔赫教区教堂缔结的婚姻，另一方面通过现在和双方同意的话。唐-马里奥-何塞-桑切斯-洛里加，单身，31岁，圣豪尔赫的本地人和邻居，"唐-曼努埃尔-桑切斯和多娜-玛丽亚-洛里加的合法儿子，圣地亚哥市的本地人；另一个是。多娜-马塞拉-加西亚[原文如此]-伊贝斯，也是单身，34岁，布尔戈斯市圣阿盖达人，已故的唐-曼努埃尔-加西亚[原文如此]和多娜-马塞拉-伊贝斯的合法女儿，前者是萨拉戈萨省阿尔卡尼斯人，后者是布尔戈斯省的维瓦尔人。鳏夫Miguel Hermida Casares和已婚的Heliodoro Rey Mourenza接受并见证了婚礼的祝福，他们是本市的邻居。为了记录在案，我签了字"。

„由曼努埃尔-卡斯特罗-雷伊作为市政法官的代表起草的民事登记记录正确地再现了新郎和新娘的名字，马里奥-桑切斯-洛里加和马塞拉-格拉西亚--而不是加西亚--伊贝斯。两人都被列为阿科鲁尼亚的居民，据说前者是一名佣金代理人。两人的年龄都是32岁，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根据马里奥最近的洗礼证书，他是31岁--比埃莉萨小7岁，而马塞拉是33岁，尽管她比维克多-科尔蒂亚拉在其教区的婚姻簿上记录的34岁还少几天。也不能确定配偶的母亲是否已经去世。有可能马里奥在法院办理手续时，决定减少家庭人数，以便不必为他和马塞拉的母亲缺席提供理由。

"鉴于举行仪式的时间，参加仪式的人可能很少。除了新郎新娘和牧师，参加婚礼的还有米格尔-赫米达（Miguel Hermida），他担任教父并携带了13枚5比塞塔硬币；里卡达-富恩特斯（Ricarda Fuentes）作为教母，由她的朋友弗朗西斯卡-拉莫斯（Francisca Ramos）陪同；

音乐家兼圣职人员赫利奥多罗-雷伊（Heliodoro Rey）作为证人签字，还有赫米达本人；代表宫廷的曼努埃尔-卡斯泰洛，也许还有一些好奇的早起者。

马塞拉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用面纱遮住自己，把一束小橙花压在胸前。马里奥第一次穿上了做工精良的西装，还戴着戒指和金链子“。

"一旦他们离开教堂，在听完弥撒、领完圣餐并接受对方成为丈夫和妻子之后，马里奥和马塞拉可能很难相信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极其冒险的、几乎是嵌合的项目已经成为现实了。就他而言，维克多-科尔蒂亚拉也会高兴地使这种很快就会以孩子的形式结出果实的结合神圣化。教母分享了这对夫妇的喜悦，她邀请客人到她家吃巧克力。马塞拉和马里奥在那里呆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决定出去走走。"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拍摄了他们的肖像。他们选择了何塞-塞利耶（José Sellier）作为他们的摄影师，这个法国人自1886年以来一直居住在阿科鲁尼亚，他的住所是Calle de San Andrés 9号，是该市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塞利耶不会怀疑这张照片会有非凡的观众，肯定比他的电影的观众更多，因为他的电影是最早在西班牙拍摄的。

这对夫妇散步归来时带着一瓶雪利酒，以延长庆祝活动的时间。这顿饭在弗朗西斯卡-拉莫斯（Francisca Ramos）的家中进行，饭局结束后，新郎和新娘来到了同样位于圣安德烈斯的科库比翁旅馆，具体位置是104号。

"第二天，星期日，或10日星期一，消息来源并不一致，马里奥和马塞拉乘坐驿车La Lealtad前往邓布里亚。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最初的目的地。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马塞拉曾为她的未婚夫和未来的丈夫在邓布里亚和西伊的镇议会中申请了一份工作。也有可能是他们在考虑移民到美国。在结婚前不久，马里奥曾向一家托运代理人询问了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等舱船票的费用以及登船的必要手续。当他被

告知，除其他事项外，他还需要一份证明他没有昆特牌的证书时，他回答说，作为一个英语科目，这一要求对他没有影响。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还试图获得一些可能对他在其他地方有用的文件，因此他要求并获得了伊莉莎的洗礼和学校证书，他称她为他的妹妹。为了获得学历证书，他不得不到师范学校报到，他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没有人认出他是艾丽莎“。

"婚礼结束后，他要求提供一份经认证的结婚证书副本，声称他急需这份文件，因为他打算离开这个城市。他想纠正其中的一个错误，因为他妻子的母亲并没有死--他没有说他自己的母亲也活着--但曼努埃尔-卡斯特罗让他知道，要纠正这个错误，必须要进行档案。于是他放弃了，因为他对当局的询问最不感兴趣。

美国是正确的道路。或者葡萄牙，它就在隔壁。除了通向邓布里亚的那条路，其他任何路都可以。但那是他们拿走的。可能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骗局没有在阿科鲁尼亚被发现，就没有理由在马塞拉担任教师的城市被发现。

没有必要到达邓布里亚。当La Lealtad停在维米安佐时，有人传出消息，说Doña Elisa打扮成男人，戴着一顶科尔多瓦帽子，正在上面旅行。这两名教师在当地很有名，因为他们在靠近市府的卡洛村住了好几年“。

„人们包围了这辆车。有些人大喊大叫，有些人则高声辱骂。有人说：'如果不是多娜-埃莉萨，就是她的身材有问题'。一位女士走过来，向马塞拉打招呼，马塞拉向她介绍了她的丈夫。她随后意识到，那个所谓的马里奥其实是伊丽莎。马塞拉试图说服她，她弄错了："不，夫人；是你的一个表弟，长得很像他。可怜的伊莉莎刚刚踏上前往哈瓦那的旅程"。马里奥则试图用他的帽子遮住他的脸。"

"他们坐在车内，而车是静止的。人们在他们周围熙熙攘攘。马里奥不停地抽烟，几乎是在不经意间扔掉了香烟，同时攥着他的小胡子，

不断地扭动它。马塞拉正在调整他的领带，摆弄着它。当司机把马赶走时，他们一定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们肯定感觉到在邓布里亚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当他们到达并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有几个人看到了他们，他们认出了伊莉莎，当他们看到伊莉莎打扮成一个男人时，就把自己划了过去。他们还见到了教区牧师佩德罗-瓦雷拉，他在提到马塞拉的丈夫时，对一位邻居说：“要么是我看错了，”他似乎说，“要么就是艾丽莎。如果不是伊莉莎，那就是她的魔鬼”。马塞拉试图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故事来安抚大家的情绪”。

“神父的知己和当地医生费德里科-波马尔在他妻子的陪同下前往这对夫妇的家中，表面上是礼节性拜访，但他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要进行调查。马里奥在弹吉他，就像伊莉莎以前做的那样。介绍完毕后，他把吉他递给了医生，医生趁机唱了几句对联，暗指女人容易变脸和变心情。这副对联不符合新婚夫妇的心意，他们打断了他的话。当他们重新开始谈话时，马里奥抱怨说，他刚到的这个国家的风景很丑陋，而且他被叫到这里来生活，医生回答说，这和他几天前离开的那个国家一样。这对夫妇并不气馁。

„在医生的告知下，教区牧师证实了他的怀疑，他也决定去拜访他们，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木桩陪伴。马里奥和马塞拉走在前面，带着一盘糖果去寻找他，这是婚礼上的礼物。他们在教堂附近找到了他。马塞拉喜出望外，把他介绍给她丈夫，她丈夫给他一支雪茄。牧师拒绝了这些礼物，手里拿着木桩，感叹道：“我这里已经有你的糖果了……”。

“他把马塞拉领到教堂的中庭，带着难以抑制的愤怒，谴责她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不可信的，是亵渎。老师坚持要讲通常的故事，但牧师不相信她。他命令他们立即离开该镇，至少是伊莉莎，否则他将把他们俩交给国民警卫队。马塞拉进行了抵抗，甚至进行了反击。她不允许

她的合法丈夫受到这样的待遇。神父越来越失去理智，称他们是异教徒。

"在这期间，马里奥有些退缩，不安地踱步，抚摸着他的小胡子。一个碰巧在那里的人鼓励他去参观教堂，思考那里供奉的圣母像，但这位丈夫说他对教会事务"不感冒"。当佩德罗-瓦雷拉和马塞拉之间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时，马里奥走到教区牧师面前，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有些报纸会在口袋里放一把左轮手枪，使动作更加戏剧化--并与他对峙，说："Auszug aus: Narciso, Narciso,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听着，先生，如果在5月19日之前我是伊莉莎-桑切斯-洛里加，那么从6月8日起我就是马里奥-何塞-桑切斯-洛里加，那个雌雄同体的人。我是马里奥-何塞-桑切斯-洛里加，雌雄同体，自6月8日起。

他的对话者惊呆了，如果他诉诸于木桩来保持平衡，那也不足为奇。这就是他所需要的！现在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顺便说一句，关于雌雄同体的问题，神父一定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是在当时，这并不适合这种清醒，那么后来，当他到达教区时。也许他曾求助于一本书来启迪自己，或者咨询他的朋友医生，他肯定知道一些情况。"如果他忘记了，他可以通过翻阅手册来更新他的知识，例如佩德罗-马塔的Tratado de Medicina y Cirugía Legal（《医学和法律外科论文》）第五版，首次出版于1844年。它指出，这种情况被理解为"两个性别在同一个人身上相遇"，在人类中并不存在。"男人或女人的雌雄同体，是指生殖器部位的恶性处置，通过这种处置，主体似乎属于他或她并不真正属于的性别，或者其真实性别无法确定。"¹² „男人或女人的雌雄同体，是指生殖器部位的恶性处置，通过这种处置，主体似乎属于他或她并不真正属于的性别，或者其真实性别无法确定。它可能是男

性--具有女性外貌的男人--，女性--具有男性外貌的女人--以及两种性别，或者是外显体--其形态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别。

"马里奥认为是时候求助于他费尽心思收集的文件了，比如洗礼证书，其中记录了他作为男人的身份，或者结婚证书，其中他被列为马塞拉的合法丈夫。他回家去拿，回来给佩德罗-瓦雷拉看。后者不以为然。他不会再被骗了。他给了他一天时间来离开邓布里亚。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谴责他，也就是谴责她。

其余的邻居也感到被欺骗了。乡下人，是的，但不是傻子。年轻人可能也觉得受了委屈，特别是那些曾经与马塞拉相爱或与她有过某种关系的人。他们包围了老师的房子，并引发了一场将在集体记忆中流传的骚乱。他们大声要求艾莉莎在场："把她带出来！把假小子带出来！把公民带出来！"，还有其他一些说法，鉴于他们的水平，前往邓布里亚为《加利西亚之声》报道事件的亚历杭德罗-巴雷罗认为不应该转载"。

"他们想认清她，不择手段，并检查她的性别到底是什么。既然她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打扮成一个男人，最后声称自己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做一些检查也无妨。有些人还打算殴打他。他们也没有得到，因为马里奥趁着房子后面无人看守的时候，从窗户跳了出去，向阿科鲁尼亚逃去。再一次，他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

„没有对马塞拉做任何事情，尽管她因丈夫不在而受到打击，但她还是能够继续在邓布里亚经营她的学校。然而，她不得不回答当地人提出的许多问题。在马里奥不在场的情况下，她终于承认他是伊莉莎，尽管她补充说："你应该知道，她更像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她说得更清楚，但记者认为不适合转载她的解释，只限于向读者提供一个总结："她在这方面做了无法发表的参考，总结起来说，Elisa是男女都有的"。邓布里亚老师的话一定给了人们很多思考的空间--可惜她不能正确地认出平民，有些人可能认为"。

"一旦他离开邓布里亚--当然是"匆匆忙忙",正如1993年7月16日接受采访的两位老太太告诉我的那样,尽管她们使用的是女性复数--马里奥在黄昏时分坐上了将带他去阿科鲁尼亚的马车,如果我们相信马车司机对《加利西亚之声》所做的陈述,他在车上登记的名字是胡里奥-波尔特隆。在首都,他在126号的Calle del Orzán找到一家旅馆,在那里住了几天。起初,"没有人打扰他,因为在城市里,人们对"无男人的婚姻"一无所知。但这种平静是短暂的。

婚礼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圣豪尔赫教区的牧师收到了邓布里亚教区牧师的一封信。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已经和两个女人结婚了!我们已经做得很好。这一定是这封信的内容,一言以蔽之。科尔蒂拉最初感到难以置信。这不可能,肯定是道听途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一些调查,包括采访担任教母的人—我们不知道她是洗礼仪式的教母还是婚礼的教母,因为媒体在这一点上很混乱--她也不相信信中所说的内容。她认识伊莉莎,她比马里奥更高更老"。

"随着令人震惊的信息不断传来,教区牧师继续进行调查,并设法通过一些参与婚姻的人找到了马里奥,将他传唤到教区。他于6月15日出现在那里,平静而不慌不忙。他被要求提供他在伦敦逗留的证明,并出示了一本桑切斯-洛里加先生的护照,该护照于1896年由西班牙驻伦敦首都的领事认可。科尔蒂亚拉不满意马里奥对文件的解读,想亲自阅读。然后他发现这两个姓氏下有一道划痕。马里奥脸色发白,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并辩称英国抄写员在抄写西班牙姓氏时遇到了麻烦,犯了一个错误,把"Sanchij"而不是"Sánchez"。

"这个解释并不令人信服,科蒂埃拉继续逼迫他认罪。他向他询问了艾丽莎的下落。她是在美国。"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需要证据来确定!"。马里奥意识到审讯是严肃的,并开始不安和自相矛盾。他不在美国,而是在英国。牧师受够了他的欺骗,回答说:"艾丽莎,是你!"。

当第一个故事不奏效时，马里奥诉诸于第二个故事。

„在我的童年，我穿裙子，但注意到我觉得自己是男性多于女性，我去国外咨询，一位医生告诉我，我是雌雄同体，我可以选择男性的性别，因为它在我身上占优势。

"科尔蒂拉对这一说法也不满意。这必须由医生来验证。马里奥没有反对，他们两个人就去了医院。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医生安东尼奥-德乌斯，他正在前往11点的弥撒的路上。教区牧师告诉他，他的同伴想咨询他，并迅速向他通报了这一案件，这是他在行使职责时的第一个案件，他请他陪同他们去教区。马里奥在那里被认出，没有任何反抗。由于诊断结果不符合他的意愿，他要求由另一位医生进行更详细的检查，为此他提供了曼努埃尔-巴贝托的名字。6月16日星期日13时，他再次接受检查，结果相同，因为在这名第二名医生看来，他缺乏男性特征。

圣若热教堂的教区长，在那里对埃莉萨/马里奥进行了第一次体检。

"这两名医生被阿科鲁尼亚负责此案的法官传唤，以报告Elisa的性状况。安东尼奥-德乌斯肯定地说，"这不是一个雌雄同体的案例，但她属于女性"，曼努埃尔-巴尔贝托说，她没有出现 „任何男性特有的器官和女性特有的器官"（附件二）。这一判决已经在媒体上传达或暗示过了，他们想知道艾丽莎/马里奥是女人、男人还是雌雄同体。一些报纸甚至报道了这样的传言：根据一位医生的说法，"伊莉莎至少已经生过一次孩子。

"其他证词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对记者的发言中，马塞拉的母亲利用她的特权地位证明埃莉萨是个女人，暗示她曾亲眼看到她的情况，使

她能够欣赏。一位来自邓布里亚的女士，在马塞拉参加竞争性考试时与伊莉莎上过床，她也没有怀疑。Xan de Canzobre，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编年史家，在卢戈的《El Regional》报上，曾在她年轻时见过她--他补充说，是亲眼所见--给她画了一幅不利的肖像，无论是身体上的--她没有吸引力，还是心理上的--她是一个"真正的神经质"，但毫无疑问，她属于女性，当时的其他年轻人，这个"大胆的"女孩在他们中间很出名，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一些报纸承认对Elisa/Mario的性状况有怀疑。在La Voz de Galicia看来，她要求进行第二次体检--尽管为检查设置了限制--可能是表达了她的性解剖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他热衷于阅读医学书籍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解释。有一次，她在邓布里亚的一个邻居家做客时--估计是医生--拿了一卷名为《法律医学元素》的作品，她把它带回家了，还有一次，她被发现在检查一本含有非常"对女性眼睛有害"的插图的书。

"其他证词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对记者的发言中，马塞拉的母亲利用她的特权地位证明埃莉萨是个女人，暗示她曾亲眼看到她的情况，使她能够欣赏。一位来自邓布里亚的女士，在马塞拉参加竞争性考试时与伊莉莎上过床，她也没有怀疑。Xan de Canzobre，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编年史家，在卢戈的《El Regional》报上，曾在她年轻时见过她--他补充说，是亲眼所见--给她画了一幅不利的肖像，无论是身体上的--她没有吸引力，还是心理上的--她是一个"真正的神经质"，但毫无疑问，她属于女性，当时的其他年轻人，这个"大胆的"女孩在他们中间很出名，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一些报纸承认对Elisa/Mario的性状况有怀疑。在La Voz de Galicia看来，她要求进行第二次体检--尽管为检查设置了限制--可能是表达了她的性解剖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他热衷于阅读医学书籍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解释。有一次，她在邓布里亚的一个邻居家做客时--估计

是医生--拿了一卷名为《法律医学元素》的作品，她把它带回家了，还有一次，她被发现在检查一本含有非常"对女性眼睛有害"的插图的书。

"马里奥向他的妻子报告了在阿科鲁尼亚发生的事情，他的妻子留在邓布里亚，向他通报了那里发生的事情。在Calle del Orzán的旅馆，他遇到了多明戈-罗德里格斯，一个商业学生。他似乎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人，尽管他没有怀疑他是一个女人。他介绍说自己是从美国回来的移民，最近与一位老师结婚，他深深地爱着她。他们打算在城里定居，因为他的妻子不适应她所驻扎的地方"。

"有一天，他说他必须去科库比翁的汽车，以防收到他妻子的信。当他回来时，他带来了一个装有男士衣服的大包裹，他肯定需要这些衣服，因为考虑到他离开邓布里亚时的情况，他肯定是满载行李抵达阿科鲁尼亚的首都。包裹里可能有圣安德烈斯街（Calle de San Andrés）的一个裁缝做的两套衣服中的一套，他给一个与马里奥身材相似的年轻人量了尺寸，这个年轻人被他的一个同伙带到了裁缝店。

包裹里还有一封长信，大约有四页，他仔细阅读了这封信。他一读完，就告诉多明戈，他不能再呆在旅店里了。他的妻子想要他。她不忍心让他走得太远，希望他能在她当老师的村子里陪着她，她现在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他去了。但在他的室友看来，他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给马塞拉写了一封长信。

"一切都表明，这些信是用来安排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邓布里亚是不可能的，阿科鲁尼亚也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委屈。而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20日，第一条新闻出现在El Noroeste15上，6月22日，La Voz de Galicia创造了后来著名的标题："一场没有男人的婚姻"。如果不把海放在中间，至少也要把陆地放在中间，这是必要的。

"马塞拉是在6月25日这样做的，在看了马里奥寄给她的信之后--以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德-桑切斯-洛里加的名义，他可能在几天前就离开了阿科鲁尼亚。一名当地人在去往圣康巴的巴伊尼亚斯集市的路上遇到了这位来自邓布里亚的老师。她在村里宣布，由于她母亲要做一个小手术，她必须去圣地亚哥，所以她留下了她居住的房子和学校的钥匙。在离开之前，他要求老师何塞-费林-塞尔维尼奥（José Ferrín Cerviño）为他盖上 "vecindad "的印章。"我应该在这里写什么？"当她走到关于婚姻状况的部分时，她问他。"结婚了！你把结婚，因为我在上帝和人面前是已婚的“。

"OPORTO

媒体对该案的广泛而详细的报道使我们的主人公成为一个巨大的名人。人们不谈别的，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记者们试图追踪他们，以便采访他们，了解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他们并不是唯一对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人。学术界、教会和司法当局也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寻找他们。但他们无处可寻。1901年6月25日，马塞拉在前往圣地亚哥的路上失去了踪迹，同月16日伊莉莎进行第二次体检后，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一些人说他们在南美洲，另一些人在古巴，但最持久的谣言是把他们放在葡萄牙，更确切地说，是在波尔图市16“。

"最初停留

后者的确是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最近的边界是葡萄牙的边界，所以他们决定穿过它。一列火车把他们带到了波尔图，他们分别进行了这次旅行。马塞拉告诉《北方报》：“埃莉萨先来了。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尽管与人们所说的相反，没有针对我们的法律诉讼”。

马塞拉在6月27日已经在波尔图，因为她在这一天在西班牙驻该市的领事馆登记。她宣称自己28岁—比实际年龄小6岁，因为就在那天她已经34岁了--她做过仆人，而且她已经结婚。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她出示了个人身份证，可能就是邓布里亚的主人给她的那张。另一方面，马里奥并没有将他在领事馆的情况正规化。

"他们首先在位于城市中心的Bonjardim街的A Mesquita旅馆找到了住处，但几天后，他们搬到了Batalha广场的另一家旅馆，该旅馆由Josepha Maria Lopes经营，她以每月两千雷亚尔的价格将阁楼上的一个房间租给他们。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8月16日。

他们的财务状况很不稳定。马塞拉的250比塞塔很快就用完了，为了生存，他们被迫卖掉一些财物。马里奥开始在一个裁缝那里工作，裁缝每天付给他160雷亚尔，但这份工作并不令他满意，他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一些经常或偶尔住在波尔图的西班牙人答应帮助他。鉴于他的书法很好，他们正在考虑为他在办公室找一份工作。

"他接触到的一些西班牙人是斗牛士。其中一个被称为Llaverito的人--这是著名的科尔多瓦斗牛士Rafael Guerra Bejarano的绰号之一--将他介绍给里斯本咖啡馆的共同所有人Nogueira先生。现在自称为佩佩的马里奥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一天晚上，在与诺盖拉交谈时，他提到了他的经济困难和他需要找到工作。可惜你不是女人，"他的对话者说，"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雇你来打理咖啡馆和餐厅的桌布了。"这很适合我! -佩佩回答说："我妻子安排的一切都让你满意" 17.

„于是，马塞拉开始在里斯本竞技场工作，每天领取240雷亚尔和食物。她被证明是一个真正的专家--她在师范学校的工作获得如此高的分数

是有原因的--诺盖拉和他的妻子都对她很满意。这两对夫妇之间甚至建立了某种友谊。有一次，当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吃饭时，诺盖拉说，当男人单独在一起时，所有的女人都非常嫉妒，马里奥点点头："是的，我的女人也一样！"。

„事情似乎已经回到了正轨。到7月中旬，加利西亚和西班牙的媒体已经停止了对艾丽莎和马塞拉的报道。该案在没有涉案人员的证词的情况下，"已经没有意义了。葡萄牙媒体虽然发表了一些关于他们可能在葡萄牙出现的消息，但也没有找到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在葡萄牙开始新的生活。

逮捕和监禁

他们的喜悦是短暂的，因为西班牙当局正在追捕他们。1901年7月1日，在听取了不同证人的陈述后，阿科鲁尼亚的预审法官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Pedro Calvo y Camina）同意起诉他们，并下令搜查和逮捕他们“。

"这个命令被传达给了维哥的国民警卫队，是他们的指挥官萨尔瓦多-米兰上尉主动在葡萄牙寻找他们。利用葡萄牙警方负责移民事务的特工经常访问维哥的机会，他向他们通报了这一案件，并要求他们抓捕这两名加利西亚妇女，如果他们如所怀疑的那样在波尔图。该请求被转交给了波尔图的警察当局，他们开始了调查。

"关于葡萄牙警方如何找到他们，流传着两个版本。据El Suceso Ilustrado报道，他们是在对已知有外国人居住的机构进行例行访问以检查他们是否有适当的文件时偶然发现的。El Jornal de Notícias报道说，另一方面，他们受到了某位Generosa的谴责，她对Mario（现在的Pepe）关于她的不利评论感到很委屈：在她看来，"她在美貌方面不欠Providence什么"。吉纳罗萨和她的丈夫是一名鞋匠，他们从一名

访问波尔图的阿拉贡妇女那里发现佩佩是个女人--当时西班牙媒体已经刊登了"没有男人的婚姻"的照片--于是他们告诉警察。

无论如何，8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下士Manoel dos Anjos Lebreiro和警卫119 Jeronymo Augusto Antunes出现在Batalha广场的养老院。"当时，只有马里奥在宾馆里，所以他们着手辨认他。他首先向他们展示了他妻子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合乎规定的。他们要求他出示自己的，他就到房间去拿。他花了大约十分钟，带着一封以何塞-马尔-桑切斯-马丁内斯为名的居留信回来了。对不起，"他对下士说，"但我把这份文件掉在水里，它是湿的。勒布雷罗检查了这份文件，上面写着何塞已经结婚，并表示惊讶，因为领事通常只为每个婚姻签发一张居留证。"明天我就去见领事，让他按你说的安排。"那个自称叫何塞的人回答说。

"但警方开始怀疑，并想起了西班牙当局所追求的"无主婚姻"。甚至有可能他们去巴塔拉广场的养老院是为了找到主人公，因为据一些葡萄牙报纸报道，他们进入养老院是为了寻找马里奥-桑切斯-洛里加。无论如何，他们继续进行审讯。他们告诉被指控的荷西，他必须陪同他们去警察局。他们知道他是个女人。他愤怒地抗议说："这是一种侮辱。[我是个男人，男人！"。为了证明他是个男人，他给他们看了他1901年的洗礼证书。此外，他还批评了警察的行为："应该更加尊重外国人，不要让他们受到这样的羞辱"。

好吧，如果你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个男人，既然我们也是，"下士回答说，"检查你应该没有问题，....。向我们证明你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宣布结束。马里奥拒绝了这一提议，并拒绝提供要求他提供的那种证据。最后，在问题的骚扰下，他终于承认自己是个女人--"伊娃的一个简单的女儿"，A Voz Pública会说。他为自己的行为请求宽恕，因为他改

变身份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与此同时，勒布雷罗将他带到了警察局，他要在那里做一份声明“。

"当被问及马塞拉的行踪时，他回答说她在里斯本咖啡馆。警卫安图内斯去了，诺盖拉先生陪同他去了她".....的地方。

"马塞拉的雇员正忙着缝纫。马塞拉一见到警官就脸色大变，警官把她带到了警察局。

最初的审讯很简短，但这足以让马里奥讲述他的故事，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介绍一些新奇的东西。这场婚姻的目的是使马塞拉免受一个想娶她的男人的迫害。于是他决定扮成男人，并以此身份向邻近教区的牧师提出受洗，声称自己是个弃儿--而不是新教徒--不知道自己是否接受过洗礼之水。接受洗礼后，带着证书，他设法结婚了。然而，他承认自己是个女人，所以没有必要通过任何形式的承认来确定他的性身份。

"马塞拉，在此之前一直追随马里奥的脚步，如果我们相信媒体传播的信息，那么相反，她坚持认为她的丈夫是一个男人，根据《北方报》的报道--"马塞拉，扮演可怜的女孩，甚至以她母亲的骨灰起誓，她的马里奥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或者用《第一财经日报》的话说，是一个雌雄同体。"然而，马塞拉坚持要反驳伊莉莎的话，申明这桩婚姻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她是雌雄同体"。

记者们来到警察局，被允许见到„走私的新娘和新郎"，正如《新闻日报》的标题所描述的那样："。

"马塞拉中等身材，非常友好。她身着非常简单的羊毛衫，头上戴着黑色蕾丝头巾。

伊莉莎比马塞拉高，脸型修长，剪成男人的发型，给人一种相当明显的男性化体态。

由于她的肉体并不丰富，而她的真实性别的个人又有充足的肉体供应，所以男性的服装非常适合她，原来的女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完美的易装癖之一。

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羊驼毛外套，深色毛线裤，戴着一顶软绵绵的白帽子，穿着黄色的鞋子。

审讯结束后，专员阿德里亚诺-阿卡西奥-德-莫赖斯-卡瓦略（Adriano Acácio de Moraes Carvalho）命令将他们带到波尔图的监狱，即所谓的Aljube监狱。他们被分开带走，以避免拥挤，因为这时许多人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天，他们的名气会大大增加，届时所有的媒体都会对他们进行广泛报道，尽管马里奥在警察局要求记者不要深入了解细节。”

“葡萄牙警方向维哥的国民警卫队队长萨尔瓦多米兰报告了逮捕情况，后者又向阿科鲁尼亚指挥部的莫拉莱斯中校传达了这一消息。米兰给莫拉莱斯的电报日期为8月16日，内容如下：“根据警方发给我的电报，今天伊丽莎和马塞拉在波尔图被捕，向我征求指示。明天的混合列车，我将前往波尔图，特别是负责被拘留者，与他们一起越过边界”。莫拉莱斯批准了这项行动，并要求他通知他到达阿科鲁尼亚的日期，看守这两名妇女。

在此期间，他们在阿尔久贝。在那里，主任António Favares Branco接待了她们，他告诉她们，由于她们是两个女人，她们将被关押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但刚刚向警察局承认自己是女人的马里奥又改变了主意。

-我是个男人!

-那么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如果我对你说，我是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人留在上面，而你，看在你是个男人的份上，去其他囚犯所在的牢房。在那里与他们和好吧！"

"马塞拉惊慌失措，紧紧搂住她丈夫的脖子，一边说。

-分开？

-但你的同伴是男人还是女人？

-伙计，伙计

-下来，然后...

-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

"关于此事的解决方式，再次流传出不同的版本。El Suceso Ilustrado 指出，马里奥本人最后承认了自己的女性状况，以避免监狱长提出的医疗检查。据《新闻日报》报道，起初他抵制接受检查，最后接受了，"但只是因为权威"。该报继续说，由于在场的唯一权威是警察和狱警，他们是负责检查的人。

而他们的结论是，根据我们获得的最可靠的数据，雌雄同体的故事纯粹是一种发明。医生们没有这样说，但一切都让人推测，执法人员没有被欺骗，因为还有一个非常称职的女方证词。

"最后，他们两个人被接纳到主任提供的房间，在那里过了一夜。他们没有睡多久，《新闻日报》记者第二天访问他们时可以看到。他在那个"肮脏的房子"--"传染病的房子"，正如O Norte所说--被称为小教堂，因为它有时被用来做弥撒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他们。

所说的礼拜堂是一个小的、方形的房间，通过高出地面约五英尺的两扇格子窗接受光线，上面有一个黑色的、腐烂的地板“。

„在后面，有一个模拟的祭坛，用油彩画的，在祭坛的架子上，我们想我们看到了两三个原始工艺的圣徒形象，其中一个被斩首。在这个祭坛前面的一个小台子旁边，坐在草椅上，彼此之间有一段距离的是马塞拉和伊莉莎。他们睡在附近的另一个隔间里，也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守夜的结果是明显的苍白，眼下有很深的黑眼圈，而且他们所有动作都透露出疲倦。早上，当两人睡觉的隔间的门被打开时，马塞拉离她丈夫非常近，她的头慵懶地靠在他的左肩上，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似乎在努力给对方提供他们正在经历的困难局面所需的勇气。

"原计划17日将他们带到警察局，继续进行逮捕后立即开始的审讯。但专员放弃了这一目的，因为监狱周围聚集了許多人，他们渴望看到"两个已婚的西班牙人"，特别是那个穿成男人的人。

萨尔瓦多-米兰上尉确实从维哥来到了警察局。他要求将这两名妇女移交给她，或者将她们带到边境逮捕。该专员拒绝了。如果没有西班牙当局的正式投诉，他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出来。为了遵守引渡程序的手续，西班牙驻波尔图领事也来到警察局，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要求“。

"船长第二天返回维哥，在图伊停留，通过电报通知阿科鲁尼亚的法官他努力的负面结果，同时请求指示。该电报还指出，被拘留者已准备好被带到阿科鲁尼亚，"不需要等待引渡令"。

一切似乎都表明，葡萄牙警方在某个时候考虑过将他们直接移交给米兰的可能性，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手续，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也得到了这样做的希望，因为否则这位上尉前往波尔图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马德里先驱报》在其8月20日的版本中想当然地认为，某个尼古拉斯-马洛尔--我们推测它指的是萨尔瓦多-米兰--一个 „西班牙代表"，在

伊丽莎和马塞拉的陪同下离开波尔图，将她们移交给阿科鲁尼亚的法院。同一天，马德里《自由报》的卢戈记者说，这三人在黎明时分经过该市，从波尔图出发，前往阿科鲁尼亚，导致许多人聚集在火车站，尽管当时并不是这类聚会的有利时机。同一天，哈瓦斯新闻社甚至报道说，他们已经抵达阿科鲁尼亚的首都，并被监禁”。

“我们的主人公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一名警察传达给他们的。在他们被捕后的第二天接受《新闻报》的采访时，马塞拉与记者进行了如下对话，记者最初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身份。

-最让我伤心的是在阿科鲁尼亚等待我们的耻辱，因为我被所有的人认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我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你知道葡萄牙当局会在哪里把我们移交给西班牙人吗？

-在边境，可能。然后这位女士和她的同伴都会被从监狱带到A Coruña？

-绝不！我们要坐火车和汽车去！”

“用什么资源？

-我有一些积蓄，我将在阿科鲁尼亚收到我父亲留给我的3000雷亚尔的遗产....

-从现在起，你们可以指望的是，你们将被分开，直到审判.....。

这时，马塞拉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激动得结巴起来。

-把我们分开？在棺材前！

当她的对话者表明自己是一名记者时，马塞拉问他是否知道他们何时会离开。

-我们明天[18]出发去阿科鲁尼亚吗？

-我不知道。但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她更加沮丧地喊道，用右手遮住脸，“真丢人！”。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伊贝斯夫人因女儿可能到来而感到震惊，她会见了莫拉莱斯中校，恳求他对她有所照顾。她还趁机告诉他她的说法：她的女儿是在伊莉莎的压力和威胁下同意结婚的，“她担心马塞拉会嫁给一个来自邓布里亚、想让她成为他妻子的男人”。

不出所料，“无主婚姻”即将抵达海格力斯城的消息引起了人们非凡的兴趣和好奇心。当局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在经过阿科鲁尼亚的街道时发生集会和骚乱。

“莫拉莱斯中校警告米兰上尉，当他在两名被拘留者的陪同下抵达维戈时，将被告知如何进行旅程。新闻界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他们在附近的车站下车，如贝坦索斯，然后从那里乘车，利用夜晚的阴影；或者他们直接到达阿科鲁尼亚的车站，那里有一辆车在等着他们，由一两个骑马的国民警卫队成员看守，他们将把他们带到监狱。

“La Voz de Galicia”曾宣布19日10点的火车抵达。因此，有很多人--很多人，本报会说--聚集在圣克里斯托瓦尔车站，就像以前在瓦伦萨-杜米诺和图伊一样，以免错过演出。他们没有到达，但一名国民警卫队的中士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个嫂子到达了。由于他们是两个女人，并有一名贝内梅里塔的官员陪同，他们被误认为是埃莉莎和马塞拉。人们把他们逼到墙角，对这个案子发表了各种评论，其中大部分是以节日的口吻。最终情况得到了澄清，尽管在晚上，在coruñes走廊里，有人声称伊莉莎和马塞拉设法躲过了围观者，已经在监狱里。有些人愿意花钱去看看”。

“但他们不是在阿科鲁尼亚的监狱，而是在波尔图。主任和他的妻子--德尔菲娜-罗莎-德-赫苏斯-法瓦雷斯--都试图使他们被剥夺自由的过程尽可能没有痛苦，他们为他们提供了条例所允许的所有好处。里斯本咖啡馆为他们提供了食物。

负责监禁他们的警察局长将事实提交给民事长官，于8月18日给他发了以下信件：".....Auszug aus: Narciso Narciso,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维哥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队长Salvador Millán要求秘密移民的镇压警察查明西班牙人Marcela Gracia Ibeas和Elisa Sánchez在这个城市的下落，他们在A Coruña省的San Jorge教区结婚，Elisa Sánchez是个男人，这一事实已被告知民警，这些西班牙人于本月16日在这个城市被捕，前者打扮成女人，后者打扮成男人。Marcela Gracia Ibeas拥有今年6月27日正式合法化的国籍证书，Elisa Sánchez没有证件，提交了一份失效的国籍证书，名字是José Mal Sánchez Martínez，这份文件属于一个名叫Manuel Abollo Martínez的西班牙人，于明年9月17日在领事馆通过，我请求阁下同意处理给予上述西班牙妇女的目的地。„

"这封信证实了新闻界对逮捕的说法：逮捕是应萨尔瓦多-米兰上尉的要求进行的。此外，正如A Voz Pública批评性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据该报报道，两国达成协议，各自的警察部队在镇压非法移民方面进行合作。

第二天就收到了咨询的答复：民事总督佩雷拉-达库尼亚在向他的上级请示后，决定将埃莉萨和马塞拉移交给司法部门，以审判他们在葡萄牙犯下的罪行“。

"在此之前，专员必须完成诉讼程序，为此他需要向两名被拘留者录取证词。17日的企图被挫败了，三天后他们被审问了。马塞拉在警察局，她自己去了，一个便衣警卫在安全距离内跟着她；马里奥在监狱，书记员塞纳-安图内斯去了那里。通过这种方式，他想避免"走私男友"引起的惊愕。

审讯的重点是马里奥的居住信。当被问及它的来源时，他回答说，有一天在巴塔拉广场散步时，有一张纸飞了出来，原来是一份与一个人有关的文件，他决定保留它，因为他认为它可能对他有用。专员不相信这个故事，这当然不是很可信，但他没有成功地改变声明：“艾莉莎-桑切斯有一个优点，就是对她的同伙保持最大的秘密”。

"El Suceso Ilustrado"的编辑前往波尔图收集第一手资料，有机会看到这封居留信，小卖部给他看了。它对应于1482-99号，包含以下信息：“何塞-马尔-桑切斯-马丁内斯是维森特和玛丽亚的儿子，已婚，职业：店员”。专员指出了显示该文件是伪造的划痕。此外，在检查了领事馆的登记簿后，发现这个号码实际上对应的是曼努埃尔-阿波罗-马丁内斯，他是维森特和玛丽亚的儿子，单身，32岁，是一名商店助理。

这位马德里记者还表示，他曾目睹了马里奥和曼努埃尔-阿波罗之间的对抗：“。

"我在Aljube（监狱）找到了他[Manuel Abollo]，在那里，我为了尊重专员和主任，目睹了后者和Elisa之间的对抗。Abollo说，他认出当局持有的文件是他自己的，他离开了很久，在他办公室桌子的一个抽屉里错过了这份文件，他一直把它放在那里。

他还告诉我，他很抱歉与埃莉萨和马塞拉做朋友，因为他一直在怀疑什么，而且他正在为埃莉萨找工作。

„不管它是如何落入他的手中，这份文件让马里奥证明了一个新的身份。通过改变他的名字，但不改变他的性别或婚姻状况，他打算在警察在葡萄牙追捕他的时候躲避他们。伪造这种文件将是他在葡萄牙面临的主要指控。

"司法警察部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福加萨先生随后给了她一条黑色毛线裙，一件浅色棉质夹克和一个黑色的头巾，西班牙人用它使自己女性化。我们曾见过她是个男人，她的动作轻松而敏捷，而且知道她完全是个女人，当时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她确实是个男人，她的步态是如此不足，她的姿态是如此不合适，在黑色的服装和外套内，她的姿态是如此不合适，在黑色的服装和泛白的外套内，她瘦而直的身体就像挂在扫帚上。他作为一个男人，肯定要好得多！他是一个男人。

本报不会是唯一认为这一变化是不幸的。Jornal de Notícias认为，更换衣服和剃掉小胡子使她的男性外表更加可信，"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坦率地说，我们发现她穿成男人时更有吸引力。恢复到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真实状态，她就更有魅力了！或者诺特甚至会说，当她给人的印象是伪装成一个女人时："她似乎比以前更像一个男人"。A Província用类似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穿得像个女人.....而她看起来更像个男人！"。

在法庭上出庭“。

"8月21日下午两点，Elisa和Marcela在警察局停留后出庭。一辆马车在Aljube的出口处等着他们，"窗帘被神秘地拉上"，马车很快就被人们包围了。为了摆脱它，陪同马车夫的警察让马全速奔跑，运气不好的是，当从穆桑霍-达-西尔维拉街转向弗洛雷斯街时，其中一匹马跌倒了。他不得被接走，这花了一些时间，让更多的围观者加入到已经在追赶汽车的人中。

当他们到达警察局时，兴奋和骚动仍在继续。他们哭着下了马车。马里奥恳求允许他穿成女人。他非常坚持要这样做。O Primeiro de Janeiro》是这样描述和评估服装的变化的。

"这是三个月的交叉装扮的结束。起初它是成功的，因为它使马里奥得以与马塞拉结婚。但在这一点上，这对伊莉莎来说是一个负担--从现在起我们就这样称呼她--她急于将自己从这个负担中解放出来。当她成功地穿上女人的衣服时，她感到有些欣慰，并感谢专员对她和她的同伴的所有尊重。

专员把它们和诉讼程序一起送到了法院。他还转发了从西班牙当局收到的一份电报，要求在将这两名妇女移交给西班牙之前继续拘留她们，这两名妇女的引渡正在处理中。因此，专员阿德里亚诺-阿卡西奥

(Adriano Acácio) 在给葡萄牙法院的信中警告说，如果他们被判决释放，他将再次负责他们，为此他显然得到了波尔图民政长官的批准。

"埃莉萨和马塞拉乘坐送他们去警察局的那辆马车到达法院，这次没有跌跌撞撞。据《新闻日报》报道，许多人在等待他们，其中妇女占多数--"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卫兵们不得不打出几拳来开路。当他们意识到丈夫失踪时，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一事件因此失去了很多兴趣。

审讯由马尔加多-帕切科 (Margarido Pacheco) 法官主持，尽管其他地方法官也在场，但被该案件的特殊性质所吸引。Elisa被指控无证，从事异装癖--"穿着不同性别的服装"--以及使用"伪造的国籍证书和各自的居留证"。马塞拉只是被指控与她的朋友合谋。

"第一个被审问的是马塞拉。她说，她与伊莉莎结婚时"相信她真的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当被问及她与母亲的关系时，她宣称关系很差。他没有再见到她，而且自结婚以来，他们没有进行过书面交流。"那么她是否知道这段婚姻的非法性？"法官继续问道。"有可能，她没有作为一个好母亲，因为我确信，正是她，通过传播这个案件，造成了在我们周围产生的巨大丑闻。"她承认，她对自己的轻率行为感到后悔，并对其造成的悲惨后果感到惊讶。她还表示，担心Elisa用西班牙

语作陈述时，不能被正确理解。对此，她承认她对被送往阿科鲁尼亚的恐惧：“真丢人！真丢人！”。

"当Elisa被问及居留证的来源时，她坚持她最初的说法，并得到了Marcela的证实：居留证是坐飞机到她手里的，虽然她保留了这份文件，但她并不打算使用它。关于婚姻问题，她复制了在警察局提供的版本。

在她对马塞拉不可抗拒的同情心的驱使下，她有了把自己伪装成男人并与她结婚的想法，马塞拉是一个邻居顽强迫害的受害者。她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她，把她从这个可怕的英勇者的无礼行为中解救出来，她的同伴从未鼓励过她，而是一直憎恨她。

"据媒体报道，这些指控承认保释，而里斯本咖啡馆的老板之一、这对夫妇在葡萄牙的主要辩护人诺盖拉准备支付保释金。但他们既没有要求这样做，法官也不认为应该向他们提供这种可能性，因为专员在移交信中宣布，如果法院释放他们，他将按照西班牙电报中的要求着手逮捕他们。伊莉莎和马塞拉在得知电报内容后痛哭流涕，这使他们在支付保释金后被释放的希望破灭。

"当Elisa被问及居留证的来源时，她坚持她最初的说法，并得到了Marcela的证实：居留证飞到了她的手中，虽然她保留了这份文件，但她没有"当他们离开法院时，他们被许多人包围，尽管比在他们入口处聚集的人少。然而，看守人员不得不努力工作，把他们弄进车里。他们由三名驿站官员陪同。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不是Aljube，而是Cadeia da Relação，他们将在那里停留8天，以遵守法官的还押命令。关于他们的后续目的地，《新闻日报》宣布：“在这一时期结束后，

他们将被送回总专员，总专员将下令将他们安置在边境，从而满足阿科鲁尼亚当局的要求。

Cadeia da Relação大楼有三层，再现了囚犯的社会等级。一楼是所谓的enxovias，即六个铺有石板的大房间，没有经济来源的囚犯就堆放在这些房间的小床上。第二层是沙龙和妇女沙龙，它们的条件较好，尽管它们也是集体空间。顶层有单独的牢房，被称为"Quartos de malta"，保留给较富裕的囚犯¹⁸。此时，该监狱关押了401名囚犯。

"Elisa和Marcela本应去圣特雷莎监狱，但监狱长José de Sousa Rangel怜悯他们，允许他们呆在萨尔塔，以便到圣本托口岸。第二天，诺盖拉与监狱长协商，将他们安排在单独的牢房里。这样一来，白天他们会呆在一起，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到了晚上，他们就会被分开并被关起来，这是监狱条例中规定的。膳食仍由里斯本咖啡馆提供，该馆在下午5点左右提供膳食“

"他们缺乏财政资源，正如他们在离开法庭时向记者承认的那样。第二天，媒体报道说他们进入Cadeia da Relação时口袋空空，同一天在波尔图发起了一场帮助他们的运动。

里斯本咖啡馆的老板们为他们开了一个认购会，8月29日的认购额达到了35,500雷亚尔。在扣除每天约600雷亚尔的食物费用后，这笔钱将支付给他们。

监狱长从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那里收到2500雷亚尔，从另外三个人那里收到1500雷亚尔，每人500雷亚尔。一些人提供了衣服，其中伊莉莎因为换了衣服而特别需要。8月19日，她的一位姨妈赫苏斯-洛里加-兰代拉（Jesusa Loriga Landeira）在圣地亚哥去世，她对她感到非常亲近，她想为她哀悼，几个妇女为她提供了衣服，以便她能够这样做“。

"报纸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把读者寄来的钱送给他们。最突出的是Jornal de Notícias，其页面记录了8月22日至30日期间的18,000雷亚尔的捐款。北方报》从两位读者那里收到了1000元，《第一财经日报》从一位匿名女士那里收到了1500元。虽然一家咖啡馆和一家烟草店也从顾客那里筹集资金，但通过报刊输送的大部分捐款都来自个人。许多捐赠者是妇女，她们与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名儿童一起。后者名叫卡洛斯-埃雷拉（Carlos Herrera），他用一封"像他的灵魂一样天真"的信附上500雷亚尔。保罗-皮加苏（Paul Pigassou）从埃斯皮诺（Espinho）写道："对于这两个西班牙人，更值得同情而不是指责，我贡献了1000雷亚尔的小数目。另一封由Zulmira Marques在Régua签名的信，内容如下。

"在你的流行和人道主义报纸[Jornal de Notícias]上读到被囚禁在该市监狱的两个西班牙人缺乏生活资料，并完全同意你判断他们更值得"怜悯而不是严厉"的意见，认为他们和其他许多四处流浪的人一样是可怜虫，没有给警察让位，使他们如此蛮横地受欢迎，计算着他们如何为没有理智的女人的轻率行为付出代价，我附上了1.000雷亚尔，希望你能好心地把它们交给不幸的伊丽莎和马塞拉。"

"业余摄影师何塞-罗德里格斯（José Rodrigues）是邦雅尔丁街62号一家钟表和珠宝店的店主，他设法拍到了监狱里的伊丽莎和马塞拉。起初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知名度，但最后他们同意了，因为他们得到的承诺是，他们将得到出售肖像画的钱和转让给出版社的复制权的奖励。报纸鼓励人们购买这些照片："每个人都应该购买它们，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好奇心，因为这些肖像有能力在波尔图为他们的名字取得与他们在整个西班牙取得的相同的共鸣"，《新闻日报》写道。罗德里格斯于8月30日向他们赠送了17,000雷亚尔，相当于卖出了34份，这些钱被加到了已经交出的其他款项上。

„如果我们的计算是正确的，并考虑到摄影师的一次交付，被咨询的报纸收集和记录的总金额为77,000雷亚尔，尽管收到的金额可能会更高，因为可以假设媒体没有收集所有的捐款。例如，驿站司机们也计划筹集资金。观察人们帮助这两个西班牙人的意愿，不乏有人恰恰与他们的外国身份有关：如果他们是葡萄牙人，你就不会给予任何东西……，我们可以从《新闻日报》的幽默对话中读到”。

"生活在波尔图的西班牙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有几个葡萄牙人加入，直到他们的人数达到约500人，他们写信给西班牙恩典和司法部，请求宽恕。他们要求被允许在葡萄牙生活，在那里他们愿意以任何诚实的工作谋生。

这份文件包含一个简短的请求，尽管它完美地定义了这两名妇女的令人痛苦的处境，但也得到了大量葡萄牙公民的支持，其中有许多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杰出人物，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的，今天这两名囚犯只是灌输了深刻和合理的同情心。谁听了他们的话，都很容易相信他们是两个不负责任的人，所以他们没有准确地衡量给他们带来如此痛苦悲伤的喜剧的程度。

"Elisa还请求葡萄牙女王玛丽亚-阿梅利亚给予宽恕和保护，她在监狱里给她写了一封信，于8月21日寄到辛特拉，也就是他们出庭的同一天。

她声称，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可惩罚的。埃利萨对马塞拉有着兄弟般的友谊，马塞拉也以同样的感情来回报他。她永远不会抛弃她，无论她要经历怎样的沧桑。她恳求她的陛下，即葡萄牙女王，同意保护这两个不幸的女人，她们只是犯了罪，如果可以称之为犯罪的话，那就是

伊丽莎接受洗礼并作为男人结婚。他还记得，伊莉莎有一个非常亲近的亲戚，是西班牙国王的家庭教师。

我们知道，在葡萄牙的法庭上，有一些人对马塞拉的家庭非常了解“。

"或与胡安-洛里加，当时的导师--后来的副官--未来的阿方索十三世，他将在1902年命名为奥格罗夫伯爵；但我们没有证实马尔塞拉的家庭可能在葡萄牙宫廷中的知识，而且很可能是记者的简单忽悠或混淆：他把马尔塞拉写在他想写的伊丽莎的地方。

给葡萄牙女王的信并不是艾莉莎寄给宫廷的唯一一封请求理解和帮助的信。她还写信给西班牙驻波尔图领事和其他人。她还打算写信给维克多-科蒂埃拉，那个为他们结婚的牧师，据说他在波尔图。

"8月24日，《O Primeiro de Janeiro》的一名记者拜访了他们，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个谣言。他们回答说是的，他们通过一个西班牙朋友认识他。当Jornal de Notícias的编辑介绍自己时，是他们提到了这件事。

同一天早上，他们通过牢房的窗户看到一个牧师向监狱方向看去，他做了一个手势向他们问好，他们也做了一个手势。他们认为那是维克多-科蒂埃拉，尽管他们不能确定，因为他们和他之间有距离。当被问及他为什么在葡萄牙时，他们说他们非常喜欢旅行，而且他在波尔图可能是为了亲眼看到一个他无疑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故事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他们期望他能帮助他们，因为他是艾莉莎的亲戚、马里奥的教母雅各布-洛里加的亲密朋友。因此，他们都非常高兴，这让他们的对话者感到惊讶"。

"经过检查，结果发现他确实是个牧师，而且是个西班牙人，但不是科蒂埃拉：他们只在白发和袍子上有相似之处。记者找到了伊莉莎和马塞拉的朋友，她宣称在街上遇到了他，并向他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如果我们相信《O Primeiro de Janeiro》所写的，"他从她们还是小女孩时就认识她们"，"完全知道她们的生活和奇迹"。但"据《新闻日报》

报道，他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出于好奇才问的，因为他们是两个同胞。

第二天被告知，这个教士的相貌与科尔蒂亚拉的相貌不符--他又矮又胖，长相不错--伊莉莎惊呼："一定是英苏亚"，圣乔治的教士。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如果他在那里，是为了帮助他们，由洛里加家族派来。该记者对这一假设并不十分相信，但他认为否认这一假设也不合适。

"显然，由于据称来自阿科鲁尼亚的教区牧师出现在波尔图，新闻界正试图恢复一个即将耗尽的故事，需要新的成分。这一消息也被一些媒体以幽默的方式加以利用。Jornal de Notícias发表了一篇题为"已婚的西班牙人、父亲的王冠和鳕鱼油条"的文章。提交人写道，负责结婚的教区牧师曾要求理发师格里罗提供服务，制作王冠。当它被证明有点太尖锐时，他告诉他："好吧，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它变圆，就去找一个锻造厂。由于没有叉子，有人想到了让人送来鳕鱼油条，这可能完全适合这个场合。这项工作完成后，牧师对王冠和炸药很满意，当理发师完成工作后，他对这些东西作了说明。

在监狱里，看守们试图为埃莉萨和马塞拉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任何小服务，从而使他们的监禁更容易忍受。他们还因各种妇女的来访而松了一口气，这些妇女有的是葡萄牙人，有的是西班牙人，他们与她们友好地交谈。

"假装拜访他们的人之一是西班牙人拉蒙五世。洛佩斯，雇用过伊莉莎的裁缝。他们不接受他的存在，因为他们确信是他和吉纳罗萨告发了他们。他们要求960雷亚尔，相当于艾莉莎在他的车间工作9天中6天的工资。拉蒙不希望出现对逮捕负责的情况，所以他给媒体发了一封信，否认《第一日报》发表的信息。

伊莉莎确实在我家做裁缝，名字叫佩佩，穿得像个男人。但当一位阿拉贡女士来到波尔图，发现我给上述的伊莉莎工作时，她当着巴塔拉街40号为我提供食物的房主马诺尔和上述吉诺莎的丈夫、鞋匠马诺尔的面，讲述了她和她的同伴马塞拉的故事，正如上述报纸记载的那样，她不是我的妻子。

„上述两个人无法保留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他们通知了第119号警卫，并将Generosa通知了一名下士，这两名特工就是抓获这两名被告发妇女的人”。

"第二天，前一封信中提到的一个人，Manoel Méndez Leal，又写了一封信，否认他是申诉的作者。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愿意为这次逮捕负责。而且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艾丽莎和马塞拉的事业。起初，人们取笑他们，并对他们作为主角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发表淫秽评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开始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认为他们是两个可怜虫，而不是两个罪犯："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第一时间的不经意的冲动过去了，他们的仁慈很少会停止，以克服任何其他的情感"。Jornal de Notícias写道，当这个故事的这一章即将结束时，他们可以自夸"十四天来值得这个波尔图的关注，它是如此平静，如此善良，一开始对他们感到愤怒，最后采取了一种非常同情的感情，它接近于.....风景如画。奇怪和最奇特的是，民众的灵魂！"。

"新闻界与这种态度的改变有一定关系。埃利萨和马塞拉不希望记者报道案件的细节，他们在被捕时要求记者这样做。但既然名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决定利用它们向公众舆论传达对他们最有利的信息。在他们入狱的头几天，他们拒绝，特别是伊莉莎，与探访他们的记者交谈，尽管有些人确实设法与他们交谈。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澄清这种不寻常婚姻的原因。在被捕后的第二天接受询问时，他们再次援引了雌雄同体的说法。由于这种说法不可信，他们尝试了另一种辩护。

这场婚姻是不谙世事的女人的典型“愚蠢”，她们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使她们变成了两个“不幸的人”：“这是女人的愚蠢”；“我们是两个不幸的人”；“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马塞拉说，“而那个人，又是一个”，她指着伊莉莎。在另一次发表在《O Norte》上的采访中，他们坚持认为这段婚姻缺乏现实意义，其后果也很痛苦：“Auszug aus: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所以这次旅行已经是蜜月之旅了？”

“蜜月，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无法想象我们遭受了什么，”马塞拉说。自从他们登上从阿科鲁尼亚到邓布里亚的驿站以来，一切确实都是不幸、冲击和痛苦。在波尔图，他们因为正在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痛苦，也因为他们可能向西班牙当局投降。看到他们在葡萄牙引起的期待，不难想象他们在阿科鲁尼亚的出现会引起怎样的期待。伊莉莎是最担心这种情况发生的人。然而，她想的是，打扮成女人，丑闻就不会那么多了。

任何有机会在他们被剥夺自由时探望他们的人都能看到他们可怜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疲惫、苍白、黑眼圈、泪水、紧张、沮丧……。马塞拉声称，为了避免这种恍惚，她会免费工作五年，而伊莉莎则说她夺走了她百年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恢复了。葡萄牙当局—专员、法官和监狱长的好态度，新闻界的青睐，以及波尔图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居民提供的财政和情感支持，帮助缓解了他们的困境。他们还希望能从伊莉莎的叔叔洛里加中校那里得到的帮助寄予厚望。如果他们最终在西班牙受审并被判刑，将由他来获得摄政王的赦免。

自由“。

"8月29日，在法院没有对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作出裁决的8天审前拘留结束时，法官下令释放他们。负责向监狱当局传达这一决定的官员之前通知了警察局长，他指示勒布雷罗下士和第119号警卫--也就是16日找到他们的官员--在这两名妇女被释放后立即逮捕她们。

新的逮捕行动是凭借萨尔瓦多-米兰上尉发出的电报进行的。电报中提到了正在采取的获得引渡的步骤，并要求在这一外交要求得到解决之前，这两名西班牙人继续留在监狱中。

1867年6月25日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引渡条约第12条对该请求作出了规定。

"在紧急情况下，尤其是在担心逃跑的情况下，两国政府中的任何一方，根据对被告的定罪或签发的监禁令，或根据至少与上述监禁令具有同等效力的任何其他文件，可以通过最迅速的手段，甚至通过电报，要求并获得对被定罪人或被告的监禁，条件是尽快提交已被假定存在的文件。

在1873年2月7日对该公约的修订中，增加了三个条款，其中第三条对这一权利进行了限定：可以通过电报或任何其他方式提出拘留请求，但必须通过外交途径。此外，为请求国政府提供相关文件一定罪或合理的监禁令--规定了25天的期限，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被拘留者将被释放"。

"不过，专员理解，萨尔瓦多-米兰上尉的要求已经足够了。因此，在下午两点半左右，使者来到Cadeia da Relação，目的完全不同：法庭官员通知埃莉萨和马塞拉他们自由了，而警察则逮捕他们。在附近有大量"知道可能被释放的人，他们想看看这两个女人。

埃莉萨和马塞拉由他们的朋友诺盖拉陪同。他们推迟了离开的时间，因为他们被案件的刺激所震惊和惊吓。监狱长下令驱散围观者，他们被转移到附近的街道。最后，他们出来了，被送进一辆汽车，送到了警察局。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并试图隐藏自己的脸，一个戴着草帽，另一个戴着黑纱。

在描述他们的离开时，一些报纸只是强调了其引起的骚动："巨大的叫喊声"；"妇女们疯狂地拍手"；他们"在远处试图看到他们的人们的叫喊声中"上了车。Jornal de Notícias》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版本。在暗指埃莉萨和马塞拉对他们将受到的可预见的嘲弄的恐惧之后，它总结道。

„最后，我们人民的善良本性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人看到他们上了车，但都是悄悄地，在他们的相貌上印着怜悯的音符。很明显，每个人都在期待着看到她们获得自由，以至于当汽车开走时，人群中的沉默爆发出对这两个女人的热烈欢呼。"

"他们一到警察局，总警监就告诉他们，由于上述电报，他们又被拘留了。然而，他将尽量使这种剥夺自由的行为不造成痛苦，因此他将要求监狱当局对他们给予最大的关怀。他们甚至可以在监狱内的一种花园里走动。此外，他们被告知，明显无视不矛盾原则，"他们要去阿尔久贝，但他们不会留在监狱里"。

这两个女人感谢对她们的尊重，并再次以两个"不幸的人"自居。他们顺从地接受了提供给他们的命运，无论如何都比在离开监狱时逮捕他们的一名特工宣布的命运要好，根据该消息，他们将在同一天被带到边境并被移交给西班牙当局。负责他们案件的律师阿尔瓦罗-德-瓦斯康塞洛斯（Álvaro de Vasconcelos）已经准备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但最终他的干预没有必要“。

"他在监狱中的逗留时间将取决于专员打算在同一天与民事省长进行的协商。在给他的信中，他向他通报了事实，并请他指示如何行事。

第一刑事区的法官下令释放我在本月18日的信中提到的西班牙人Elisa Sánchez和Marcela García [原文如此] Ibeas。我再次命令在Cadeias da Relação的出口处逮捕他们，因为在这个综合警察局，根据我给阁下的电报，有一个逮捕他们的请求，"其中说，已经命令准备引渡程序，因为他们正在西班牙的A Coruña被起诉。

我恳请阁下给我指示，让我如何行事。

答复是立即的。在审查了1873年2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引渡协议和1871年9月7日的决议之后，"两名西班牙人Elisa Sánchez和Marcela García[原文如此]Ibeas将被释放，因为没有收到政府关于逮捕他们的命令"，尽管认为让他们继续受到警察的监视是明智的。因此，拘留是不合适的，所以专员被迫释放他们。因此，我们的主人公在一天之内被关进了两个监狱--Aljube监狱和Cadeia da Relação监狱--并两次被释放。

"报纸借机批评警察的行为--"我们这个著名的警察"，《A Voz Pública》说--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像《O Primeiro de Janeiro》所说的那样完全赢得"金刺"。专员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式处理的引渡程序的情况下重新监禁了这两名妇女，甚至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请求逮捕她们，而这是自1873年以来唯一被授权的渠道。其依据是维哥船长的一份简单的电报，有些人将其描述为„怪异“。

"最强烈批评警察行动的报纸是A Voz Pública。这两个西班牙人是按照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绅士"的命令被逮捕和监禁的--这是报纸对萨尔瓦多-米兰的称呼，报纸称他是阿科鲁尼亚国民警卫队的骑兵团

长--警察甚至准备把妇女交给他，遵循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无视监管渠道。他最后要求民事长官"抓住警察.....缩短"，因为他是本案中„唯一的违法者”。"

"Elisa和Marcela的获释受到了所有媒体的庆祝，这也呼应了港口大多数人的感受。

公众舆论怜悯这两名妇女的命运，对警方的程序高度满意。不幸的妇女因此摆脱了被西班牙人讽刺的耻辱--在她们所有的不幸中，这正是她们最害怕的事情（Diário da Tarde）。

如果不是因为两个毫无防备、毫无保护的女人，这一切早该完成了，而且早该完成了。（Jornal de Notícias）。

"他们获得自由的消息在黄昏时分传到了阿尔久贝，让这个故事的角们充满了喜悦。问题又来了，如何出去，因为有很多人在等他们。看着人群，马塞拉惊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怎么出去？最后，有人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从一扇通向贝恩哈利亚街的门出去，来智取围观者，而这扇门只有女校长和她的家人使用。他们这样做了，并上了诺盖拉为他们准备的车。当时大约是晚上八点半，所以这第二次在监狱里的逗留只持续了大约六个小时。

车子把他们带到了里斯本咖啡馆老板的家里，老板给了他们食宿。最后，在这样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紧张日子之后，他们可以休息了。在律师的建议下，他们打算„至少在'严格隔离'中呆八天，他们已经受够了"。

"但在从公共舞台上消失之前，他们想感谢人们对他们的关注。30日晚，在诺盖拉的陪同下，他们访问了《新闻日报》的编辑部，该报是

对该案报道最广泛的报纸之一，也是最有力地捍卫他们的事业的报纸。她们被打扮成“我们国家谦虚的资产阶级妇女”，有些畏首畏尾。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坐在沙发上，由玛塞拉表示感谢。短暂的访问结束时，玛塞拉挥手告别，伊莉莎“带着她以往男性的疏离感起身，绕过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的桌子，使劲地和我们握手，以至于我们的一个同伴笑着对她说：‘再见，马里奥先生！’。

“除了感谢《新闻日报》的编辑们给予他们的待遇外，他们还要求他们发表一封信，对所有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帮助和支持的人表示同样的感谢。同样的或类似的信件被寄给了O Norte公司，该公司也将其公开。由Elisa和Marcela签署，并由两家报纸以西班牙语发表，略有不同，内容如下。

“今天，我们不得不拿起笔来表示感谢--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甚至觉得我们的小小表达是冷冰冰的，不太能表现出我们对我们的渺小和无足轻重的人的行为和不应有的关注的诚挚感情和永恒的感激。因此，我们恳请您在您所指导的报纸专栏中留出空间，向您、当局和社会机构以及里斯本咖啡馆的董事或业主，特别是诺盖拉先生，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因为媒体并非不知道，他已经是里斯本咖啡馆多年的业主。正如新闻界所了解的那样，我们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些可怜的不幸的妇女，她们缺乏任何支持，因为她们在自己的国家之外，而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她们找到了当局的支持，找到了我们不幸不得不经常去的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一般的人民，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亲爱的朋友，我希望这封拙劣的信能表达和命令我们对上述所有个人的无限感激，包括唐-何塞-罗德里格斯，他今天给了我们17,000雷亚尔，这是出售照片的收入，这笔钱加上已经给的钱，起到了缓解我们部分苦难处境的作用¹⁹。”

"马塞拉有一个女儿

当葡萄牙记者或多或少地以幽默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时，几乎总是提到母性问题，尤其是父性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没有男人的婚姻，那么它也应该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婚姻，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想说的是，这些女士们

递交给应急委员会

de morrerem, coitaditas,

sem deixarem descendencia..."

"但与此同时，有传言说马塞拉怀孕了，所以有些人在等着看"结果如何"。

是的，这是个好主意。

争取获得更多的收入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拒绝接受请求

P'ra ver-se o que é que sae ! ..."

"好吧，在1902年主显节，疑虑终于解决了，或者至少是部分解决了：马塞拉生下了一个女孩。

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继续住在波尔图，正如他们被拘留时的打算。孩子出生后，他们住在位于巴塔拉街的直布罗陀酒店，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之前是否曾住在其他地方。为帮助他们而筹集的资金，加上他们以后可能从加利西亚和葡萄牙获得的其他援助，以及他们的工作成果，使他们在几个月里得以维持生计。

"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工作。他们愿意从事任何诚实的职业，即使这与他们的专业资格不相符。很有可能马塞拉做过裁缝--也许是代表里斯本咖啡馆--她能在自己家里做，因为她怀孕已经到了晚期，所以她没有离开过这个家，所以有些人认为她没有住在波尔图。而她的朋友则每天都去邦雅尔丁街，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Elisa正在等待必要的文件从加利西亚运来，以使她在葡萄牙的情况正常化，这将由律师Álvaro de Vasconcelos负责。我们不知道她是否最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所处的条件对这种法律程序来说不是最有利的，因为他因被指控在葡萄牙犯下的罪行而等待审判，而且西班牙提出了引渡请求。

他们正在过着谨慎的生活--放弃了律师建议的"严格的回廊"，如果他们曾经实行过的话--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某种心灵的平静，在经历了前几个月的沧桑之后，这一点尤其必要。人们肯定不会打扰他们，甚至会继续表示声援，当然，与"两个已婚的西班牙人"的故事不可避免的影射，或多或少的精辟。新闻界也是如此，自1901年8月31日以来就没有处理过这些问题"。

"这种平静在1902年1月8日结束，其主要喉舌和支持者《新闻日报》上出现了以下标题。

仍然是模拟婚姻中的两个西班牙人

他们爱情的结晶...

"一个女婴的性别

起初，记者们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谣言是真的：马塞拉生下了一个"美丽而强壮"的女婴。毫无疑问，她是母亲，但就父亲而言，这都是猜测，其中有些是冒险的。Jornal de Notícias》提出了两种假设。

第一种被认为是最合理的，即马塞拉怀孕是因为她与一个年轻人的恋情，而她那形影不离的朋友与她结婚是为了使这种情况正常化，使她在未婚的情况下免于生孩子的羞耻和问题。

"这正是这对夫妇在A Coruña的El Noroeste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此案的第一份资料中所作的解释。事实发生在Corcubión司法区的一个教区，主角仍然是匿名的。只说他们是一名教师，"年轻貌美"，和她的表妹，他们住在一起，"非常喜欢对方"。当"老师开始感到不舒服时，就出现了并发症，在当地一位聪明的观察家曼蒂诺布尔-雷波拉

(Mantiñobre y Repolleira) 看来，她生病的所有症状似乎都是一种有固定治愈期限的疾病的表现。

"La Voz de Galicia"还在多个场合提到马塞拉可能怀孕。在1901年6月22日的版本中，它想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可能是结婚的原因，然而，它补充说，有机会见到这位老师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她正在期待一个孩子的任何症状。七天后，他说在本报编辑亚历杭德罗-巴雷罗去的邓布里亚，没有人相信马塞拉已经怀孕。然而，人们承认，她曾与一名年轻男子发生过关系，"被伊莉莎的巴掌猛烈打断"。

葡萄牙媒体也对怀孕的假设进行了报道。Jornal de Notícias、O Norte和Tarde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尽管A Província否认了这一消息："Auszug aus: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Narciso, the man who was pregnant"。

"有传言说，而且似乎有报纸也在附和这一传言，马塞拉-伊贝斯已经怀孕。这个事实并不真实，它只是马塞拉采用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人觉得她的丈夫是一个完美的人，就像她所说的那样，而伊莉莎已经宣布了相反的事实。

事件的时间顺序与婚姻与怀孕的归属一致。孩子出生于1902年1月6日，所以马塞拉可能是在前一年4月的头几天怀孕的。一个多月后，5月19日，伊丽莎成为马里奥。

如此说来，这个故事确实扣人心弦。Jornal de Notícias说，在作家们为他们的浪漫小说设计的所有结果中，没有一个“像这个一样令人兴奋”。但与此同时，该报又报道了第二个版本，甚至更刺激，“这必须让一半的波尔图人三思，他们对这两个朋友感到非常遗憾”。它的内容如下。

“我们被告知，马塞拉在生下一个健壮的孩子之前，是无暇的！”。

她将是夏特内恋情的处女母亲。

伊莉莎，这个西班牙男人，另一种爱情的真实特征得到了满足，她会从另一种性质的爱情中带出一种母性的萌芽，她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萌芽传给了马塞拉。

我们就此询问了助产士本人，她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她告诉我们，临产的马塞拉已经承受了五天的产痛，并且有纯洁的痕迹。

昨天与我们交谈的Elisa也提到了分娩的巨大困难，她告诉我们，发育非常好的婴儿已经危及到了母亲的生命。

“现在兴奋之余，又对孩子出生的主显节日产生了幻想。在出生时有处女的痕迹似乎是可行的，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说，医生和科学家们忙于辩论这个问题，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受精是如何发生的，是伊莉莎在她所谓的雌雄同体的情况下负责，还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第三方负责，由伊莉莎充当中间人？”

同一家报纸负责幽默版的人忍不住对这样一个怪异的事情进行了嘲弄他以“没有父亲的女儿！”为题，用西班牙语发表了一篇关于女孩亲子关系之谜的对话。

-天啊！那她的父亲是谁？

-她仍然没有父亲？

-什么？

-她的父亲是... Donna Elisa!

-一个男人！

-他曾经是一个男人，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女人。

[...]

-如果不是多纳-埃利萨，那就不是别人了。

-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我告诉你马塞拉夫人像个瓜子....

-一个甜瓜... 钙化了!

"不，先生！要被计算！"。有认识的人说...

-那么？

-所以这是个奇迹! 马塞拉是非常纯粹的... 马塞拉通过自发生成了一个女婴，就像虫子一样.....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助于这两个女人，于是《新闻日报》的编辑来到了直布罗陀酒店。当他进入时，他看到伊莉莎在楼梯的平台上，她正端着一杯鸡汤前往马塞拉所在的房间。当她注意到记者在场时，她表现出不高兴，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公众关心孩子的父亲是什么？-是男孩还是女孩，是另一个世界的问题吗？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一个女人有了一个孩子。

-但两个女人生一个女儿，你必须同意，这是很不自然的！"

-好吧，我的朋友，好吧，好吧，这就够了!-我们又不是两个罪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婚姻！ -他的女儿

"

"伊莉莎结束了谈话，记者也没有坚持。Jornal de Notícias尽管已经警告说它不会放弃获取更多信息，但没有回到这个话题。它的编辑知道，第一个假设是好的假设。对于第二种情况，他可能只是想为该案增加新的诱因，以继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其他媒体，如《O Século》和《A Mala da Europa》，都来自里斯本，只限于在一篇简短的文章中总结《新闻日报》发表的内容，而且大多数媒体什么都没说。他们决定在这一人生的新阶段尊重这两个女人的隐私。

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女儿，这无疑是快乐的源泉，但也是担忧的源泉，由于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状况，这种担忧更为强烈。这些忧虑因他们面临的审判和引渡而变得更加复杂。

"波尔图检察院的代表通知民事长官，"对埃莉萨-桑切斯-洛里加的审判"定于1901年12月7日举行。但在同一天，警察总署署长通知他的上级，尽管知道有传票，但埃莉萨没有出庭。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两份文件中都没有提到被指控为共犯的马塞拉"。

"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信息是由波尔图文官政府发给王国部的电报提供的，日期是1903年1月22日，保存在里斯本托雷-杜-通博的国家档案馆。

关于阁下昨天电报中提到的西班牙妇女，我已经了解到，而且警察总署署长也告诉我，她们被审判并被宣告无罪，尽管受到监视，但她们还是离开了加利西亚，在阿科鲁尼亚或维拉加西亚登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伊莉莎是六七个月前，马塞拉是三四个月前。

那么，似乎这两个人都被审判并被宣告无罪。我们不知道举行审判的具体日期，但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肯定是在1901年12月至1902年4月之间。法官在对指控进行评估后，可能响应了公众舆论和妇女自己的意见，认为她们“已经为她们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得到了很好的惩罚”，正如媒体所强调的那样，决定释放她们。他不想增加他们的困难，尤其是现在，他们必须照顾孩子”。

“司法判决比一些报纸预测的要宽松。O Primeiro de Janeiro了解到，Elisa可能因异装癖和使用假名而被处以15天至6个月的惩戒性监禁。法院不应考虑伪造居住证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被使用过。就马塞拉而言，同谋的指控是不一致的，所以她应该被释放。A Voz Pública认为，他们都应该被宣布为无罪，因为他们没有在葡萄牙犯下任何罪行”。“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葡萄牙政府接受了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引渡请求：一旦他们受到审判，并在适当情况下服完所判刑罚，他们将被移交给邻国。由于他们没有被定罪，他们将被逮捕并立即移交。

但警察没有负责他们。而这并不是因为行动中的困难：只要在他们离开Cadeia da Relação时，以当时部署的同样的勤奋行动来逮捕他们就足够了，特别是在这个场合，警方的行动会有法律保障。

为什么他们在葡萄牙被宣告无罪后，没有被逮捕并被带到边境？给阿梅利亚女王的宽恕信有什么效果吗？伊莉莎的叔叔，未来的阿方索十三世的家庭教师，是否施加了任何影响？他们在波尔图的辩护人是否设法阻止他们再次落入警察手中？仅仅是警察效率低下吗？是局长的良心不安，由于他以前的违规行为，使他在这一场合故意玩忽职守？

„无论如何，葡萄牙是一个不再能够应付的避难所。鉴于西班牙为使其投降生效而施加的压力，警方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逃避。再一次，是逃离的时候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01年6月底，当埃莉萨和马塞拉从阿科鲁尼亚失踪时，南美是她们被指定的目的地之一，尽管实际上她们直到1902年才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先是埃莉萨，然后是马塞拉--沿着成千上万的加利西亚人和越来越多的加利西亚妇女曾经走过并将继续走下去的相同道路。众所周知，我们的移民起初基本上都是男性，但随着20世纪的发展，女性也强势加入了移民大军。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有利于加利西亚家庭逐渐关注女儿的小学教育的因素之一，在整个19世纪，人们对女儿的小学教育很少关注。

"爱情是这些妇女中许多人移民的起源。有些人是在丈夫或男友的要求下移民的，他们一旦定居下来，就希望丈夫或男友能在自己身边。其他人则是为了寻找丈夫而离开，因为鉴于加利西亚巨大的两性不平衡--1900年，每100名妇女只有79名男子--主要是由移民造成的，女性独身主义在这里很普遍。爱也是促使埃莉萨和马塞拉离开的原因，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爱，只寻求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的环境。

与葡萄牙一样，阿根廷也是许多逃避西班牙司法的逃犯的避难所，但为了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必须要有证件和旅行的钱"。

"法律程序给Elisa和Marcela带来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即证明他们的新身份：分别是María Sánchez和Carmen Gracia。通过这种部分身份的改变，他们打算摆脱那些他们已经取得了令人不快的名声的名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能有不同人的共谋和合作。

他们也不缺钱，在1897年，最便宜的票价相当于一个工人在加利西亚工作一百天的价格²¹。显然，一个熟人给了他们一些钱，还把他们的推荐信推荐给阿根廷首都的一个有地位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钱。马塞拉是否设法掌握了她父亲留给她的3000雷亚尔？在这样的困难时期，"艾丽莎的母亲是否有能力为她的女儿提供任何经济帮助？

证明玛丽亚-桑切斯（Elisa）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证书

他们分开旅行，就像他们在葡萄牙避难时一样。这次的分离可能是受马塞拉女儿的年龄所限，伊莉莎上船时她才三个多月大。在踏上如此漫长和不舒服的旅程之前，让她再长大一点是明智的。然而，伊莉莎等不到孩子了，因为西班牙政府要求引渡她。马塞拉也是如此，但在阿科鲁尼亚对他们提起诉讼的主角无疑是扮演过马里奥的人。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最初他们只有能力支付一张票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些情况，优先考虑Elisa是合理的。

"她于1902年5月15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诺德尼号上。她是在大约20天前在维拉加西亚-德-阿鲁萨登船的，这个日期与已经转载的波尔图文官政府给王国政府部的电报中记录的日期相当接近。根据护照上的信息，她的名字叫玛丽亚-桑切斯，36岁，单身，信奉天主教，没有特殊职业"。

"卡门，也就是马塞拉，在1902年9月至10月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由她的女儿陪同。在那里，伊莉莎会不耐烦地等着他们，并会在感情上拥抱他们。这也难怪，毕竟他们在最近几个月里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在这种情绪之外，还希望在一个同胞众多的城市开始新的、更有利的生活。

在阿根廷首都，他们有一个保护者，他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在那里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缺。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所以他们被迫去找工作。他们在家政服务方面找到了工作，这是加利西亚移民中最常见的职业。根据1894-1910年期间的数据--与1855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相似--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妇女有一半以上，准确地说是63%，在这个部门工作²²。还有1%的教师和护士，玛丽亚和卡门属于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专业资格比普通的加利西亚移民群体高得多。"这种就业方式不允许两个朋友住在一起，尽管伊莉莎没有长期从事女仆工作。1903年9月30日，下午两点，她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事登记处，与克里斯蒂安-延森结婚。结婚证上写着新娘37岁--实际上她已经41岁了--她来自阿科鲁尼亚，她是单身，并宣称自己是一名"教育家"。新郎六十四岁，来自丹麦，单身，是一名"chacarero"（农民）。他们都住在阿根廷首都，在同一条街和同一栋楼里：Buen Orden，545。婚姻由Poncio Carminola和Manuel Casás见证“。

"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年龄上的差异：几乎四分之一世纪。尽管在本案中，爱情可能不分国界--甚至不分年龄--但也许可以怀疑这桩婚姻是出于这种情感²³。

詹森在伊莉莎服务的房子附近拥有一家小商店，两人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会面是不可避免的。两人之间形成了某种熟悉的关系，伊莉莎并不缺乏想法，她构思了一个新的计划，使她能够离开家政服务，并在一段时间后恢复与朋友的生活：嫁给丹麦人。

"他们结婚后，詹森卖掉了生意，并决定与妻子在班德拉罗定居，他在那里拥有一个农场。和在波尔图一样，在班德拉罗的蜜月也变成了蜜月，不过是出于其他原因。伊莉莎的心情总是不好，没有办法让她开心，所以夫妻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此外，对詹森来说，这应该不是一件小事，他的妻子拒绝完成这段婚姻。

在马塞拉在孩子的陪同下到达农场的那天，他重新获得了快乐。伊丽莎介绍说她是她的妹妹。他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表达的感情是无止境的“。

"如此多的欢乐和感情并不符合克里斯蒂安的喜好，他甚至开始嫉妒，由于前面提到的情况，"他的妻子没有如此符合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加剧了嫉妒。

因此，这位好奇而又失望的丈夫决定去首都，以澄清在他头脑中沸腾的一些问题。他去了城南的B先生家，Elisa曾在那里当过女仆。他坦白了他的婚姻所经历的困难，并要求提供有关他所娶的女人的信息。经过"多次劝说，她被告知"没有男人的婚姻"的故事。在收集了其他地方的信息后，他终于"深深地相信，他与卡门-格拉西亚的丈夫马里奥-桑切斯结婚，而卡门-格拉西亚则被说成是他妻子的妹妹"。

根据这些信息，詹森重构了他与玛丽亚/何塞/马里奥/埃里萨的关系轨迹。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一切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妻子对卡门/马塞拉的到来感到高兴，她不愿意有性....。也是在那时，他开始怀疑玛丽亚嫁给他是"出于犯罪目的"，他不仅可以指控她"重婚"和"模拟"，还可以指控她"谋杀未遂和欺诈罪，并列举了似乎可以证明其论断的事实和情况"。

„我们完全不知道詹森认为他的妻子试图杀死他所依据的事实，《国家报》报道了这一指控，但《新闻报》等其他处理该案的报纸没有报道。这可能是丹麦人毫无根据的怀疑，他被他所经历的情况所蒙蔽，认为没有危险，或者至少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危险。

"然而，让我们接受一个假设，即伊丽莎打算摆脱她的丈夫，她甚至做了一些尝试，或者她只是在焦急地等待他的自然死亡。她要嫁给他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能够放弃她的家政服务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不允许她与朋友一起生活。为此，她会选择一个年事已高的人，而且无论如何，他也不会会有很多年的寿命。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不会有性

方面的要求，当她死后，他将继承班德拉罗农场，最后，他将在那里与卡门和孩子幸福地生活。

一个类似的假设，虽然转换成了论文，但在詹森的脑海中正在形成。由于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他咨询了一名律师，律师建议他提出申诉。该申诉援引了《刑法》的条款，该条款规定，凡是明知存在决定婚姻绝对无效的障碍而缔结婚姻的，将被处以3至10年的监禁。

„负责此案的法官是加列戈斯博士。负责此案的法官是加列戈斯博士，他着重于确定被告的性别状况：她是男人还是女人？正如新闻界所警告的那样，这项测试必须是科学的。而法官认为一个医生是不够的，所以他把这件事委托给了三个。除了在阿科鲁尼亚认出她的两个人--德乌斯和巴尔贝托，现在有五个人。矛盾的是，现在伊莉莎想成为一个女人，她的丈夫质疑她是否是一个女人，而以前，当她想成为一个男人，或者至少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时，除了马塞拉，没有人承认她是这样的人”。

Chinesisch

"据阿根廷首都出版的《拉普拉塔信使》（Le Courrier de la Plata）报道，体检提供了关于玛丽亚"体质"的技术细节，这"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她与詹森缔结的婚姻永远无法被祝圣"。这些细节是否指的是任何特征，无论多么轻微，都可以被同化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双性行为？这是否是负责这条新闻的人的清醒认识？这位记者自己也承认，根据医生的说法，"玛丽亚-桑切斯确实是个女人"，并向她的丈夫建议"他应该原谅她的小身体缺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媒体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缺陷"，《国家报》甚至说，与医生的意见一致，玛丽亚"完全享受了她的性生活"。

"无论这些争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医生与阿科鲁尼亚的医生意见一致，并一致宣布玛丽亚，也就是伊莉莎，是一名女性。一旦

知道了这个意见，法官得出结论，该婚姻是完全有效的，因为它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缔结的，至于其他被玛丽亚否认的指控，他认为没有证据，所以他决定驳回该案件。

从那时起发生了什么，你会问，你也会问我。我们不知道，只要没有出现能让我们确定的资料，我们就不得不通过诉诸想象来填补文献的空白，而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做到的。我承认，我的想象力被迫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总是在立足于资料来源的情节中，并试图提供必要的线索，使人们意识到这种叙述许可的使用。

这是一个被截断的结局，正如米歇尔-福柯所处理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只有在权力关注他们的时候和程度上才是可见的：“Auszug a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那股力量跟踪着这些生命，追寻着他们，关注着他们的哀叹和他们的小叮当声，哪怕只是一瞬间，并且用爪子在他们身上做了记号，正是这股力量激起了他们身上残留的文字，要么是因为有人求助于它来谴责、抱怨、请求或恳求，要么是因为这股力量本身决定介入，在简短的句子中判断和决定他们的命运。所有那些注定要在任何话语之外流逝，并在不被提及的情况下消失的生命都留下了痕迹—简短、精辟，而且往往是神秘的—由于他们与权力的瞬间交易，所以不再可能重建他们“在自由状态下”的样子²⁵”

“这正是埃莉萨和马塞拉的情况。是传统的权力—教会、司法、警察、监狱、医疗和学术—也是新的和日益相关的权力—媒体—使他们摆脱了匿名状态。我们通过这些事例中产生的话语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因此，前面几页进行的传记重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权力的注视的污染。我们对他们“在自由状态下”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说几乎一无所知，而

且除了零星的信件或采访之外，我们对他们本人也知之甚少。而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在扭曲它的背景下陈述的。是权力让他们说话。

过程

Elisa和Marcela缔结的婚姻引发了教会、学术和司法机构的干预，这些机构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在各自的主管领域采取了相关措施。教会当局特别参与此案，觉得他们被嘲笑了。如果说存在“无主婚姻”，那是因为一位教区牧师首先同意为马里奥进行洗礼--经圣地亚哥大主教授权--然后将他与马塞拉结婚²⁶。

据媒体报道，曾参与该婚姻的几个人被传唤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作证。除科尔蒂亚拉外，埃莉萨的母亲（她说她没有关于女儿的消息）和邓布里亚的教区牧师等人也作了证。除了1901年7月3日在《La Voz de Galicia》上发表的内容，我们对所做的决定一无所知。

"在马塞拉-格拉西亚和埃莉萨-桑切斯结婚之际，教区的一个教会法庭进行了简易诉讼，废除了所有的婚礼证书，包括市法院的证书，而且还同意将责任推给法院，以亵渎罪的名义对这两个女人进行处罚。这段婚姻，如果它应该仍然存在，尽管它是非法的，也已经被取消了。

"但事实是，在阿科鲁尼亚民事登记处和圣豪尔赫教区保存的婚姻记录中，没有提到马里奥和马塞拉缔结的婚姻的独特性，马里奥的洗礼证书也没有记录任何特殊性，至少在我五年前有机会查阅这些记录时是这样。

1993年或1994年，我访问了圣地亚哥教区历史档案馆，目的是查阅这一婚姻记录，但事实证明搜索没有结果，就像与一些人所做的努力一样，这些人由于条件所限，可以接触到这类文件。”

“多年后，大约在2000年，我再次尝试我的运气。我在这个档案馆里研究另一件事，我趁机向阿科鲁尼亚的圣豪尔赫教堂索取婚姻记录。最后，他们到了。我要求提供那些“对应于1900-1901年的资料，他们没有任何障碍地提供了这些资料。我翻阅了文件，相信这次我一定能找到我要找的文件，因为文件的顺序和编号都很完美。但当我走到编号为55的那张时，发现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张纸，两面都写着。一面是一张纸条，没有日期，是由某个安东尼奥写给维克多-科蒂亚拉的。

尊敬的朋友：我很高兴向您推荐桑切斯的遗孀玛丽亚-洛里加夫人，您将为她做我所要求的一切符合正义和理性的事情。我最诚恳地请求你。

“另一边是几个被称为“证人”的人的名字--我们推测他们是在发生的诉讼中被传唤作证的一些人--包括作为圣职人员参加婚礼的赫利奥多罗-雷伊。这无疑是艾莉莎和马塞拉的档案的遗留物，有人使之消失。2007年12月，我做了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来咨询它。

由于我们缺乏数据来分析教会当局的干预，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和司法程序上²⁷”。

纪律文件

学术机构对马塞拉的档案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与其他文件相比，该文件的数量并不多，标题是“Antecedentes sobre el abandono en que dejó la Escuela completa de niñas de Dumbría la

Maestra doña Marcela Gracia Ibeas" (关于教师Marcela Gracia Ibeas放弃Dumbría女子学校的背景资料)。原则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到目前为止，部分或全部放弃教学职责是这些纪律程序的主要原因。里面有一份1901年6月22日的《加利西亚之声》(La Voz de Galicia)，被仔细折叠，保存完好。这件事显然产生了一些公众反响，尽管这也并不令人惊讶。不寻常的是，当我展开报纸，"读到一个鼓鼓囊囊的标题："喧闹的事件。一个没有男人的婚姻"。在La Voz de Galicia发布消息的同一天，A Coruña的民政长官和省公共教学委员会主席Antonio Valdés向Dumbría的市长和地方初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发出一封公函，内容如下。

鉴于首都当地媒体发表的严重言论，特别是《La Voz de Galicia》报纸第6期上发表的言论。325，对应的日期，这是所附的，针对Doña Marcela Gracia Ibeas，本镇议会完整的女子小学教师；我已命令你指示董事会以最大的努力进行调查上述教师的专业、道德和宗教行为，听取教区牧师、家长和邻居的更大的诚信和根；将程序与本公司的报告，发送到我的总统府，以达到法规的要求。"

这封信的副本已寄给校长，日期也是6月22日，同时还有上述报纸的副本，可能就是我在1993年查阅的那份报纸。四天后，校长联系了Dumbría市市长，要求提供有关该教师的信息。他想知道，"为了公共教育"和"不浪费时间"，女子学校的校长是否负责该校，如果不是，她什么时候缺席，有什么授权。

"上级部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展工作，尽管该案件也是前所未有的。与处理这类案件时通常发生的情况相反，市政当局也没有花很长时间来答复。6月28日，Dumbría市市长Bernardo Canosa在收到校长办公室来文的一天，"非常遗憾"地通知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当局，该教师在没有得到市长办公室授权的情况下于6月25日离开该市，更

不用说省公共教学委员会了，因为后者已下令进行纪律处分程序，该程序正在处理中。他还继续说。

"考虑到Marcela Gracia Ibeas夫人所遭受的严重不幸，为了避免她继续担任本镇教育主管可能产生的丑闻，并希望女孩的教学不受丝毫阻碍，我恳请阁下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女孩的教育不受丝毫阻碍。我恳请阁下在必要时任命一位新的教师来代替业主，同时给予适当的指示，让她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上述的Marcela Gracia女士没有辞职，也不知道她离开时是否打算回来。"

"鉴于这份报告，7月3日，校长办公室向省委员会发出两封公函。其中，马塞拉被停职和半薪，并被命令加快处理档案。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教师被任命取代她的档案。另外，曼努埃拉-阿尔瓦-奥特罗被任命为代课教师，她将获得与该职位所有者相应的一半工资。这些信的副本将被寄给受制裁的教师，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信是否到达她手中，因为她当时已经在葡萄牙。

最后，在7月15日，校长撤销了停职和半薪的决定，并宣布该教师属于1857年通过的《公共教学法》第171条的范围，这意味着她将被开除教职。同一天，杜姆布里亚的代理教师曼努埃拉-阿尔瓦-奥特罗被任命为替代者。

"该决定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她在没有适当授权的情况下离职，二是《加利西亚之声》在6月22日报道的"严重事件"，后来被其他媒体转载，而该教师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对学术机构来说，上述法律第170条规定的决定性指控是教师的道德行为，这是民事长官最初干预的原因，而不是她暂时放弃了她的职位。事实上，1893年因后一种原因对马塞拉本人提起的诉讼被驳回了。但孔波斯特拉当局认为最好是援引第171条，因为该条简化了手续--它规定任何未经授权离开任职地的人

都要辞职--而不是援引第170条，因为该条要求对马塞拉的道德行为进行评估，并进行性质微妙的考虑和讨论。

"这类案件所涉及的步骤之一包括按照民事长官在其最初的公函中的命令，向邻居取证，了解被指控教师的行为。鉴于事件发展的速度，邓布里亚的当地人可能没有被传唤作证。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的证词会对马塞拉有利，至少在专业方面是这样。前往该镇的La Voz de Galicia的编辑证实了这一点。一些邻居告诉他，随着这位老师的离开，"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失去了很多，而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在学校里被她以上帝的方式教导。我们不知道他们对她的道德行为有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这与教书相符，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塞拉结婚后继续教书，具体到6月25日，她离开邓布里亚的时候"。

另一方面，"La Gaceta de Galicia"认为马塞拉和埃莉萨作为教师的行为是绝对不相容的。6月23日，它表示不会对该案件进行报道，但它确实想"对这一丑闻涉及两名拥有学位并负责教育年轻人的妇女感到遗憾"，并在最后暗指"这个不幸的西班牙的再生"，而这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鉴于这份报告，7月3日，校长办公室向省委员会发出两封公函。其中，马塞拉被停职和半薪，并被命令加快处理档案。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教师被任命取代她的档案。另外，曼努埃拉-阿尔瓦-奥特罗被任命为代课教师，她将获得与该职位所有者相应的一半工资。这些信的副本将被寄给受制裁的教师，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信是否到达她手中，因为她当时已经在葡萄牙。

最后，在7月15日，校长撤销了停职和半薪的决定，并宣布该教师属于1857年通过的《公共教学法》第171条的范围，这意味着她将被开除教职。同一天，杜姆布里亚的代理教师曼努埃拉-阿尔瓦-奥特罗被任命为替代者。

"该决定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她在没有适当授权的情况下离职，二是《加利西亚之声》在6月22日报道的"严重事件"，后来被其他媒体转载，而该教师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对学术机构来说，上述法律第170条规定的决定性指控是教师的道德行为，这是民事长官最初干预的原因，而不是她暂时放弃了她的职位。事实上，1893年因后一种原因对马塞拉本人提起的诉讼被驳回了。但孔波斯特拉当局认为最好是援引第171条，因为该条简化了手续--它规定任何未经授权离开任职地的人都要辞职--而不是援引第170条，因为该条要求对马塞拉的道德行为进行评估，并进行性质微妙的考虑和讨论。

"这类案件所涉及的步骤之一包括按照民事长官在其最初的公函中的命令，向邻居取证，了解被指控教师的行为。鉴于事件发展的速度，邓布里亚的当地人可能没有被传唤作证。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的证词会对马塞拉有利，至少在专业方面是这样。前往该镇的La Voz de Galicia的编辑证实了这一点。一些邻居告诉他，随着这位老师的离开，"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失去了很多，而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在学校里被她以上帝的方式教导。我们不知道他们对她的道德行为有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这与教书相符，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塞拉结婚后继续教书，具体到6月25日，她离开邓布里亚的时候"。

另一方面，"La Gaceta de Galicia"认为马塞拉和埃莉萨作为教师的行为是绝对不相容的。6月23日，它表示不会对该案件进行报道，但它确实想"对这一丑闻涉及两名拥有学位并负责教育年轻人的妇女感到遗憾"，并在最后暗指"这个不幸的西班牙的再生"，而这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大学校长决定加快诉讼程序，免除手续，甚至程序性保障，以限制丑闻的范围。很可能在当时针对加利西亚教职员工的所有纪律程序中，这是处理得最迅速的一个。

”

"司法起诉

司法当局的行为几乎和学术当局一样迅速。新闻界首先报道说诉讼是在科库比翁法院进行的，但很快就知道是阿科鲁尼亚及其地区的预审法官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在处理这个案件。

大多数参加过"无男人婚姻"庆典的人或与主角有关系的人都被传唤作证。在摘要中，有马塞拉的母亲马塞拉-伊贝斯-迪亚斯、圣豪尔赫教堂的教区牧师维克多-科尔蒂亚拉-索莫萨、婚礼的教父米格尔-赫尔米达-卡萨雷斯，以及认出伊丽莎的两名医生安东尼奥-德乌斯-加西亚和曼努埃尔-巴尔贝托的名字。La Voz de Galicia扩大了声明者的名单，并确认了其中一些人：Jacoba "Loriga，洗礼的教母；Ricarda Fuentes，婚礼的教母，以及Manuel Castelo，市法院的官员。看来，邓布里亚的牧师、教师和医生也将被传唤。

科尔蒂亚拉告诉媒体，马塞拉在与马里奥结婚时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存放在圣地亚哥，表明"马塞拉在所发生的一切中绝对是同谋"，牧师计划要求将其纳入调查。法官还得出结论，马塞拉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还有记录显示，所谓的马里奥-桑切斯总是以女性[原文如此]的身份生活在阿科鲁尼亚，并以女性的身份进行打扮，作为学生在马斯特拉师范学校上学，与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她作为伴侣和仆人与她生活了很长时间，为此，毫无疑问，马塞拉-格拉西亚知道她要嫁给一个女人[原文如此]而不是一个男人（附件二）。"取证从1901年6月26日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继续进行。但法官在7月1日肯定已经对该案有了相当准确的想法，因为在这一天他决定起诉这两名教师，并下令对他们进行临时监禁。两人都被指控犯有伪

造罪和公共丑闻罪，伊莉莎还被指控篡改姓名。完整的命令可在附件一中阅读”。

“对虚假的指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Elisa为了与Marcela结婚而假装是Mario，正如在A Coruña民事登记处提交的结婚申请和证明该申请的行为中所述。这些文件还说，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各自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不是真的，至少就马塞拉-伊贝斯-迪亚斯而言，她在法庭上做了陈述--如我们所知，伊丽莎的母亲也活着。法官了解到，根据《刑法》第315条，这些行为被归类为犯罪，可处以监禁和500至5000比塞塔的罚款。庆祝两个女人之间的婚姻也是一种公共丑闻的动机，根据该法典第456条的规定，应受到重大逮捕和公开谴责的处罚。最后，Elisa犯了使用假名的罪行，这种情况在第346条中被定为犯罪，可被处以重大逮捕和125至1250比塞塔的罚款。

考虑到所进行的程序显示Elisa和Marcela的行为有合理的犯罪迹象，以及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可能会受到高于教养监禁的处罚，法官宣布他们被指控，并下令将他们还押，不得保释。这两项决定都必须正式传达给他们，以及“他们每个人都有义务提供1000比塞塔的保证金，以支付可能的金钱责任，否则他们的资产将被没收或被宣布破产。

为了获得他们的监禁，将通知警察当局和Corcubi3n法官，如果他们仍然在Dumbr3a，相应的禁令将在通常的媒体上公布，并在A Coruña市公开，并传达给检察官。

在这份禁令中，他们被给予10天时间到阿科鲁尼亚的法院出庭，在那里他们将被告知起诉和监禁，并将作出陈述。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将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并将被宣布缺席。同时，还要求民事和军事当局对他们进行搜查和逮捕”。

“新闻界宣布，审判将是“嘈杂的”，是在法庭上闭门进行的那种。虽然它没有发生，但在它的页面上发生了一个平行的审判，确定了被告的责任和可能的定罪。

句子。

加利西亚之声》是对这一问题研究得最深入的一家。1901年6月24日，在关于“无男人的婚姻”的第三期中，它反映了埃利萨/马里奥的罪行和

马塞拉。外行人根据壮观的新闻报道评估犯罪的严重性，认为他们将被剥夺自由一辈子：“既然他们的同情心没有停止，那就应该向他们的同情者保证，此事并不严重，远非如此”。

“这位记者试图更加精确，因为他知道之前的声明不能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他具体说明了可以归咎于他们的罪行，尽管他警告说，所咨询的专家之间存在差异：公开使用假名、伪造、公共丑闻、篡夺公民身份和有不能放弃的障碍物的婚姻。

为了获得合格的意见，La Voz de Galicia邀请了几位法学家在其版面上撰文。有两个人同意提出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个叫拉蒙-维拉斯，另一个喜欢用假名--顺便说一下，相当重要--来签署他的合作。

Licenciado Safo. 两人都强调了仅根据报刊上公布的信息做出声明的困难”。

Licenciado Safo明白，他们只是在两份公共文件中犯了造假罪。使用假名只是伊莉莎为实施前次犯罪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篡夺公民身份的指控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没有人的身份被篡夺。也不存在任何公共丑闻罪，《刑法典》中保留了这一罪名，以惩罚其他条款中未明确包括的冒犯谦虚和良好道德的行为。最后，考虑到婚姻的性质 --- “男女双方为生育、教育后代和互助而不可分割的结合”，法院宣布自己无法确定适用于本案的任何障碍，并仅限于说明“Elisa-Mario及其受害者”所实施的行为的神圣性。

对Ramón Vilas来说，这个案子很特别，以至于论坛的历史可能不会记录任何其他具有相同特征的案件。在回答提交的咨询要点时，他毫无疑问地指出，Elisa犯有公开使用假名的罪行，而这两名妇女也犯有

伪造公文的罪行。如果他们被法院认为证据确凿，他们可能因其中一项而被判刑，刑期从10年1个月到12年4个月不等，此外还有被认为适当的经济处罚“。

与之前的法学家一样，他驳回了篡夺公民身份的指控，因为任何真实而具体的人的身份都没有被篡夺，他也没有对公共丑闻指控的相关性做出裁决。在处理传闻中的障碍时，出现了疑虑。“这两名妇女是否因为存在不可撤销的婚约障碍而缔结了非法婚姻，因此她们是否犯有第487条规定的罪行？”。这些障碍在亲属关系中具有原型，是那些对缔结婚姻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在婚姻发生时取消婚姻的障碍。

在“没有男人的婚姻”中是否存在这种性质的障碍？“看来，如果真的有，那也是论文作者在众所周知的拉丁文诗句中所理解的第一个错误[错误、条件、投票、认知.....]28，这个错误破坏了合同的灵魂--同意，使其失效；以及人的错误”。“然而，维拉斯承认，他不知道论文作者所引用的类似案例，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然而，他们确实举出了在识别结婚对象时出现错误的例子，但提交咨询的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对马塞拉来说，在识别对象方面没有错误：她非常清楚那是谁。来自A Coruña的法学家对他的报告总结如下：“很明显，严格来说，不能说有一个婚姻，因为根据教规法，它是无效的，而法律学说认为，无效的东西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

“与El Noroeste合作的专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婚姻不能被废除，因为它并不存在，因为定义它的基本假设并不存在。这简直是一场“巨大的闹剧”。因此，民事和教会行为不是被取消，而是必须被藏在“红纸之下，这是表达脸红的最合适的颜色”。其主人公应对公共丑闻罪负责，同时也违反了《刑法》第241条关于危害宗教感情罪的规定。从教会法的角度考虑，这些行为将被列入所谓的肉体犯罪，特别是鸡奸，并将构成“滥用圣礼”，因为它们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接受的。

"因此，大家一致认为Elisa和Marcela应对《刑法》中的某些罪行负责，但在分类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律专家也明白，由两名妇女缔结的婚姻本身并不是这样的婚姻。对于媒体来说，"没有男人的婚姻"可能是一个幸运的标题，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它指的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现实"。

"起诉书中没有出现的是对同性恋的任何明确提及，在当时的西班牙，同性恋缺乏具体的惩罚。为了镇压它，人们在其他刑事犯罪中寻求法律保护，尤其是在公共丑闻中，我们的主角被指控的罪行之一²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葡萄牙采用了相同的标准，而其他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则将同性恋定为犯罪行为，但通常只有男性同性恋。据说，在英国讨论提及妇女的可能性时，维多利亚女王表示没有必要，因为妇女不实行这种做法，这显然没有什么根据。医生们知道他们这样做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将"同性恋"定罪，但通常只有男性同性恋。据说，在英国讨论提及妇女的可能性时，维多利亚女王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不实行这种做法，这显然没有什么根据。医生们知道他们这样做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但他们批评了这种歧视的不一致性。为数不多的包含它们的刑法典之一，即奥地利法典，已经被修正为不包含它们，用阿尔伯特-莫尔的话说，"从而招致了与德国法典一样的不一致"。伊万-博尔奇则反对将同性恋行为作为恶习和犯罪来定罪，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性恋行为被认为"在妇女中的恶习比在男人中的要少"³⁰。

在早期，鸡奸在西班牙被定为刑事犯罪，因为它被认为是最严重的或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危害自然罪，被定义为任何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³¹。"对圣托马斯-阿奎那来说，最不严重的罪是手淫，其次是不正确地进行的交合，特别是通过错误的渠道进行的交合，男性或女性鸡奸和兽奸³²"。

"在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Partidas中，至少在理论上，在19世纪批准第一部法典之前，在刑事问题上一直有效，对任何主动或被动实施鸡奸的人都保留死刑，尽管未成年人和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可以免于处罚³³。天主教君主认为以前的规定不足以打击这种不值得一提的邪恶罪行"，因此在1497年颁布了一项务实的法令，明确规定应在火刑柱上处死，鸡奸者的物品将被没收，并扩大指控和证据的便利，明确授权实施酷刑。此外，对于惩罚来说，"罪行"并不需要是"完美的"，即在其全部范围和深度上得到完成。1592年，菲利普二世的另一个务实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证据设施。

这些规定，特别是Partidas，专门指的是男性 --- 兽交的情况并非如此 --- 尽管一些评论家将其解释为也适用于女性。格雷戈里奥-洛佩斯（Gregorio López）认为："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做违背自然的事情时"应受到惩罚，尽管惩罚低于死刑，因为"干扰"比男性鸡奸要小；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该行为是在工具的帮助下进行的，则惩罚会加重。另一位法学家安东尼奥-戈麦斯（Antonio Gómez）在其对《托罗法律》（1505年）的评论中更加有力地指出：那些诉诸于器械的人应该被烧死³⁴。

"但事实是，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立法对女性的要求往往没有对男性那么严格，对同性恋关系的定罪也是女性比男性少。朱迪思-C-布朗的结论是："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由非宗教人士和教会法庭审理的数百起，甚至数千起同性恋案件中，几乎没有发现涉及妇女之间性关系的案件"³⁵。

³⁵ "既然他们不那么重要，那么他们能做什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他们所处的劣势状态"肯定有一些好处"，弗朗西斯科-托马斯-瓦连特认为³⁶。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考虑之外，在理论和法律上以及在实践中对男女同性恋进行区别对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赋予妇女在生育方面的次要作用，她们在性关系中被认为是被动的，难以想象女性鸡奸，

更难以证明这一点，男人对妇女之间的感情表现相对冷漠，或者相信异性婚姻会终止这些无辜的色情游戏。

"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同性恋享有不受惩罚的权利，正如批评"女同性恋不受惩罚的神话"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这只是意味着它的社会意义不如男性同性恋，这并不妨碍它被抹黑，被明确或隐含地定为犯罪并受到严厉惩罚，有时甚至被处以死刑。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如果涉及到使用工具或异装癖的做法，惩罚的概率和强度就会增加³⁷。

”

外来务工人员

"1901年8月19日，正式请求引渡伊莉莎和马塞拉。它不是由最初调查此案的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签署的，而是由临时法官爱德华多-加尔万签署的。可在附件二中查阅该命令的全文，该命令以上述萨尔瓦多-米兰上尉的电报为首，根据该电报，葡萄牙当局"不愿意在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认领的情况下移交被告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和埃利萨-桑切斯-洛里加"。因此，正如La Voz de Galicia在8月20日报道的那样，最初的意图似乎是免除"通过外交渠道引渡的漫长程序"，并尽快将他们带到A Coruña。

"法官首先对促使他采取行动的事实作了简要说明。1901年6月8日，马里奥和伊莉莎"想"在圣豪尔赫教堂结婚；同一天，结婚证书在民事登记处登记；《加利西亚之声》在6月22日的版本中报道，马里奥

实际上是伊莉莎，这一情况在进行的诉讼中得到了证实。7月1日，发布了起诉书和临时拘留令，但由于这两名妇女已逃往葡萄牙，因此无法执行；最后，维哥的国民警卫队队长报告说，她们被拘留在波尔图，要想自首，必须申请引渡。

"这一请求的依据是，除其他外，他们犯下了与葡萄牙签订的引渡条约中规定的伪造公共文件罪，因为他们在民事登记处登记了"假定没有参与的人介入"的婚姻记录，以及"不真实地叙述事实"。佩德罗-卡尔沃只提到了这最后一种形式的虚假，爱德华多-加尔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没有的人的干预，这实际上是《刑法》中包含的另一种方式。加尔万没有明确提及卡米纳在起诉书中确定的其他两项指控--使用假名和公开丑闻--而只限于提及他认为最严重的一项，尤其是与所追求的效果最相关的一项。

"该请求也是适当的，因为罪行是由西班牙公民在西班牙境内犯下的，他们后来在国外避难，正如《刑事诉讼法》第826和827条规定的请求引渡。而提出要求的法官有资格这样做，因为他是负责该案的人，这在同一法律中已经确定。

因此，8月20日，爱德华多-加尔万向波尔图的司法当局发出了以下委托书，由葡萄牙驻阿科鲁尼亚的副领事认证："Auszug aus: Narciso de Narciso, Narciso de Galván, Narciso de Oporto, Narciso de Oporto"。

对波尔图的司法当局，我在此向您致意并通知您。本法院正在调查，除其他罪行外，对Marcela Gracia Ibeas和Elisa Sánchez "Loriga伪造公共文件的行为。并下令对他们进行监禁，但由于他们逃离了西班牙领土，在波尔图市避难，根据维哥国民警卫队队长向本法院通报的消息，他们被关押在那里，根据这一消息，上述监禁得到了批准，同时同意将这封信交给法官大人。在此，我以王国摄政女王陛下的名义，并由于她那庄严的儿子唐-阿方索十三世（愿上帝保佑他）还未成年，我

劝告并要求你，并以我自己的名义恳求你安排将上述的马塞拉-格拉西亚和艾丽莎-桑切斯带到图伊市，尽快归还目前完成的工作，并表示在类似情况下会给予回报。

同一天，法官起草了另一份文件，要求部级机关处理之前的驱逐令。根据《刑事诉讼法》，这一请求必须向恩典和司法部提出，而这封信必须由负责执行这一初始程序的阿科鲁尼亚法院院长发给他们“。

恩典和司法部于1901年8月28日向国务部发送了文件，以便能够根据1867年6月25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签署的协议请求引渡。缺少的是起诉书和监禁的逐字副本以及被告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将向阿科鲁尼亚法院院长索取，并在到达后立即寄给国务部。

第二天--Elisa和Marcela在波尔图被释放、被拘留和再次被释放的同一天--国务部决定应要求引渡，这一点在Gracia y Justicia的公函的空白处有注明。这一点在同一天被传达给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命令他正式要求葡萄牙政府交出这两名西班牙人。

"为了遵守它所收到的命令，西班牙驻里斯本代表处于9月6日写信给葡萄牙外交部。在信中，它要求采取措施，"搜寻、抓捕并向西班牙当局移交"Elisa和Marcela，因为他们在西班牙犯下了现行引渡条约第3条第8项中提到的伪造罪。由于这两个西班牙人最近在波尔图被捕，警方必须知道他们的下落。阿科鲁尼亚法官的引渡令已经发出，并表示将尽快发送起诉书的副本。

葡萄牙外交部于9月9日将此案提请王国外交部注意。五天后，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Corona y Hacienda发表了以下意见：“。

"从西班牙部长向本法院提交的要求引渡西班牙国民Marcela Gracia Ibeas和Elisa Sánchez Loriga的文件来看，阿科鲁尼亚教学法院已对这两名妇女提起诉讼，罪名是伪造公共文件罪，可根据《西班牙刑法》第314条第3和第4款进行处罚。

该罪行包括：伊莉莎-桑切斯-洛里加（Elisa Sánchez Loriga）男扮女装，以马里奥的名字接受洗礼，声称作为新教父母的儿子，她没有接受洗礼；然后在阿科鲁尼亚的圣豪尔赫教区教堂与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结婚，两人逃到葡萄牙，并在波尔图市被俘。

请求引渡的罪行是1867年6月25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公约第3条授权的罪行之一；《西班牙刑法》的上述条款和《葡萄牙刑法》第233条及以下条款和第336条对其进行了处罚。

"所提交的文件包含对程序的精确描述和预审法官的委托书，要求抓捕和引渡受害者。

我认为，批准引渡的条件已经满足，因为公约第4条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

"王国部长表示同意这一意见，并于9月16日向波尔图民政长官传达了同意引渡请求的决定。这封信的第一个版本指出，如果Elisa和Marcela还没有被监禁，总督应该着手抓捕他们，"把他们[交给西班牙当局]并收取收据"。但后者被划掉了，而在同一文件的左边空白处，有一个新的措辞，这将是最终的措辞。据此，引渡确实得到了批准，尽管只有在Elisa和Marcela在葡萄牙接受了对他们的指控的审判，并酌情服完相应的刑期后，引渡才会生效。

"因此，最初负责起草这封信的官员似乎没有意识到针对这两名妇女的诉讼是在葡萄牙进行的。王国部曾于9月12日向波尔图提出秘密询问，两天后得到答复。民政局长报告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伊莉莎和马塞拉被逮捕，前者因„无证、穿着不同性别的服装和使用伪造的国籍证书和各自的居留证"，而马塞拉则是她的同伙。八天后，他们被释放，但不影响其待审，并按照专员的命令，继续接受警方的监控。后者在他们被释放的同一天让他们再次被捕，对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

说法。这一被媒体称为任意的警察行动可能源于最初对引渡时间的怀疑”。

“接手为埃莉萨和马塞拉辩护的律师阿尔瓦罗-德瓦斯康塞洛斯

(Álvaro de Vasconcelos) 认为，西班牙法院只允许以他们所谓的性别和姓名穿着“不适当的服装”来审判他们。由于他们也必须在葡萄牙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他们可以由葡萄牙法院“在完全免除引渡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此外，该条约所包括的罪行“包括伤害第三方的罪行，而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假装的婚姻没有伤害任何人”。因此，满足西班牙政府的要求是不合适的。

伊莉莎的母亲咨询过的一些加利西亚法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一点在她女儿寄给她的信中也被告知。在其中一份日期为8月22日的文件中，她建议被监禁的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同意像加利西亚媒体所宣布的那样自愿移交给西班牙。“

亲爱的女儿，我确认我昨天的内容，你必须收到这个。如果政府或当局不应有权求助于引渡，因为该罪行不属于两国间的公约，在我看来，你应该要求，首先是不要自愿来西班牙。

有一位律师坚信，没有什么罪行可以起诉你。我急切地想知道你是否会来拉科鲁尼亚。如果你可以，请用电报告诉我。告别了。你可怜的母亲，玛丽亚³⁸。在从加利西亚收到的信件的鼓励下，在律师探监期间与律师的交谈中，以及在新闻界的有利地位的鼓励下，我们的妇女认为不会要求引渡她们，而且即使要求引渡，也不会批准引渡。这是他们在多个场合对记者说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对自己说的话深信不疑，还是在试图说服自己，给自己鼓励。他们最初也不相信，或不愿相信，在阿科鲁尼亚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

“加利西亚新闻界一般只限于转载葡萄牙报纸发表的新闻，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些人是《加利西亚之声》的几位读者，他们在寄给该

报的信中这样说。其中一人提请注意当局对获得引渡“那两个不幸的歇斯底里的女人，在逃到葡萄牙后开始被遗忘”的特别兴趣。这封信的作者表示同意这一目标，但同时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以同样的热情去争取交出“这么多来自加利西亚、在邻国的罪犯，而不是用无用的法令和传票来充斥官方报纸”。提交人继续说：“违反诚信的罪行应受到惩罚”，“但这些人犯下的罪行更应受到惩罚。为什么他们不应受到惩罚？为什么在这些案件中不行使引渡权？阿科鲁尼亚的报纸同意记者的观点，并承认有许多小偷、杀人犯和其他罪犯逃到葡萄牙，如果不是逃到美国的话。一些选择邻国的人甚至经常渡过米尼奥河去探访他们的原籍地，一旦发现有任何危险，他们就会再次到葡萄牙避难”。

“在1901年9月至12月期间，当媒体停止报道此案时，诉讼仍在继续，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局之间交换了许多信件。9月，西班牙恩典和司法部向国务部发送了一份起诉书和监禁的副本，并附有塞利耶拍摄的照片。10月12日，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将这份文件寄给葡萄牙外交部，指出在照片中Elisa“似乎穿着男性服装”，重申了引渡请求，并警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被告在被移交给西班牙之前可能犯下的罪行适用死刑。

王国部没有等到起诉书和监禁令的复印件，就做出了决定，因为它已于9月16日同意引渡他们。该决定直到10月24日才传达给外交部门，两天后外交部门接受了王国部的意见：这两名妇女“一旦在葡萄牙对她们提起的诉讼结束，将被移交给西班牙当局”。该协议随后被转交给西班牙公使馆，后者又将其转交给国务部。

在移交之前，有必要对埃莉萨和马塞拉进行适当的看管，以防止他们可能的逃跑，这也是波尔图的民政长官命令警察局长做的。州长还与该市的检察院代表团联系，询问诉讼程序，并在该部的压力下，确保诉讼程序加快进行，并将确定的审判日期通知他“。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该案的听证会原定于1901年12月7日举行，但由于伊莉莎没有出庭而不得不推迟。我们还知道，审判已经进行，埃莉萨和马塞拉被无罪释放，他们设法踏上了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程。

但西班牙当局并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是等待他们的投降。对拖延最不耐烦的是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他再次负责阿科鲁尼亚的法院。由于厌倦了漫长的等待，1903年，他决定在写给波尔图司法当局的三封调查委托书中重申引渡请求，并由恩典与司法部和国务部处理。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馆将其转交给外交部，后者转交给教会事务和司法部

"在1月5日的第一份报告中，来自A Coruña的法官报告说，针对Elisa和Marcela的"非法婚姻"案件处于停滞状态，并回顾说，他曾于1901年8月19日要求引渡被告，但至今仍未将他们交给他处理，因此要求尽一切可能防止案件陷入瘫痪。当他没有收到答复时，4月23日，他再次提出请求；在这第二次劝告中，他说，他所知道的唯一信息是，Elisa和Marcela因在葡萄牙犯下的罪行而在该国受到起诉。最后，在6月9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我们认为这是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承认收到了对以前的一封信的答复，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封。收到的答复称，"Elisa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提到Marcela，留下上述我同意复制的exhorto在这部分履行"。

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推断出，在1903年4月23日至6月9日期间，法官被告知不可能引渡伊莉莎，因为她已经不在葡萄牙。但由于没有说到马塞拉，地方法官没有放弃，坚持认为：如果不可能获得两人的自首，就有必要寻求至少其中一人的自首，即使是与案件最不相关的人。教会事务和司法部就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的最后一项请求作出如下决定："这项劝告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遵守"。虽然使用了许多解

释许可，但这段神秘的文字完全可以“翻译如下：请不要再为这件事烦恼，忘记“违禁品男友”。

此时，无论葡萄牙投入多少意志，都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Elisa和Marcela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们不知道是否在任何时候向阿根廷政府提出过引渡他们的要求。我们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

(Alcalá de Henares) 的行政管理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此案的资料。一定有人以良好的判断力认为，毕竟他们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如果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惩罚。最好不要打扰他们。

我承认，在这方面，“当我们的目光在里斯本外交部历史档案馆的亲密接触中第一次相遇时，我想我在他们的目光中感觉到了某种责备。因此，找到阿科鲁尼亚的法官为获得引渡而寄来的照片的情绪与一种令人不安的入侵感相混淆--与我几年后通过采访重建加利西亚 escolantes（没有专业职称的教师）的轨迹时的经历非常相似，尽管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故事和情景。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马诺尔-多斯-安霍斯-勒布雷罗下士或第119号警卫，杰罗尼莫-奥古斯托-安图内斯。我必须说，在我的辩护中，最初是他们来见我，用他们迷人的冒险唤醒了我的求知欲，起初有很多侦探的成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扰，而是为了恢复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这一发现也使我们有可能从当时媒体转载的照片中大大改善我们对这两个女人的印象，因为当时的照片对她们来说并不公正”。

对公众的影响

"Elisa和Marcela取得的知名度首先归功于媒体对他们故事的密集报道--首先是在阿科鲁尼亚和加利西亚，但也包括西班牙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

新闻界从双重角度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作为一个来源，由于缺乏替代材料，没有它，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无法进行；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它评估新闻，决定如何处理它，并对埃莉萨和马塞拉的行为进行判断。因为这些，除了已经记录在案的教会、学术和司法程序，以某种保留的方式进行，还受到另一个公开性质的，由新闻界负责的程序。

"

加利西亚新闻网

尽管El Noroeste是第一家处理此案的报纸，但《加利西亚之声》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1901年6月22日，它发表了第一条新闻，标题是我们熟悉的："嘈杂的事件。Un matrimonio sin hombre"（吵闹的事情。没有男人的婚姻），它在连续的几期中保持了这一点，至少只要它有一定的内容。他说，他以前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性质很淫秽，缺乏一致的证据，而且有可能遭到有关人员的投诉。一旦他收集到准确的数据，他就准备报告，尽管他很克制，因为该案件"是在审计院闭门审理的案件之一"。

"从那一天起直到6月30日，它的读者每天都有"没有男人的婚姻"的配给。正是在这九天里，来自A Coruña的报纸做出了最密集的新闻努力。它重建了埃莉萨和马塞拉的故事；它采访了对洗礼或婚姻有某种干预的人；它派编辑亚历杭德罗-巴雷罗（Alejandro Barreiro）去邓布里亚收集主人公最后已知情况的信息；它征求并转载了法学家、医生甚至一位图形学家的意见；它详细跟踪了司法程序，也跟踪了（尽管

程度较轻) 教会和学术程序, 并就其他差不多的类似案件发表文章。

”

"剩下的就是发表塞利耶的这对夫妇的照片来完成这幅画。"Sellier先生已经在流行了--而且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现在他没有对手了"。许多人来到他位于圣安德烈斯街的商店观看。摄影师同意展示它, 媒体甚至宣布它将被展出, 尽管它从未发生过, 至少在它被发表之前: 起初是因为商店的橱窗正在建设中, 后来是因为马塞拉的母亲要求摄影师不要这样做。

其他人则不满足于看到这幅画像, 想要复制这对著名的非典型夫妇的形象, 不惜代价。还通过电报收到了马德里最重要的报纸和杂志的出版请求。Sellier "英勇地", 不愿意满足这种要求, 尽管他表现出精致的法国礼仪: "他说, 只要有关方面不授权给他, 或者当局不要求他, "任何副本都不会离开他家"。除非它被盗, 否则没有人会拥有它, 而他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但拥有这幅画像的不仅是这位著名的摄影师。当马塞拉带着马里奥到达邓布里亚时, 她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向邻居们展示并分发副本, 她感叹道: "马里奥看起来多么漂亮, 多么英俊, 多么非常英俊"。

"最后, 6月30日, La Voz de Galicia设法使照片出现在其版面上, 从而满足了在这方面向其提出的无数信件和口头请求。要获得一份副本并不容易, 甚至需要记者的老板介入。要复制它也不容易。

由于纸张的质量以及印刷手段和数量的原因, 照相制版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日报, 但为了完整地保留相似性, 我们倾向于采用这种工艺, 而不是锌版印刷, 后者会给人更清晰的印象。

7月的消息没有那么多, 虽然在2号到24号之间, 这个话题被处理了8次, 而且也没有那么广泛和新鲜, 因为主要的事情已经说过了, 两位

老师的下落不明。8月17日，也就是她们在波尔图被捕的第二天，已经很有名的头条新闻被恢复了，每天的信息都是这样，直到22日；四天后，这个案子又被提起，30日和31日也有处理。1902年1月，当玛塞拉分娩时，两个女人的故事再次出现，但这次只出现了两天，即11日和12日。《加利西亚之声》现在无法获得直接的信息，所以它转载了葡萄牙报纸提供的信息，并在其中加入了法院和警察当局的信息。最后，在1904年8月13日，我们记录的最后一个信息被公布，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

其余的加利西亚报纸主要是抄袭《加利西亚之声》的报道，有时也抄袭这家报纸创造的标题，不过他们很少引用消息来源。1901年，除了在阿科鲁尼亚出版的《诺罗斯特报》外，报道该新闻的一些报纸有：《庞特韦德拉日报》（20天）、《卢戈的现代思想》（15天）、《圣地亚哥的加利西亚报》（13天）、《维哥的法罗》（12天）、《费罗尔的加莱戈报》（6天）和《卢戈地区报》（6天）³⁹。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处理这个问题是合适的。有些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例如在庞特韦德拉出版的《加利西亚通讯》（La Correspondencia Gallega）在7月6日的“加利西亚新闻”栏目中确实报道了维克多-科尔蒂亚拉在圣地亚哥进行精神锻炼后回到了阿科鲁尼亚的首都：它认为这比教区牧师主持的婚姻更有新闻价值。其他报纸，如卢戈的《北加利西亚》（El Norte de Galicia）或庞特韦德拉的《安科拉日报》（El Áncora: Diario Católico）也没有报道，尽管它们的版面上有一篇来自马德里媒体的文章，题为《西班牙，疯子的国家》，批评了处理“案件”的方式。El Lucense是另一个没有处理Elisa和Marcela的变故的人，它只限于报道《El Imparcial》（马德里）驻阿科鲁尼亚的记者在宗教问题上的无知，因为他在他的纪事中写道，马里奥“在受洗前虔诚地忏悔”，假设没有受洗也能接受圣礼。

报告的决定取决于对商业和道德标准的重视程度。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新闻界是否必须报道这种充其量被认为是不令人满意的故事？在这方面，设在孔波斯特拉的《加利西亚报》的演变非常具有说明性“。

本报于6月23日首次报道这一事件，提到几天前从某地收到的一封信。这封邮件讲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案件，起初人们并不相信，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案件，也是由于事情的性质。但编辑部很快意识到，赫库林市的报纸并不那么严谨，因为22日他们以相当长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设法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由于读者对这一消息感兴趣，《加利西亚报》决定进行调查，并拜访了当时居住在圣地亚哥的伊丽莎的母亲。但这位女士不能或不愿告诉他们有关她女儿的任何情况；她已经有六个多月没有给她写信了，所以她说她不知道让媒体如此感兴趣的事件的细节。该报称，鉴于此案的微妙性质，它将结束对此案的报道，但在此之前，它对来自阿科鲁尼亚的同事说了几句，他把两个女人的婚姻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婚姻”：“

昨天读了《加利西亚之声》，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两个专栏专门介绍那本两雷亚尔的小小说，对铁路事业可能非常有用。

还有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事，让我们为这个真诚的声明感到抱歉，这可以原谅，因为我们对我们亲爱的加利西亚的进步充满热情。

圣地亚哥和科鲁尼亚的婚姻是我们想要的，没有惊喜、疑虑或琐事，为此我们不像马里奥那样伪装自己，也不像马塞拉那样做疯狂的事情。

这一意图声明在7月4日被出卖了，这一天，《加利西亚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可能是报刊上最长的文章--标题是“Historia que parece cuento”（“看起来像童话的历史”）。这篇纪事来自《诺罗斯特报》，由该报驻孔波斯特拉的记者撰写。在转载之前，《Gaceta》为其插入提供了

理由。它首先指出，几天前被称为 "dos reales的小说"的新闻非常有利可图，因为报道它的报纸被 "从卖家手中抢走"。他重申，《康波斯特拉报》编辑部也通过邓布里亚的来信了解了这一事件，但他们没有 "公开这一事件--这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在6月23日就报道了这一事件，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尽管保留了主角的匿名身份--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微妙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一旦确定了真相，消除了最初的幻想，这个故事就可以一气呵成了。而取自El Noroeste的报告，具有娱乐性，没有 "色情描述"，满足了这些要求"。

"提交人虽然没有明确引用，但明确暗指《加利西亚之声》，该报以不可靠的方式处理新闻，没有考虑其言论对所有受影响者的后果，"用笔蘸着自私、被误解的竞争和商业权宜的黑墨水"。另一方面，他祝贺El Noroeste，虽然它最初也走了同样的路，但能够及时纠正其报告路线。他没有要求掩盖这个同样引起巨大好奇心的案件，因为公众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些信息必须对得起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读者不应该得到 "难以消化"的编年史和 "现代美食的所有刺激"的调味品。

"为了构建一个准确的描述，《北纬周刊》驻圣地亚哥的记者访问了维克多-科尔蒂亚拉，让我们记住，他正在该城市进行精神锻炼。他以朋友的身份介绍自己，并以记者的身份受到接待，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防范措施。教区牧师承认他对所发表的新闻感到不满，这些新闻充满了不准确、幻想和矛盾。他一到阿科鲁尼亚，就会设法让这个案子结案。而无论记者如何坚持，他都无法得到任何陈述，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共同的朋友，科蒂拉已经同意向他坦白。

加利西亚日报》尽管作出了新的承诺，但在7月余下的时间里并没有停止对埃莉萨和马塞拉的报道，尤其是在8月，这两个女人再次出现在波尔图。后一个月的23日，他在《新闻日报》上用葡萄牙语发表了

一篇题为 "As duas espanholas do casamento simulado „的纪事。还有人把它们翻译出来，有时翻译得很糟糕："大区让马里奥做西班牙陶工的伙计，而实际上他做的是alfaiate，也就是裁缝。"

因此，商业需要比道德需要更有力量，至少对那些不属于一个相对独立于市场的事业来支配其行动的报纸来说是这样。因此，《加利西亚之声》能够对收到的攻击作出回应，并在8月20日声明，"艾莉莎-马里奥-马塞拉事件仍然存在，尽管有人想剥夺公众对这类信息的了解，"没有被媒体鄙视"。

有时，即使是被认为质量不佳的文本也会被复制，就像《El Noroeste》所做的浪漫主义作品 "Boda sin hombre"（没有男人的婚礼）。这部浪漫小说在巴塞罗那出版，在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就售出了1100本，每本5美分。我们不知道它在加利西亚的普及程度，但肯定是相当大的，因为在Pontedeume集市上买了700幅，在Ferrol集市上买了600幅。El Correo Gallego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它认为这些对联是"不雅的集合"，并不理解Ferrol市长怎么会允许它们被唱和卖。根据《国家报》(El Nacional) 的报道，几天后，在巴塞罗那的销售量达到了3000册，在费罗尔有1000册，其他地方有2000多册，这让我们知道了这部浪漫小说的标题。鉴于这类文学作品的成功，马德里报纸想知道，如果他们打算在西班牙出版文学作品，谁会努力去写文学作品。

"El Noroeste "转载了这些诗句的样本，可在附件三中读到，这些诗句曾在阿科鲁尼亚的街道上伴随着小提琴音乐被唱起。该作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描述了马里奥的洗礼仪式，然后是他与马塞拉的婚礼。来自A Coruña的报纸认为coplas是文学的"折磨"，也是"女仆、少女、士兵和邻居同志"的快乐源泉，并对允许它们在"加利西亚首府"出售感到惊讶，因为该案正在调查中，主人公已被还押。说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在他的书页中加入了这些诗句的注释，让他的读者客观地对

待"贫民区的同志们"，如果我们使用他的术语。那些想在信息市场上竞争，同时又想减轻自己的坏良心的人的典型矛盾。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El Diario de Pontevedra身上，在所审查的加利西亚报纸中，除了La Voz de Galicia之外，它是最经常处理这个问题的报纸。这并不妨碍它发表哈维尔-瓦尔卡塞-奥坎波（Javier Valcarce Ocampo）的文章，题为"不可能"（附件六），他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对这个故事的处理。该文章认为这篇报道"更像是妓院的典型，而不是自认为严肃和有教养的媒体的专栏"。它最多值得摘录三到四次，但不值得授予它广泛的编年史。而这样的行动不能以公众需求为理由，因为正是新闻界本身在帮助塑造公众的信息口味。因此，自失去古巴和菲律宾以来一直大谈特谈的"复兴"，与其说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荒谬的"。

这家报纸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这桩著名婚姻的文章，尽管风格更随意，署名是Ervija，这是哈维尔-瓦尔卡塞-奥坎波使用的假名之一。题为"Los calzones de Elisa/Mario o volvamos a la tabarra"（附件五），作者感叹说，Elisa和Marcela在葡萄牙的重新出现，使人们对这个近几周来一直无精打采的故事重新感兴趣。这种"婚姻垃圾"--甚至不是婚姻，因为教会法将努力表明"没有男人就没有婚姻，就像没有鹧鸪就没有鹧鸪饼一样"--再次侵入新闻版面，吸收公众的注意力。比起罗曼诺斯刚刚在公共教育领域引入的改革，即再生主义项目的基本杠杆之一，他对艾丽莎/马里奥的地下世界更感兴趣，以确定她是否属于"男性、女性或史诗"的性别。

阿科鲁尼亚的地区主义者通过《Gallega杂志》以更严肃的方式处理这一消息，尽管他们也"在具有节日气氛的《Palique周报》上用了几个简短的段落来报道。他们在两个场合这样做，在其中的第二个场合，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对话，我们从加利西亚语翻译过来。

-教师之间的婚姻发生了什么？

-没有，因为这不是这样的婚姻。

-所以马里奥不是一个男人？

-不，先生，但是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房子。

-那将是少不了的东西！

-我说是房子，因为经过几次检查，很明显，伊莉莎根本不是男性。

-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没有人说过；但最好不要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公告已经把这件事说得太多了，让人感到恶心。

他们还转载了马德里《国家报》的一篇文章，但省略了第二部分，其中打击了教权主义。他们还发表了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标题非常重要：“El fomento del escándalo”（附件四）。它的匿名作者说，他没有暗指任何特定的案件或任何具体的媒体，但很明显，他指的是Elisa和Marcela，La Voz de Galicia，可能还有El Noroeste。这些报纸以其耸人听闻的报道，在利益的驱使下，不仅给事件的责任人抹黑，也给其他受人尊敬的人抹黑，他们只是因为与主角有某种关系而有罪。他们篡夺了法官的职能，在他们的页面上进行平行审判，在审判中决定要判处的刑罚，并采访那些被传唤出庭作证的人。”由于他们的新闻报道，他们煽动了这一丑闻，为此他们也应该被起诉。简而言之，对Revista Gallega来说，此案的责任不仅在于Elisa和Marcela，也在于媒体，因为如果他们不以他们的方式处理这桩独特的婚姻，它就会“作为众多婚姻中的一个而被忽略”。

科鲁涅斯共和国赌场周刊（El Combate）并没有特别突出这一主题，尽管它借机攻击教会，特别是维克多-科尔蒂亚拉。8月25日，它在其中一节中提到了“重复洗礼”和“亵渎性婚姻”，“在另一节中，它呼吁在民事法庭上追究那些不能区分男女的人的责任。9月15日，他对圣地亚哥大主教通过阿科鲁尼亚的车站而没有进入该市表示遗憾，因为

该周刊准备出版一期特别版，为他拍摄一张 "被杰出的、敏锐的科蒂埃拉和他的两个已婚女人包围" 的肖像。1902年，马塞拉有了一个女儿，是时候恢复这位教区牧师的视力和嗅觉了，在前几个月里，他的视力和嗅觉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而且不仅仅是反教会的媒体："后来，维克多博士变成了一位拥有出色鼻子的教区牧师，他的诋毁者不得不收回他们当时给他的绰号，叫他.....红隼"。

马德里新闻网

1901年6月23日，马德里的大多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在接受审查的机构中，El Imparcial、El Nacional和La Correspondencia de España做到了这一点。《国家报》于6月27日这样做了，《祖国报》于6月28日这样做了，而其他报纸，如《自由报》、《环球报》、《西班牙报》和《马德里先驱报》则等到了7月初。

在加利西亚，《加利西亚之声》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在马德里，则由《帝国报》负责，在1901年6月至8月期间，该报共14次涉及这一问题，而平均约为8次。1902年1月，它报道了马塞拉的母亲身份，1904年8月，报道了伊丽莎的新婚姻。

除了是报道最频繁的报纸外，它也是为新闻保留最多版面的报纸，最初的标题是 "一出肥皂剧在行动"。两个女人结婚"，后来，当她们在葡萄牙被捕时，"Prisión de las casadas en la Coruña"（拉科鲁尼亚的已婚妇女监狱）或 "Las mujeres casadas de la Coruña"（拉科鲁尼亚的已婚妇女）。由法吉纳斯签署的阿科鲁尼亚首都的编年史比波尔图的编年史要广泛得多。第一份报告强调，这是一个 "真正非同寻常" 的事件，由于其 "微妙的性质"，无法描述其所有细节。它为读者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刺激读者的好奇心。"

其他报纸以更谨慎的方式处理了这些事件。El Liberal、El Globo、El Español和Heraldo de Madrid发布的前三四条新闻并没有讲述这个故

事，只是提到了图文杂志中主角肖像的出现。因此，他们的读者了解到，有一条非常有趣的新闻，但是，他们认为不应该告知他们。

"El Globo"的读者在7月3日能够读到"Nuevo Mundo"打破了本周兴趣和时事的记录，刊登了来自A Coruña的两个女人的婚姻画像，这是"当天最激动人心和轰动的新闻"。El Globo在连续几天里继续满足其客户的好奇心，尽管它让客户处于新闻快报状态，因为在7日它只是宣布Blanco y Negro也提供了这张照片，而在10日，Nuevo Mundo更胜一筹，因为它转载了"一张全长的肖像"。从这时起，它又陷入了沉默，只限于发表法官30日签发的搜查和逮捕令，并在8月发表了四篇关于在波尔图发生的事件的短文。上面提到的其他三家报纸也遵循了类似的路线。

"《国家报》和《西班牙通讯报》也没有对这一事件给予特别的关注。国家报》：《共和报》和《祖国报》：《独立政治报》的头条和评论文章都比较有趣。前者是继《新闻报》之后，报道最多的一家，因为它报道了11次。"其中一篇文章出现在7月5日，题为"Las bodas sáficas o las casadas de la Coruña"（附件七），对主流媒体（原文为斜体）处理"最近由拉科鲁尼亚两名妇女引起的这一最令人厌恶的丑闻"的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共和党人承认，在对自杀和其他罪行保持沉默的便利性上，他们同意最保守的和教派的报纸，并且理解，当为了通报情况，有必要像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下降到"堕落的下水道"时，沉默应该是令人窒息的。即使有时为了打击罪恶，有必要谈论罪恶，但有些"反常"的行为，不宜公开，因为它们玷污了处理它们的人的"笔、纸和手"："正义规定应该闭门审判，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这家公开承认反教士的共和党报纸指出，主流媒体对阿科鲁尼亚已婚妇女的"令人厌恶的变故"进行了精彩的新闻报道，而面对涉及神职人员的类似事件却保持沉默，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

犯罪者不是 "普通人.....和穷人", 而是修士或修女, 就不会有人说什么。除了《国家报》, 它也会这样做, 虽然保持形式, 如果它有任何机会未能 "表达神圣的牧师式的敬意, 谁会怀疑我们是出于一个崇高的目的, [即]将我们思想的最大敌人裸露出来? 奇怪的是, 在这几句话发表的同一天, 读者得到了《修女回忆录》的其中一期, 四天后又得到了一篇题为《强奸犯神父》的纪实文章, 其中涉及到一个住在修道院的17岁女孩被强奸的指控, 并包括她父亲描述事件的信。

"祖国"报于6月27日开始出版, 于6月28日发布了一条关于 "Las Safos gallegas" 的新闻, 以满足其公众的需求, 我们推测公众仍然很稀缺, 8月22日和30日分别成为 "Las "Safos" coruñesas" 和 "Las "Safos" en libertad。" 它还包括 Daniel Bascuñana Charfolé 的一篇文章, 题为《Por Marcela y Elisa. 一份报告》。这是为数不多的从 "人类学" 角度处理这个问题的著作之一, 并试图从这个角度解释 Elisa 和 Marcela 的性行为, 因此不无意义 (附件八) "。

"就像在加利西亚发生的那样, 马德里的一些报纸决定掩盖此案。这就是《世界报》所采取的立场, 它从 "1901年8月28日开始采用了《早报》的政治性天主教日记的副标题。教会的形象在整个事件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这个事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一位教区牧师, 他被仁慈的人描述为目光短浅。如果我们再加上这些事实在天主教报刊上值得一提的道德和教义方面的考虑, 对它们保持沉默是谨慎的"。

再生主义 "的一些标杆人物也为沉默辩护, 或者至少批评了一些媒体组织的大惊小怪。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业先驱报》7月1日在其头版发表的文章。

西班牙, 疯子之国

(再生的例子)

D. Tancredo 的故事 - 宴会

一个 "加里波第"-- 妇女的婚姻

这篇文章的作者Luis Maraver y Serrano在阅读了《El Imparcial》之后，得出了这篇文章标题的结论--不过，他担心外国媒体会不那么仁慈，并以"西班牙，野蛮人的国家"为标题。他首先了解到，斗牛艺术家坦克雷多-洛佩斯-马丁即将从他所遭受的刺伤中恢复过来，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再接受一次，因为粉丝们的满意是当之无愧的，这样，马拉维就平静了许多。"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他增加了对这两个女人的婚姻的了解，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主题，可以为"启迪我们和道德化国家的习俗"做出贡献，因此，马德里日报--"卓越的严肃报纸"，被一些人认为是在西班牙出版的第一份报纸，马拉维强调--在把握新闻脉搏方面做得非常好。翻开这一页，还有另一则消息和之前的消息一样具有启发性：刚刚为加里波第举办的宴会，马德里的一个著名的酒鬼，一个"终身酒鬼"的名字，布兰科和黑人为他出版了一张骑在驴子上的画像。观察到这样的全景，作者要求"一个非常大的疯人院和一个更大的监狱。"

就其本身而言，《国家报》也对其一些同事--特别是《新闻报》--的过度行为提出质疑，他们的编年史超出了合理范围。在其批评中，加里波第的酗酒和伊莉莎和马塞拉的狂言再次被联系起来。

当你拿起一份报纸时，最喜欢的版面是关于加里波第的版面，或者是关于两个女人的婚礼的版面，这是很可笑的，也暴露了一种迟钝的品味，如果这些是西班牙最感兴趣的资本问题，那也不例外。

够了，先生们，够了，够了。让我们离开埃莉萨或马里奥和他的妻子或他的朋友；让我们不要把政治报刊和大众周刊变成一个色情部分：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在他们的小说中使用这些问题的图书馆，因为这个"folletín en acción"[这是《El Imparcial》的标题]是一个给许多父母带来不安的folletín，他们看到并希望对方向他们无辜的后代解释这个婚礼意味着什么，即它并不意味着什么。

"最后这一点是许多人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之一。正如《自由报》的编辑米格尔-莫亚 (Miguel Moya) 所警告的那样，报纸是写给人看的，并从门缝中进入房屋，使 "女士和儿童 "都能看到。除了被阅读，有时还被大声地评论，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引起注意时：两个女人结婚，一个嫁给另一个，怎么可能不引起注意？父亲和母亲会对他们的儿子和女儿的问题做出什么解释？两个男人也可以结婚，一个嫁给另一个？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不容易摆脱的复杂情况。正如忏悔者被要求不要过多地谈论性犯罪的方式--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是这样，但几乎没有一个是轻微的--以免他们提供想法，所以新闻界不能谈论某些话题，否则就有可能鼓励它声称要打击的恶习。事实上，似乎埃莉萨和马塞拉确实给出了一些想法"。

签名：纳西索-德-加布里埃尔。"伊莉莎和马塞拉。朋友和恋人。"

iBooks。

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并不缺乏润色我们所关注的故事的想法。她有很多这样的人，而且毫不掩饰。但她写作的 "媒介--《艺术报》对她进行了约束："这些天在报刊上发表的闻所未闻的小说，其最令人惊讶的章节是以我的家乡为背景的，我感到多么遗憾！"。这位加利西亚作家警告说，在为面向家庭世界的出版物写作时，这种困难 "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尽管报纸也确实渗透到了家庭中，尽管如此，也没有采取太多的谨慎措施。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少有故事会比这个朝圣者案件的旁证更有趣--我说的朝圣者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从未见过或听说过，因为我不记得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事情"。即便如此，这个问题有如此多的方面，以至于有可能在处理其中一个方面时 "不失礼，不担心丑化任何人"。选择的是异装癖。"然而，在进入主题之前，多娜-艾米利亚觉得有必要援引类似性质的媒体中的先例：

《西班牙和美国时报》也出版了卡塔利娜-德-埃劳索的传记和肖像，她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异装癖，被称为“修女英斯”（附件九）。准确地说，艾丽莎和马塞拉的肖像是平面杂志的主要吸引力。第一个出版的是《新世界报》，它于1901年7月3日出版，在《加利西亚之声》上发表三天后。转载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被一张描述这两个女人的历史的说明所占据，并强调了伊莉莎从小就对马塞拉的“自私”的爱，以及两张6月30日凌晨在马德里发生的风暴的快照，其中有大量的闪电。

“在接下来的问题中，他们祝贺自己有能力与公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并祝贺公众对其信息工作的反应。尽管报纸不遗余力地报道这一消息，但只有《新世界报》设法公布了其主角的形象。

当然，这份周刊的编辑们并没有怀疑第391期注定要取得的非凡成功。在下一期中，他们对自己与公众利益相联系的能力以及公众对他们的信息努力的反应表示祝贺。尽管报纸不遗余力地报道这一消息，但只有《新世界报》设法公布了其主角的形象。

“那么，我们的版本在见光后不久就卖光了，这并不奇怪，由于读者的不断要求，我们不得不出版第二和第三版，尽管没有第一版的彩色封面，但也和这一版一样迅速售罄。

《新世界报》在周三和周四[7月3日和4日]仅在马德里就卖出了19000多份，这是任何其他周报从未达到的数字，即使在殖民战争期间，公众如此渴望看到这些地方的肖像和照片”。

“由于它的成功，《新世界报》在第392期上发表了“全幅”肖像，这次是整版的，希望它能像以前一样受到好评。

报纸证实了这一惊人的成功，这使得塞利耶的摄影作品成为西班牙平面媒体历史上传播最广、利润最高的作品之一，甚至是最赚钱的作品。El Imparcial在4日报道说，公众挤满了该周刊的大门，第一版 "一上市就卖光了"，同时宣布第二版将在同一天中午12点出版，这将满足那些用完的人的 "合法好奇心"。

"其余的平面杂志，其中许多都在争夺同样的客户，被迫作出反应。Por esos mundos在其7月号上发表了这张照片，尽管它没有给予它很大的突出地位，因为它与其他四张杰出人物的照片共用一个版面，如Alejandro Lerroux和Vicente Blasco Ibáñez。更加谨慎的是文学处理，它被减少到四行，再往后两页插入。马塞拉和伊丽莎-马里奥 "的故事被称为轰动和丑闻。

Blanco y Negro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并根据《La Voz de Galicia》版面上出现的肖像进行了转载；它于7月6日这样做，比其主要竞争对手Nuevo Mundo晚了三天。它以 "案件的反常性质和产生的期望" 为由，证明了插入的理由。

"但报道新闻最多的是《El Suceso Ilustrado》，这是一份只有两个月的周刊。该活动符合其信息量大的特点，所以它觉得有义务在真实性和广度上超过其他任何活动。其编辑奥古斯丁-帕雷德斯-内博特 (Agustín Paredes Nebot) 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巩固杂志的好机会，所以他前往阿科鲁尼亚收集信息和图片材料。

这对夫妇的肖像由何塞-塞利耶 (José Sellier) 创作，配得上《El Suceso Ilustrado》的封面。

"读者能够在7月14日的第9期上看到他们努力的结果，该期载有一份题为 "没有男人的婚姻 "的广泛报告--8页的文字和图片。封面被Sellier

的照片占据，并指出这是原作，是专门为该杂志购买的，所以禁止复制。该报告还包括阿科鲁尼亚市、圣豪尔赫教堂和教区、“用于逃跑的汽车”、邓布里亚镇、“新娘和新郎”居住的房子、教区牧师维克多-科蒂埃拉、医生安东尼奥-德乌斯-加西亚和曼努埃尔-巴贝托以及法院官员曼努埃尔-卡斯特罗-雷伊的照片。所有这些都是由E.Ferreiro签署的，除了Cortiella的那份，其作者没有说明。

"日报宣布这期《El Suceso Ilustrado》即将面世，与其他媒体发表的照片不同，它有真实的、非绘画的照片。它还报道说，塞利耶拍摄的照片在Calle de Alcalá的一家书店展出："在Messrs Romo and Füssel (Alcalá, 5, Librería) 的商店窗口，你可以欣赏到Marcela-Mario夫妇的照片（没有男人的婚姻），为El Suceso Ilustrado获得的前教授，将于周日14日出版"。我相信很多人来到这家店是为了看这幅画，因为很多人也曾为了同样的目的围攻塞利耶在阿科鲁尼亚的圣安德烈斯街的商店"。

"马德里周刊"特别强调了它所刊登的婚礼肖像的真实性，并要求"读者注意与其他杂志所刊登的不同之处，这可以从新娘的橙花花束、领带的颜色、右手的位置、手表链和新郎外套的位置看出。

"如果他们对图像感到自豪，那么他们对文字也同样感到自豪，这些文字是基于导演在阿科鲁尼亚收集的"独家"信息。后者会见了维克多-科蒂埃拉，后者以毫不掩饰的谨慎态度接待了他，因为他认为记者"令人恐惧"。由于他们急于劝说读者，他们混淆了事情，让自己被幻想冲昏头脑。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告诉他这个故事，帕雷德斯-内博特--在加利西亚报刊，特别是《加利西亚之声》和《诺罗斯特》上出现的信息的帮助下-在他的周刊上以应有的篇幅转载了这个故事。他一定做过计算：如果《新世界》只有一个版面和一张照片，被迫出版三个版本，那么《El Suceso Ilustrado》有一个头版、八个版面和十

张照片，就能保证成功。当然，到那时，故事已经讲完了，这对著名夫妇的画像也已经看到了。Gente Conocida，一本十年期的杂志，说它省略了这个主题，因为“对企业已经造成了太多的打击”。

El Suceso Ilustrado "的报告包括一份可能是由科蒂埃拉给帕雷德斯的洗礼证书副本，以及另一份由市法官爱德华多-加尔万提供的民事登记处记录的结婚证书。它还包括对其他被拍摄者的采访，以及对教父米格尔-赫尔米达-卡萨雷斯的采访，他的照片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每日的媒体已经充分描绘了自己。最健谈的是曼努埃尔-卡斯特罗-雷伊，他作为市政法官的代表参加了婚礼。马塞拉的母亲在她的精神导师的建议下，拒绝发表任何声明，尽管她承认她是玛丽亚-洛里加不可调和的敌人，而玛丽亚-洛里加现在已经成为她的姻亲。她只希望她的女儿能尽快出现。预审法官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

(Pedro Calvo y Camina) --原文为 "Cansina"--也接受了采访，他宣称调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他所发布的命令将导致立即逮捕伊丽莎和马塞拉。

"La Voz de Galicia "指出，马德里周刊"复制和摘录了La Voz的大部分内容"，并证明了照片的真实性，但那些归于Dumbría学校和村庄的照片除外，这些照片实际上对应于A Coruña的Santa Margarita区。当时，邓布里亚离阿科鲁尼亚市很远，正如亚历杭德罗-巴雷罗在前往那里实地收集信息时指出的那样。

埃莉萨和马塞拉有机会看到这份报告，当他们出现在波尔图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时，他给他们看了这份报告。他们特别关注图片部分，在对《新闻日报》的声明中，他们的意见几乎与《加利西亚之声》当时的意见相同：“。

马塞拉解释说："其中一辆车显示我们在去教堂的路上。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是步行去的。描写我家和学校的照片也不准确....

-但这个故事是否准确？

-是的。

我们不知道《El Suceso Ilustrado》第9期的发行量有多大，但它一定很了不起--尽管可能没有《Nuevo Mundo》的发行量大，因为8月25日它第二次出来与读者见面，封面上是两位加利西亚妇女。如果说以前主要的新闻来源是在阿科鲁尼亚，现在则是在波尔图。于是帕雷德斯-内博特去了那里，渴望为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画上句号。葡萄牙媒体报道说，他于8月19日抵达波尔图，在艾莉莎和马塞拉被捕三天后”。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拍摄和采访他们。他们没有同意前者，帕雷德斯-内博特只设法拍到了一张伊莉莎背对镜头的照片。据监狱长说，当他们不想接待来访者时，伊莉莎采取这种姿势，而马塞拉则站在角落里，用围裙遮住脸。因此，记者不得不求助于业余摄影师何塞-罗德里格斯（José Rodrigues），他把在阿尔朱贝监狱拍摄的肖像交给了他--在一个洗衣服的花园里，那里是“埃莉萨和马塞拉的娱乐场所”--在杂志的封面上再现。

尽管监狱长施加压力以满足西班牙记者的要求，但埃莉萨和马塞拉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他声称，她们最终向他透露了一些信息，但不能确定是否如此，因为他抄录的采访内容与《新闻日报》8月18日发表的采访内容几乎逐字吻合，包括描述两个女人的情景和心理状态的介绍。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因为它们是从葡萄牙媒体上复制的，没有提及任何来源，是构成报告五页的其他新闻的很大部分。为了使信息更有价值，帕雷德斯-内博特警告他的读者，艾莉莎和马塞拉被单独监禁，他只有在监狱长的特别尊重下才能探视他们，而事实是他们接受了许多探视。

”这期《El Suceso Ilustrado》的图片部分包括波尔图的全景，两个朋友在这个城市的最初几天所住的房子之一的照片，还有Aljube的照片，

以及专员、负责逮捕的警察、监狱长和他的妻子以及仍然穿着男装的Elisa本人的肖像。

如果说对图画杂志来说，这次活动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塞利耶的肖像，那么对漫画和讽刺杂志来说，它的吸引力则在于它的性质，它本身就能引起广泛的猜测。

Madrid Cómico在其6月29日的期刊中暗中提到了这一消息。路易斯-塔波阿达在 "De todo un poco "一节中问道："两个女人结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两个男人不也结婚吗？萨加斯塔与莫雷特、蒙特罗-里奥斯与加尼卡（在摒弃巴罗佐之后）、加马索与毛拉都曾这样做过。这种联系的问题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它的成果，它往往是摇摇欲坠的，而且是契约式的，正如西尔维拉和维拉弗德之间的婚姻所产生的保守派联盟那样。

索里亚诺，用照片淹没了《白与黑》和《新世界》。但由于《El Suceso Ilustrado》敢于挑战这两份周刊，他被鼓励"介入这场时事之争"，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先例。因此，它委托其在阿科鲁尼亚的艺术记者为这对著名的夫妇画了一幅"生活素描"，并在头版转载，还附有说明文字；它将其称为"有效的、真实的、无可争议的肖像，这对著名的假小子夫妇在其中扮演新娘和新郎..."。与El Suceso Ilustrado相媲美的是，这份图文并茂的报告以"与他们结婚的牧师、认出他们的医生和生下他们的母亲"的图像完成。这三个"情节性"人物的肖像是由Leal da Cámara绘制的，在杂志社的要求下，他同意离开他在巴黎的住所，前往A Coruña。毫无疑问，它们是真实的肖像画，因为艺术家是葡萄牙人，"最适合复制与卢西塔尼亚人如此相似的加利西亚类型"。他的结论是："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

„比起处理事件本身，《马德里公约》更多的是模仿媒体对待事件的方式。特别是严肃的媒体，如《白与黑》，考虑到其目标受众--包括

公爵夫人--和它的特点--"蒙面的概念"--在发表两位教师的肖像时明显失误。

葡萄牙的新闻

一些葡萄牙媒体，如波尔图的《O Norte》和里斯本的《Tarde》，已经在1901年6月和7月提到了"没有男人的婚姻"，但在8月下旬，Elisa和Marcela才成为头条。

波尔图的一份晚报《A Província》在8月16日报道了这一逮捕事件的发生："两名妇女的联合体。新娘和新郎在波尔图的监禁"。第二天的标题发生了变化--"两个西班牙人结婚了"--并得到了波尔图其他同事的支持：《新闻日报》、《第一日报》、《日报》、《波尔图商业报》、《北方报》、《公共之声》和《新闻报》。从8月18日至31日，除8月26日星期一外，这8家报纸中的一些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最大的覆盖率出现在20日、21日和30日，当时只有一个人没有报告该案件。

"El Jornal de Notícias从17日到31日系统地跟踪此案，经常给它几个专栏；它跟随La Voz de Galicia开辟的线索，在较小程度上跟随El Imparcial。唯一明确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的A Palavra，用的篇幅较少；它在六个场合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比较简短。

里斯本的日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尽管他们基本上只限于复制来自波尔图的信息。《O Século》--"Caso sensacional"--是最频繁的，报道了10天，而《Tarde》、《Novidades》和《O Dia》只有3天。《世界报》和《Diário de Notícias》报道了6天，《O Popular》报道了4天。

"可以看出，Elisa和Marcela在葡萄牙媒体上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他们的公众对冒险和爱情故事特别感兴趣，一般来说，对耸人听闻的新闻也感兴趣⁴¹。大约在同一时间，《北方报》在连载中发表了《教皇胡安娜》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纪的所谓异装癖案例。因此，

没有人愿意错过马里奥和马塞拉带来的真实而有话题性的故事。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波尔图的报纸，它们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城市中的主角的存在。

17日星期六，《新闻日报》将头版的两个中心栏目留给这两个西班牙人。

违禁品新郎和新娘

一场非常奇特的婚姻

一个新的女人-男人

"新闻的中心是马里奥和马塞拉这对"同性新娘和新郎"的画像，因为该报的编辑们知道出版该画像的西班牙杂志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他们还意识到各国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以及这两名妇女的被捕在波尔图人民中引起的期望。这条新闻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因此，主人公的谨慎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个案件是如此不寻常，如此独特，不可能隐瞒它，不可能不描述它的所有有趣细节"。

"期望得到了证实，因为星期六的版本已经售罄。周日的版本再次复制了塞利耶的肖像，从而满足了前一天读者的要求。这第二期有一个额外的吸引力，因为它包含了对伊丽莎和马塞拉的长篇采访。该报的发行量"非常高，我们的机器一直运行到早上10点以后"。第二天，即星期一，读者和机器都得到了休息，但在20日，信息又被重新拾起，这次有了双重特点：除了描述最新的事件外，这两个西班牙人还成为《De Raspão》幽默栏目的主角。在连续的几天里，他们继续值得特别关注，以至于一个标题被整合，并以很少的变化重复："模拟婚姻的两个西班牙人。

"

签名：纳西索-德-加布里埃尔。"伊莉莎和马塞拉。朋友和恋人。"

iBooks。

葡萄牙的新闻

一些葡萄牙媒体，如波尔图的《O Norte》和里斯本的《Tarde》，已经在1901年6月和7月提到了"没有男人的婚姻"，但在8月下旬，Elisa和Marcela才成为头条。

波尔图的一份晚报《A Província》在8月16日报道了这一逮捕事件的发生："两名妇女的联合体。新娘和新郎在波尔图的监禁"。第二天的标题发生了变化--"两个西班牙人结婚了"--并得到了波尔图其他同事的支持：《新闻日报》、《第一日报》、《日报》、《波尔图商业报》、《北方报》、《公共之声》和《新闻报》。从8月18日至31日，除8月26日星期一外，这8家报纸中的一些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最大的覆盖率出现在20日、21日和30日，当时只有一个人没有报告该案件。

"El Jornal de Notícias从17日到31日系统地跟踪此案，经常给它几个专栏；它跟随La Voz de Galicia开辟的线索，在较小程度上跟随El Imparcial。唯一明确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的A Palavra，用的篇幅较少；它在六个场合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比较简短。

里斯本的日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尽管他们基本上只限于复制来自波尔图的信息。O Século》--"Caso sensacional"--是最频繁的，报道了10天，而《Tarde》、《Novidades》和《O Dia》只有3天。世界报》和《Diário de Notícias》报道了6天，《O Popular》报道了4天。

"可以看出，Elisa和Marcela在葡萄牙媒体上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他们的公众对冒险和爱情故事特别感兴趣，一般来说，对耸人听闻的新闻也感兴趣⁴¹。大约在同一时间，《北方报》在连载中发表了《教皇胡安娜》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纪的所谓异装癖案例。因此，

没有人愿意错过马里奥和马塞拉带来的真实而有话题性的故事。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波尔图的报纸，它们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城市中的主角的存在。

17日星期六，《新闻日报》将头版的两个中心栏目留给这两个西班牙人。

违禁品新郎和新娘

一场非常奇特的婚姻

一个新的女人-男人

"新闻的中心是马里奥和马塞拉这对"同性新娘和新郎"的画像，因为该报的编辑们知道出版该画像的西班牙杂志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他们还意识到各国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以及这两名妇女的被捕在波尔图人民中引起的期望。这条新闻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因此，主人公的谨慎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个案件是如此不寻常，如此独特，不可能隐瞒它，不可能不描述它的所有有趣细节"。

"期望得到了证实，因为星期六的版本已经售罄。周日的版本再次复制了塞利耶的肖像，从而满足了前一天读者的要求。这第二期有一个额外的吸引力，因为它包含了对伊丽莎和马塞拉的长篇采访。该报的发行量"非常高，我们的机器一直运行到早上10点以后"。第二天，即星期一，读者和机器都得到了休息，但在20日，信息又被重新拾起，这次有了双重特点：除了描述最新的事件外，这两个西班牙人还成为《De Raspão》幽默栏目的主角。在连续的几天里，他们继续值得特别关注，以至于一个标题被整合，并以很少的变化重复："模拟婚姻的两个西班牙人。"

当人们意识到埃莉萨和马塞拉具有倍增发行量的优点时，波尔图的其他报纸也不忘利用他们在该市的存在，尽管他们没有像《新闻日报》那样彻底利用它。他们重建了他们以前的职业生涯，有些报纸，如《第一日报》（O Primeiro de Janeiro），出版了从西班牙报纸上摘取的大量编年史；他们采访了他们，并复制了他们的肖像--《北方报》用何塞-罗德里格斯在阿尔朱贝的院子里为他们拍摄的照片来说明其采访，并吹嘘说它是除西班牙报纸外唯一被授权使用的报纸。他们用散文和诗句系统地跟踪了他们在波尔图市的旅程--"他们最初的逗留，他们的逮捕，警察的审讯，他们的监禁，他们出庭，声援运动，他们的释放和马塞拉女儿的出生"；他们讨论了在葡萄牙归咎于他们的罪行的范围和西班牙要求引渡的相关性；他们发表了读者和主人公自己的信件。..他们还猜测了艾丽莎的所谓雌雄同体，因为他们知道这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一些报纸在其标题中暗示了这一点--"捕获两名西班牙人：女人-男人"（《波尔图商业报》），"两名妇女的财团。一个女人-男人"（A Palavra）-和其他人，在他们的编年史内“。

"Jornal de Notícias"在Aljube的档案中寻找其他雌雄同体的先例，发现了1866年被捕的玛丽亚-蒙泰罗，当时她正穿着男装。这个"真正的处女"一直是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因为医生和助产士们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这种只在罕见情况下发生的现象，他们感谢玛丽亚耐心地满足了这么多的科学好奇心。专家们得出结论，她是一个女人，但也是，"最奇怪的雌雄同体的例子之一"。无论如何，葡萄牙的维拉戈比加利西亚的维拉戈更有说服力：只要观察一下伊莉莎不稳定的胡子，并将其与监狱档案中归属于玛丽亚-蒙泰罗的浓黑的胡子进行比较就足够了"。

Diário Ilustrado "是唯一一个就这一问题发表具体文章的报纸，题为"雌雄同体"。在回顾了这个名字的神话起源之后，其匿名作者在《拉

《鲁斯词典》的帮助下总结了当时的主流科学观点："只有在某些畸形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命才会在外观上同时出现两种性别的外部器官"，尽管其中只有一个可以生育，"当绝对不育没有发生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另一方面，平面杂志则对其摄影作品更感兴趣。在里斯本出版的《巴西-葡萄牙》在内页刊登了罗德里格斯的照片，并对埃莉萨作出了不利的评价，他"很可能被称为马里奥，因为如果他是，他不需要改变类型就能成为一个.....丑陋的男孩"。该杂志认为不宜对"案件的心理学"进行扩展，但这幅画像可能相当成功，因为它还出现在下一期中，这次是在封面上，没有任何评论，只有一个标题，写着："丈夫和妻子.....都是女性"。

"O Século"也来自里斯本，在8月22日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副刊中，将Elisa和Marcela作为"本周名人"，并将描绘她们在笼子里的漫画和相应的诗句献给她们。同期还包括另一项合作，题为"我们的艾莉莎和我们的马塞拉"，谴责两位葡萄牙政治家辛茨和何塞-卢西亚诺在里斯本结婚，提供了他们的漫画，警告说不知道谁扮演了艾莉莎，谁扮演了马塞拉。

Os Pontos: 在波尔图出版的《Semanario de Caricaturas》也呼应了这两个西班牙人的受欢迎程度；人们不谈别的，"狂热地吞噬着详细介绍这一丑闻的报纸"。人们的期望如此之高，以至于连"家庭的避难所"都没有得到尊重，父母对女儿的尴尬问题感到不方便。

"爸爸，为什么那两个西班牙女孩要结婚？"

-爸爸，哪个是男人？

-爸爸，女人在这个婚姻中的角色是什么？

-爸爸已经去看他们了吗？

-爸爸，马塞拉和伊丽莎哪个更漂亮？

-爸爸，丈夫真的有小胡子吗？

- 他们是来自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吗?
 - 他们现在要对他们做什么?
 - 父亲，如果他有权力，他会对他们做什么?
- 该消息被其他媒体报道。

波尔图的其他杂志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如《现代生活》（A Vida Moderna），尽管也有一些杂志决定保持沉默，如《阿尔加扎拉》（A Algazarra）、《O Paiz》、《O Dyabo》和《O Latego》的情况。在里斯本出版的一些作品也是如此：《O Pimpão》、《A Parodia》、《Serões》、《Passatempo》、《O Arauto》和《A Obra》。不过，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后者确实报道了艾莉莎和马塞拉结婚前不久在阿科鲁尼亚市发生的工人冲突。

"在葡萄牙没有看到的是在西班牙发生的关于媒体是否应该报道这类事件的激烈辩论。毕竟，他们是"来自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并不构成葡萄牙人"国耻"的任何原因，也不损害任何再生主义事业。那些选择报告的人没有过多的坏良心，而那些选择保持沉默的人通常会承担所有后果。一些西班牙媒体认为，问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对事件的报道，这种看法在邻国没有什么分量。

"然而，媒体之间存在竞争，在波尔图的日报上尤其明显。Jornal de Notícias是开局最强的一家，拖累其他最初报道比较简短的报纸，La Voz de Galicia的情况也是如此。与来自A Coruña的报纸一样，《日报》也赢得了一些同事的批评，尽管与其说是由于其广泛的新闻报道，不如说是由于其对这两份西班牙报纸的所谓态度转变。O Primeiro de Janeiro在8月24日提醒它，但没有明确引用，这两个现在被认为是"值得普遍同情的可怜的女人"，几天前被描述为"不道德和褻渎"。据《O Primeiro de Janeiro》报道，这种态度的改变是由于伊莉莎和马塞拉在波尔图人民中逐渐引起的同情："事实是，除了一些或多或少的

直白的形容词外，媒体并没有敌视这两位加利西亚妇女，甚至在最初阶段也没有。相反，它成为他们最好的辩护律师。事实上，双方之间似乎有一种共生关系：马塞拉和埃莉萨因为报纸不尊重他们的谨慎要求，决定向他们提供信息，以换取对他们事业的维护。因此，在一次谈话中，当她的对话者自称是《新闻日报》的编辑时，伊丽莎愤怒地看着他，但马塞拉告诉他。

-既然他要在报纸上写他已经和我们谈过，我们希望他能说.....。

-什么？

-我们是两个可怜虫！....."。

新闻界在这一交易中更多地发挥了它的作用。它批评警察的行为，指责他们对西班牙当局的奴颜婢膝；它批评在没有正式提出引渡要求的情况下可能将被拘留者移交给西班牙，而它并没有公开反对，认为这是不人道的，违背了待客之道；它将埃莉萨和马塞拉在葡萄牙犯下的罪行描述为小事；它要求释放他们；它对他们的不幸给予了更多的信任，而不是对他们的呓语；它动员公众舆论来帮助他们。..此外，他们最终设法逃离葡萄牙的事实可能与媒体对他们的保护有很大关系。"在观察了葡萄牙人的这一行为后，地区主义者Revista Gallega的标题是："良好的教训"。与西班牙发生的情况相比，在西班牙，人们对埃莉萨和马塞拉提出指控，他们被说成是两个危险的罪犯，有些人甚至要求将他们"涂上柏油和羽毛，在街上游行，鞭打他们"，或者"用私刑，交给暴民肆虐"，而葡萄牙人则表现出他们的文化和同情心，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捐款，要求西班牙政府赦免。

"加利西亚地区主义者的理解是，加利西亚以"善良的卢西塔尼亚人"为榜样，为了部分补偿对这两个女人造成的伤害，也应该请求赦免她们，让她们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生活，"独自承受耻辱"，条件

是她们必须悔改自己的"疯狂"，并且不进行所谓的荒谬的婚姻。对它们的监禁，尽管可能"有些公正，但另一方面却非常残酷"，而且无论律师们如何评头论足，都无法补救他们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也不会损害第三方。

"的确，这两个国家的媒体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葡萄牙媒体看到他们在哭，就同情他们，成为他们的辩护人。加利西亚和西班牙新闻界的立场，看到他们是在逃亡而不是在哭泣，就不那么单一了。大多数报纸和杂志将这一事件描述为丑闻，他们自己也通过文章将丑闻扩大化。一些人呼吁对艾丽莎和马塞拉进行惩罚，认为"有教养的社会"不应该让这种行为不受惩罚。其他人要求或等待引渡，以便能够继续为他们的网页提供信息。也有一些人怜悯他们，请求宽恕。

"总的来说，各个社会的态度是什么？两国最初的反应当然是惊讶。两个女人彼此结婚当然是不寻常的。因此，每个人都对这个独特的故事感到好奇，并热切地阅读讲述这个故事的报纸。从这一点上看，在边界两边画出的情景是不同的。

加利西亚人和整个西班牙人都希望找到这两位老师并了解他们的冒险经历，但都遭到了挫折。教会当局谴责他们的行为，学术当局开除马塞拉的教职，司法当局下令起诉她并要求引渡她，这些行动把他们变成了两个不道德和犯罪的人，这种形象也被部分媒体所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把赌注押在他们的被捕上，或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所犯的罪行不应该不受惩罚。可能那些最可能被激怒的人要求进行惩戒，"从上述Revista Gallega的文字中可以推断出。然而，不能确定这是否是最普遍的态度。据La Voz de Galicia报道，有些人同情他们，有些人认为当局对他们的迫害是过分的。同情有时变成了钦佩，从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为《艺术报》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中更多强调的是艾丽莎的智慧，而不是她可能犯下的罪行"。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从埃利萨和马塞拉被捕的那一刻起就跟着他们在波尔图的街道上朝圣，嘲笑他们，对他们的故事进行戏谑的评论。人们的期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佩佩，现在被认定为马里奥，把自己变成了艾丽莎。但是，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一种新的观念就会占据上风，这种观念是由新闻界和有关妇女自己促成的：这是两个外国妇女，无助和贫困，她们对自己不经意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感到遗憾和羞愧，因此，她们理应得到事实上的同情和支持。

Bonaerense "新闻"

一些阿根廷报纸在1901年7月首次报道了"无主婚姻"，即在其庆祝活动一个月后。例如，《国家报》在17日这样做了，提供了马德里日报《El Imparcial》所发表内容的摘要，并在19日回应了同样来自马德里的《Época》。El Correo Español发表了其驻加利西亚记者Gerardo Sánchez的两篇广泛文章。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北方报》创造的--"Historia que parece cuento"，讲述了马里奥和马塞拉的故事。第二条暗指他们在南美洲的谣言，所以赫拉尔多-桑切斯警告阿根廷人要警惕没有什么胡子的丈夫，以防..... 9月，本报又刊登了两条关于他在葡萄牙流浪的新闻。Caras y Caretas杂志则刊登了Sellier的肖像，并附有简短的评论，标题是La Voz de Galicia。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加利西亚媒体也提到了这两个女人缔结的婚姻。每十年出版一次的《加利西亚生态报》在1901年7月、8月和9月几乎每期的"加利西亚新闻"部分都报道了这一案件，但非常简短和谨慎，同时对加利西亚报刊的持续报道表示惊讶，"尽管这一事件的性质很糟糕"。

1904年，当艾丽莎不得不面对新的司法程序时，阿根廷首都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7月16日星期六，《新闻报》的读者得到了它，其中包括一张照片：“。

„警察新闻

一个特殊的案例

没有男人的婚姻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角们

再婚丈夫

他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司法干预

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的情况相反，这一消息只维持了两天，因为《新闻报》在17日宣布“进程结束”。La Nación也没有给它超过两天的生命，而且处理得不太广泛，El Correo Español只给了它一天。后者用三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影射了詹森的投诉，批评了同事的小说式编年史，并祝贺法官迅速结案。它还指出，一些媒体所设想的“肥皂剧”可能是由于“两个主角是西班牙人”这一事实。El Eco de Galicia遵循同样的路线，并尽可能多地给出了总结：“我们不会再多说什么。我们的理解是，与一般的做法相反，某些事件的消息只应非常迅速地发出”。

“El Correo Español”和“El Eco de Galicia”在1904年为其读者提供的信息都比1901年少，尽管这两位女性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殖民地主要由加利西亚人组成，其形象必须得到维护，因此不宜深入研究这类问题。1916年《新加利西亚报》这样说，它批评其竞争对手《加利西亚报》报道在祖国犯下的罪行，因为这类信息可能“有损于加利西亚移民的良好声誉”⁴²。

"更具破坏性的是对移民在其目的地所犯罪行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女人曾做过女仆，她们可以为一种刻板印象的同性恋内涵做出贡献，那就是加利西亚女仆，它已经有了重要的性指控，因为人们相信--显然没有多少经验基础--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最终会进入卖淫的世界。努涅斯-塞克斯 (Núñez Seixas) 将这种刻板印象的特征描述如下："人物简单，无知，或多或少有些粗俗--尽管经历了社会进步--贪婪或比男人更贪婪，有时倾向于不道德或接近于卖淫的危险。"⁴³ 因此，谨慎的态度是强加的。

在《论坛报》、《日报》、《人民报》、《新塔尔日报》和《时代报》等报纸上，或在《Caras y Caretas》等杂志上，谨慎成为绝对的沉默。他们的编辑要么认为这条新闻无利可图，要么认为不适合处理它，不管它可能引起的兴趣"。

可以看出，在这第三种情况下，以Elisa和Marcela为主角的事件得到的新闻报道比前两种情况更少更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尽管有《新闻报》的最初冲动，但不知道如何或不想让这个成为持久的新闻，这个故事随着玛丽亚/马里奥的"重婚"、克里斯蒂安-詹森的谴责和这两个朋友的重逢而获得了额外的吸引力。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莱昂德罗-萨拉莱吉-梅迪纳 (Leandro Saralegui y Medina) 在1902年10月30日为《加利西亚生态报》写了一篇文章，那是在马里奥和马塞拉结婚一年后，可能是受这种情况的驱动。它的标题是"加利西亚的女权主义"，尽管它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暗指康塞普西翁-阿雷纳尔、罗萨莉亚-德-卡斯特罗或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而是暗指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名叫约瑟法-安东尼娅-马蒂的妇女。

"为了确定故事的位置，作者认为应该简单提及"加利西亚妇女特有的精神力量"。没有必要回到凯尔特人那里去证明这一点；只要观察他们所进行的"艰苦工作"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够了。斯特拉波已经

注意到了这一点："女人和男人一样强壮，甚至可以做最重的工作：她们做农活；她们一生完孩子，就已经在为男人服务，这些人是代替他们铺床的"。因此，任何反映加利西亚妇女"阳刚之气"的事件都不应该令人惊讶。即便如此，萨拉雷吉还是对他所转录的文件内容感到惊讶。

Josefa Antonia Marti，拉科鲁尼亚人，18岁，四年半来一直在皇家船只上担任客舱服务员，隐瞒了自己的性别；国王陛下授予她每天3雷亚尔维隆。根据皇家命令，我在此通知阁下，请您注意，也请您注意由此带来的影响。圣伊尔德丰索，1801年9月29日--绅士--多明戈-德-埃尔南尼先生。

"令人惊讶的是，何塞法-安东尼娅不是普通的水手，因为她加入了海军，这需要特殊的性格和勇气。这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妇女成功地通过了测试，证明了妇女可以在最艰苦的战争中与男子竞争。因此，她是加利西亚"女权主义"的见证。伊莉莎/马里奥也是加利西亚"女权主义"的见证吗？萨拉雷吉对此只字未提，但在每个案例中，异装癖的情况都很不同。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19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La Courrier de la Planta》确实提到了这种联系，指出有些人把"没有男人的婚姻"解释为一种"新的女权主义形式"。

"易装癖者确实可以被视为前卫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预见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些要求的实现：进入大学，行医，参军，自主地行走于世界，避免异性婚姻或与同类结婚。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个人这样做的事实，因为不存在集体的伪装，也不影响他们的伪装在蔑视父权制的同时承认它，因为这是一个同义词的观察。事实上，随着对妇女的一些歧视的消失，出于社会动机的女性异装癖也在下降。

"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公开宣布他们欣赏异装癖。我们已经知道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是多么欣赏"卡洛学校的女校长";卡门-德-布尔戈斯呼吁巴斯克女英雄卡塔利娜-德-埃劳索,她曾在新大陆穿着男装作战,要求获得妇女的军事权利;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对乔治-桑表示钦佩,尽管他们并不"钦佩她"。

"法国妇女马德琳-佩利蒂埃(Madeleine Pelletier)坚信,妇女"只有通过男性化才能解放自己",⁴⁴她穿长裤是为了舒适,但"首先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Lillian Faderman在其关于女同性恋历史的研究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易装癖者是第一批女权主义者;Carmen Blanco在追溯女权主义的历史时,强调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易装癖的同情,因为它具有"越轨和反叛的特性";Laure Murat在其关于"第三性"的研究中认为,解放的女性将首先是"穿裙子"的人,至少是以一种形象的形式⁴⁵。

朋友和恋人

"费利佩-特里戈,《爱的诱惑》的作者。《社会教育》,这部小说再现了马塞拉和伊丽莎的故事。

他同时代的人是如何解释艾丽莎和马塞拉之间的婚姻的?解释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朋友和情人,尽管其中一个和另一个并不相互排斥,因为情人的条件包括朋友的条件,而情人的条件可以从朋友的条件中窥见。

我们将首先分析费利佩-特里戈在他的作品《La sed de amar》中为我们提供的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形象，该作品曾多次出版，首次发表于20世纪初，也就是说，当时媒体正在处理“没有男人的婚姻”。这个故事是围绕豪尔赫的爱情生活展开的，这当然是多产的，因为在第194页，当回顾他的感情轨迹时，主人公列出了17个女人⁴⁶。

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小说的第四部分，因为正是在那时，豪尔赫与罗莎再次相遇，她是他青春期的初恋之一，从未表白过，尽管“在某个场合，他开始给她写信，但他从未完成。一天下午，这种吸引力变得更加强烈，当从栅栏上观察公牛时，他抬头看了看她占据的箱子，看到了她裙子之间充满希望的深度，这将使他在未来的许多夜晚做梦——斜体是特里戈的——”。

“现在罗莎在一个叫阿尔马拉斯的遥远的小村庄里当老师，她的表妹克劳迪娅陪着她。在罗莎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克劳迪娅在特里戈称为阿尔盖莱斯的小镇上的普通学校担任助理。”他们不想见任何人，总是在师范学院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睡觉……”。在非常容易产生流言蜚语的阿尔盖勒兹，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例如，有人说罗莎“是她表哥的心上人的宠儿，她同时和他们两个人上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罗莎是马塞拉的文学成绩单，克劳迪娅是艾丽莎的文学成绩单。

当豪尔赫偶然再次遇到罗莎时，他知道她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女人。在经历了充满失望的多愁善感的生活后，他终于找到了能够适当满足他对爱的渴望的源泉。自他们最后一次相遇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这对她有利。她更有女人味，更漂亮，并保持了她以前的杰出地位，尽管她现在在一个修养很差的环境中从事着一个谦虚的职业”。

"罗莎从根本上拒绝与豪尔赫进一步会面，不是因为她对他无动于衷，而是担心她的表妹会发现。"克劳迪娅对我意味着一切.....我尊重她。当我的家人离开时，就像她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所以最好是豪尔赫离开，不要再回来。"此外，我还不值得你....."。

豪尔赫对这些话进行了反思。罗莎无疑指的是她曾是"表哥的宠儿"，而表哥后来却抛弃了她。这样的情况在社会上可能会使她蒙羞，但在他自己的眼里不会，因为他在经历了这么多次失望之后，不是在寻找荣誉，而是在寻找爱情。他还反思了两个表兄妹之间的关系。如果以前他认为这是兄弟般的关系--"可怜的女孩，在所有人的无助中兄弟般地拥抱着反对他人的邪恶！"--现在他认为这是母性的关系--"这个天真的女孩的折磨在他看来是多么美丽，而那个更有经验的克劳迪娅的母性关怀是多么庄重！"。

"不顾她收到的警告，第二天她又回来寻找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也是如此。当老师越来越多地留心观察时，他们离开了学校，沿着河岸漫步，小心翼翼地避开窥探的目光。他们互相倾诉。他向她讲述了他的恋情以及这些恋情在他身上留下的苦果。她向他讲述了她的表哥，他奴役了她。她是"任性的、暴力的、非常奇怪的.....在她奇特的感情中几乎是残酷的，只要有一点预感罗莎可能会抛弃她，她就充满了恐惧和愤怒....。我是... 我不知道... 他的奴隶！一个他说他"非常爱，的奴隶，一个他永远爱的奴隶，因为他不打算结婚！他说他不打算结婚。而不是像乔治听到这些话时想的那样，因为她是丑陋的；相反，她是美丽的。"比我高，比我瘦，非常聪明。但她.....，非常罕见，太傲慢了，不能嫁给任何谦虚的人.....我们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她憎恨男人！"。不，她没有和他说过他的事，也不会和他说，因为如果她发现了他们的关系，不管豪尔赫宣称他是多么好心，他都不会让她离开这个家。即便如此，豪尔赫还是理解这个女人，她是罗莎留下的唯一避难所"。

在他们第一次散步时，除了倾诉，他们只交换吻。他们在乘船前往河边形成的一个小岛的那天也是如此。豪尔赫注意到--他在第一天就已经注意到了--罗莎知道如何以他不习惯的方式接吻，并问她是谁教她的。"你！"回答是有点迟疑，豪尔赫没有坚持。为了让她放心，他重申他打算尽快娶她。必须让克劳迪娅意识到这一点。不可能的，她不允许这样做。"我永远不能结婚！永远不能！"，老师流着泪说。而乔治，以前是理解的，"现在恨透了克劳迪娅的不可理喻的暴政"。他准备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结婚。"也不能说："不可能！更糟糕！... 你必须在事后厌恶我....。我想告诉你的事情... 哦，不可能 乔治以为她的意思是她曾是"她表哥的心上人的宠儿"，于是让罗莎知道，无论在婚礼之前还是之后，他们能告诉她的一切都不会影响她。罗莎不知道她的求婚者的想法，困惑地思索着这些话的含义。乔治不可能知道她的"可怕的秘密"。但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问她是谁教他这样接吻的？

当他们到达岛上时，乔治又开始了谈话。为了让她放心，他告诉罗莎他假设她害怕克劳迪娅会告诉他的话：她知道她有一个情人。她惊呆了，但豪尔赫坚持说。应该为他以前的风流韵事道歉的是他，其中一些是臭名昭著的，而不是她。他正试图解除克劳迪娅的武装，而克劳迪娅正在对罗莎实施暴政。这一次，他也不对："。

"不，不；是她在努力给我一个休息....。啊，她... 她支配了我... 她... 我们被遗弃在阿尔盖勒兹，如此孤独! 我的悲伤，我的感情，被收集在克劳迪娅...在...。我习惯于服从她，顺从地，奴颜婢膝地.....她就是她的一切.....。是的，我们都向对方发誓，哭着说，一个晚上，永远不结婚，永远不分开，当时我的父母抛弃了我！.....我不能嫁给你!!!!。

"是这个誓言，而不是其他什么，阻止了她，但即使没有这个誓言，无论她多么爱，无论她多么是个处女，而且她确实是处女，她都不

能。乔治已经知道了前者，而后者他将在那天晚上发现，就在那里，在岛的中央，他们两个人在月光下独处”。

“在随后的日子里，聚会和恋爱仍在继续，有时在乔治的家里，有时在河边。直到收到一封信，宣布豪尔赫的妹妹洛拉病得很重，要见他。豪尔赫必须去桑坦德，他想在罗莎的陪同下这样做。再一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丑闻会跟着他们”。罗莎留在克劳迪娅身边，试图得到她对婚姻的许可。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她在离岛时怀孕了。如果她不是为了自己而同意，她会为了她所期待的孩子而同意。

豪尔赫，我相信她的感情，因为她爱我，是的，克劳迪娅爱我，让她对我的不幸感兴趣，当她看到我哭的时候.....当她看到我不仅仅是为你哭，也是为不幸的.....。我的乔治在我的子宫里留下的孩子；如果她要留住我，那她岂不是疯了和邪恶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告诉她任何事情：她会看到无法补救的事情，而这将是打破她.....。我的誓言！

“在桑坦德，豪尔赫收到了罗莎的几封信，他与姐姐讨论了这些信，姐姐的病越来越重。在7月9日的最后一封中，他告诉她克劳迪娅已经知道了他的恋情，并要求她不要有任何举动：“不要给我写信，不要来，不要做任何事情。”他相信我有能力说服克劳迪娅相信我们的爱情，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可能就会永远毁掉。他这样做了。

八月底，罗拉的丈夫给她一份报纸，暗示她会对其中的信息感兴趣：“Auszug a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Narcissus”。

阿尔盖勒兹的事件

妇女的婚姻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刚刚结婚的女人，一个对另一个。他们是克劳迪娅和罗莎，或者换句话说，艾丽莎和马塞拉。如果有任何疑问，费利佩-特里戈在脚注中指出："西班牙读者会清楚地记得拉科鲁尼亚的一个类似案例"。然而，也有一些区别。主要的区别是，克劳迪娅和罗莎没有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回到邓布里亚--特里戈可能认为马里奥和马塞拉的真实故事太鲁莽了--而是在婚礼后以两个女人的身份回到阿尔马拉斯。在那里，他们让邻居们知道，罗莎的丈夫胡里奥-拉米雷斯不在他们身边，因为他被迫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实际上，这个拉米雷斯是两个女人的亲戚，她在12岁的时候就死了，克劳迪娅在婚礼仪式上给了她生命。他们曾计划在一段时间后宣布他的死亡。如同艾莉莎和马塞拉的情况一样，欺骗行为被发现，克劳迪娅和罗莎不得不逃离"。

"女主人的自由意志"。在同一天的3小时40分钟的下一期节目中，事情得到了澄清：婚礼的目的是为罗莎正在期待的孩子找到一个父亲。"因此，这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恶性反常，而是某种慷慨和崇高的东西，激起了公众对逃犯的虔诚运动"。但还没过两个小时，"恶习"又出现了，这次是单数："罗莎生活在克劳迪娅燃烧着的悲惨激情的支配下，"她在得知怀孕后，强迫她结婚，以便给她提供产假保障，更重要的是，阻止她与情人结婚。

"随着这个"婚姻的漫画"，豪尔赫最终失去了他的爱人罗莎，她因此加入了玛塔、梅赛德斯、贾斯蒂娜....。但他并不憎恨或指责所有这些妇女，她们是虚伪和压抑社会的受害者，而是怜悯她们："可怜的妇女！"。可怜的受害者，即使在堕落中也是高贵而优雅的....."他曾将克劳迪娅定义为"一个在虚伪和压抑的社会中成为受害者的女人"。

他在前几页将克劳迪娅定义为“歇斯底里”，而现在，他知道了他所知道的，他重申了这个形容词，但没有仇恨，试图描述而不是诋毁。然而，他感到遗憾的是，罗莎抛弃了他，认为她的表哥有争执要把他们分开。如果他愿意原谅她这个“真正的情人”，他怎么能不原谅她与克劳迪娅“玩”过的“爱情”呢？如果那是恶习，根据该报的说法，那也是一种轻微的恶习，仅限于“女人之吻”，与男人--包括豪尔赫--的恶习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妓女之间寻求解救他们对爱情的渴求。

“生活环境使罗莎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解救了她对爱的渴求。被她的家人和朋友抛弃，被豪尔赫忽视--“你们都忘记了我？你也是！”，她在岛上责备他--，她倒在克劳迪娅的怀里，同样孤独，再也无法挣脱。“可怜的受折磨的女人，相信并想用永恒的誓言将自己理想化！”。

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小说的核心是豪尔赫的爱情故事--他与罗莎建立的最后一段爱情，而不是克劳迪娅/艾丽莎和罗莎/马塞拉之间的关系。费利佩-特里戈可能是在报纸处理“没有男人的婚姻”时写的剧本，这使他有机会让豪尔赫经历最后一次不可能的爱情，这一次的原因与毁掉以前的爱情的原因完全不同。“克劳迪娅只是作为罗莎和豪尔赫之间爱情关系的一个障碍出现。她从来没有被说过话，我们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她的表妹所传达的。一个矛盾的形象，因为她既是保护者又是暴君，既是爱又是残忍的形象。

“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情欲关系并没有明说。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像豪尔赫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是简单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可怕的秘密”，但不知道是什么，尽管我们可以直觉到。无论如何，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玩弄爱情的女人，就像玩弄洋娃娃一样。一个不冒犯或威胁任何人的游戏。

一种连名字都没有的爱--既不是部落主义，也不是安全主义，也不是女同性恋，也不是同性恋，也不是性倒错--缺乏一致性。豪尔赫没有认识到它的实质，认为它是环境的结果。即使在两个女人结婚后，他

也不承认克劳迪娅的爱有可能与他自己的爱竞争，即使现实掩盖了这种可能性。女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为真正的关系做准备，正如法国人布兰托姆在16世纪已经预料到的那样："在他们互相取暖和迷恋之后，他们的热情不会减退，他们必须在流水中而不是在死水中洗澡....."。
47.

"费利佩-特里戈的文学再现反映了我们的主人公所受到的两种观点的影响。一些人理解为，这桩婚姻是由于马塞拉怀孕，因为马里奥向维克多-科尔蒂亚拉坦白，这一点在大众记忆中一直存在。她的亲密无间的朋友同意与她结婚，以便为即将出生的孩子提供掩护，从而避免玷污准妈妈的名誉。这是阿科鲁尼亚、马德里和葡萄牙的报刊（我们已经看到）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刊提出的主要假设："Caso extraordinario de amistad"是主持在《Caras y Caretas》上发表的塞利尔肖像的副标题；"Intriga generosa"或"La dama caballero"是《新闻报》为伊莉莎/马里奥/何塞/玛丽亚主演的戏剧提出的标题，"y sería en verdad un título de nobleza"（《一个非凡的友谊案例》）。尽管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怀孕的假设，还有一些人把这个谣言归结为马塞拉想要证明她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其他版本，包括费利佩-特里戈（Felipe Trigo）的文学版本，强调伊莉莎不仅同意了这桩婚姻，而且还强迫它，甚至威胁说如果马塞拉不接受求婚就自杀。在任何情况下，从这个角度来看，能解释伊莉莎行为的不是女同性恋，而是利他主义，即使它有些专制。

在向葡萄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伊莉莎声称她与马塞拉结婚是为了保护她："在小地方，妇女经常成为迫害的受害者。诽谤者也不会休息片刻，所以我采取了这一步骤，使她身边有一个男人为她辩护....."。当被问及他是否试图掩盖一些"过错"时，他将这种假设描述为"记者的捏造"："我会告诉你真实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故事... 小说，

胡说八道，一言以蔽之。在我国有一位医生是真正迫害马塞拉的人。激情四射，或假装激情四射，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残暴地迫害我的同伴。为了释放她... 我娶了她。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旦法官宣布他们的第二次婚姻有效，艾丽莎/玛丽亚同意向记者解释第一次婚姻的存在理由，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现在的论据--虽然不是细节，但本质上是吻合的，因为伊莉莎的想象力并不缺乏--马里奥曾对维克多-科尔蒂亚拉说过，让他为马塞拉洗礼并结婚。这是《拉普拉塔报》对她1904年6月18日的发言所作的总结。

"玛丽亚-桑切斯和康苏埃洛-加西亚[Marcela Gracia]是两个多年来一直有联系的亲密朋友。1899年，住在哈瓦那的玛丽亚的一个兄弟回到西班牙住了几个月。当他去看望他的姐姐时，他遇到了康苏埃洛-加西亚并坠入爱河。这两个年轻人订婚了，婚姻将在年轻人离开古巴之前举行。但有消息称，桑切斯突然被传唤到哈瓦那。他要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然后马上回来结婚。如此匆忙的离开，如此迫不及待的返回，使这个年轻人从他的未婚妻那里得到了她本应保留给他的宠爱，直到他结婚的那一天"。

但他刚到哈瓦那，这个年轻人就死于黄热病，而当康苏埃洛-加西亚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她刚刚得知自己怀孕了。

玛丽亚-桑切斯和她的朋友一样，对他们遭遇的双重不幸感到痛苦。她决心使康苏埃洛免受耻辱，由于她一直有男性的气质，她发明了计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男人，与康苏埃洛订婚，如果不是在法律面前，至少是在教会面前。因此，他给母亲一个丈夫，给孩子一个父亲。如果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严酷生活迫使她与同伴分离，她会接受这个角色并将其发挥到最后。

"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使她们在或多或少的时间里分享她们的生活，是比较常见的。他们被称为"浪漫的友谊"，并且在1885年被亨利-詹姆斯在其作品《波士顿人》中描绘后，也被称为"波士顿式婚姻"。他们的存在要求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拥有必要的资源，使这对夫妇能够独立生活。由于它没有被赋予性的层面，这种类型的同居通常不会引起社会的排斥。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人们认为普通妇女的性本能是相当沉睡的。正如一位苏格兰法官在1811年就针对两名妇女的不道德行为的投诉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在床上进行不道德行为，是没有丝毫可能性的。[.....]如果一个女人拥抱另一个女人，这毫无意义"48。

"对于阿尔盖勒兹的人们来说，就像这位苏格兰法官一样，很难想象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自主性行为的可能性。要想有性，就需要一个男性形象，所以他们把罗莎想象成她表哥爱人的情妇。

两个女人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能在床上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由医学来回答。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1862-1939）虽然承认对女同性恋的性行为知之甚少，但他强调了除手淫之外的两种色情行为的重要性：Tribadism和Safism。

"前者包括将阴蒂引入阴道malterius--在这种情况下，专家们为了试图掩盖某些内容而采用的拉丁语是diaphanous--尽管根据他的临床记录，这是不寻常的，因为"没有阴蒂，无论其尺寸多么畸形，都能让一个女人进行这种行为"。哈维洛克-埃利斯（1859-1939年），另一位最著名的性倒错学者，也持这种观点："我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阴蒂的大小]已经达到了允许它与另一个女人性交的程度"，尽管他引用了基尔南的报告，在美国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到6厘米的阴蒂。在埃利斯看来，据称巨大的阴蒂的案例最常被解释为男性的假性两性畸形。莫尔也没有相信他的同事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的论点，塞缪尔

-奥古斯特-蒂索 (Samuel-Auguste Tissot) 也预见到了这一点，即女同性恋的情欲会导致阴蒂增大：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事情可能发生⁴⁹”。

"无论如何，雷尔多-科伦坡认为他在1559年发现的附属物--这一发现被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 (Gabriel Falloppio) -⁵⁰所争议，随着精神病学对这一领域的占有，他的肥大正在失去解释女同性恋的力量，在20世纪初构建的关于女性同性恋的男性论述中重新出现 并焕发出活力。对于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奥古斯特-福雷尔 (Auguste Forel, 1848-1931) 来说--他的作品被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认为是所有对性问题感兴趣的人所必需的，就像埃利斯和伊万-布洛赫的作品一样--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位置。这一点值得让人解释。

女同性恋的爱情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因为简而言之，阴蒂的位置相当差，而且交媾，特别是当男人的射精来得很快时，通常不能满足女人。因此，相当数量的正常的、有点文雅的妇女喜欢通过诉诸女同性恋的爱来给自己带来高潮。这种爱有它的变态者 "俱乐部"，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同性恋，无论是遗传还是出生”。

"因此，一些不是 "颠倒"，而是 "有点文雅 "的妇女，最终变得 "变态"，因为她们在平等者中获得了男人无法提供给她们的满足。如果他们落入真正的 "颠倒者 "手中，他们无疑会发现，他们在酒精的鼓励下狂欢，不会停止： "Tribaditas的过度行为在强度上超过了颠倒者的行为。一个高潮接着另一个高潮，日日夜夜，几乎不间断；然而这些倒置的花痴并不常见"，我们的作者总结道，为了他自己和读者的安宁⁵¹”。

"根据莫尔的说法，女同性恋的第二种也是最常见的快乐形式是安全主义： *lambendo lingua genitalia*。对于主动和被动的角色是否被硬性划定，或者是否可以互换，存在疑问。阿尔伯特-莫尔说，他不知道

在巴黎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一些报告记录了舔阴行为中的角色交替，但在柏林，他的数据表明，组成女同性恋夫妇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有相当严格的划分，在某些情况下，当后者寻求角色转换时，前者决定结束这种关系⁵²。

这些性行为，tribadism和safism，也是为了给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一个名字。但正如劳普茨博士（1870-1937）所警告的，以及米歇尔-福柯后来提醒我们的，"[性]颠倒指定的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倾向"，它预先存在于其实践中⁵³。

"精神病学家，一些女权主义女同性恋的历史学家声称，对这两个朋友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他们将迄今为止普遍认为是无辜的"女士游戏"认定为变态；他们促成了将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分开，并创造了男性倒立的陈规定型。然而，也有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性学的其他后果：它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了论据，使她们有了一个身份，无论多么病态，并通过呼吁居住在她们身上的独特性质来捍卫她们的权利⁵⁴。

据我们所知，马塞拉的父母不需要精神病学的启蒙，就能察觉到他们的女儿与埃莉萨的友谊是危险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尽一切可能，尽管没有成功，将他们分开"。

"新闻界在庆祝结婚后处理埃莉萨和马塞拉的问题时，一开始就把他们的关系描述为非同寻常的友谊案例，但很快就使用了更精确的名词或形容词。一些报纸将这个故事描述为"女同性恋的浪漫"，尽管最常用的术语是Sapphism，当时在巴黎也是如此："Las bodas sáficas o las casadas de la Coruña", "Safos gallegas", "dos Safos modernas", "drama sáfico"或"pobres discípulas de Safo"。为了使人们对正在审议的事项的性质没有疑问，与《加利西亚之声》合作的法学家之一签署了Licenciado Safo"。

一些作家引用文学作品来向读者说明埃莉萨和马塞拉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与精神病学的作用一样重要的是，绘画和文学也与媒体本身一起，为女性友谊打上了性的烙印⁵⁵。马德里报纸《祖国报》在这方面指出，"目前的情况并不新鲜：在《娜娜》中，左拉展示了一个荡妇军团，他们在蓝调的爱情中寻求[异性]性爱不再给予他们的东西"。另一些人没有给难以名状的爱情命名，但警告说它的不道德行为"不需要裤子"，就像"失去了一个省长的职位以及加马佐和毛拉与政府首脑的分歧"（附件七）那样。

"因此，Elisa和Marcela是萨福的两个弟子，对于当时的医学来说，是两个生病的女人。很大一部分媒体都从这个角度看待他们。"没有人为了犯罪而犯罪，也就是说，为了享受被起诉和迫害、被社会鄙视和诅咒的乐趣，在实施某些行为时，几乎总是主持着某种道德偏差或精神障碍，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应该激发人们的同情心"；一种"凶猛的不平衡"破坏了他们的大脑；"在加利西亚的两个癔症患者打破了加利西亚人单调的和平生活"；"两个堕落者，两个癔症患者，或者两个可怜的女人。"

"在《La Voz de Galicia》的版面上借自己的名义写的医生在诊断上更加精确。这是一个"基因意义上的颠倒"，也就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奥托-韦斯特法尔（1833-1890）在1870年所描述的"相反的性感觉"，一种先天性的变态，包括"一个女人在身体上是女人，在心理上是男人，另一方面，一个男人在身体上是男人，在心理上是女人" ⁵⁶。56来自阿科鲁尼亚的医生继续说，这种类型的反转出现在"受神经紊乱影响的人身上，他们的想象力活泼而兴奋，他们的机体从童年起就有神经症的倾向"。法医学（佩德罗-马塔）和精神病学（菲利皮、祖卡雷利、塔尔诺夫斯基、隆布罗索、沙尔科和马格南）已经处理了这些"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在古希腊非常有名，莱斯伯斯的萨福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其他萨福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据我们跟踪的医生说，祖卡

雷利在《L'Anomalo》杂志上对倒立的女人的描述完全符合埃莉萨/马里奥的体型，从塞利耶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也符合认识她的人所说的心理。诊断的结论是建议Elisa入院，但也建议Marcela入院--应该强调的是--进入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Conxo庇护所，而不是进入阿科鲁尼亚的监狱。

最后，我们认为马里奥-伊利萨和马塞拉都是两个病人，他们的神经病没有受到法典的惩罚，但他们在康克索的庇护所里有一个部门可以占据，在那里也许他们不会被治愈，但会被聪明的桑切斯-弗莱雷研究，至少在那里被禁锢的我们会避免他们的疾病蔓延，这种疾病通常会通过实例传染，幸运的是在我们加利西亚省不仅不多，而且非常罕见⁵⁷。

"在与我们有关的故事中，谁扮演男人，谁扮演女人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看一下塞利耶的画像就够了。J. V. T.也承认了这一点（许多写这个故事的人都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身份，这一点很了不起），这位图形学家根据一位朋友从阿科鲁尼亚的一个教育中心，可能是"师范"学校寄给他的两份样本，分析了伊丽莎和马塞拉的笔迹。他承认自己是兼职，并将自己的发现归咎于让-希波吕特-米琼，他声称要遵循米琼的规则，尽管两位老师的亲笔签名"非常典型，标记完美，各有各的性别"，因此很难对"伪男性"和"自愿受骗的女性"的个性产生混淆。以下是他的一些结论：与埃莉萨/马里奥的演绎性和有点直觉的智慧相比，马塞拉的纯粹演绎性；与前者的不敏感相比，后者的极端敏感；与坚定的意志相比，软弱；与自私相比，某种慷慨；与埃莉萨/马里奥的"精力充沛和非常阳刚"的性格相比，马塞拉的性格以其温柔而闻名"。

"新闻界对"没有男人的婚姻"的表述完全符合"倒置"计划，它在同性恋人夫妇中再现了异性恋人夫妇的不对称特征：其中一个成员扮演"强势-保护-主动"的角色，另一个则扮演"弱势-保护-被动"⁵⁹。

是Elisa向Marcela提出了可怕的建议，在她与男人发生关系时虐待她，向其中一个男人发起决斗，使用左轮手枪，强迫她嫁给她....。对于当时的精神病学来说，她会吹口哨并不奇怪--"她的口哨吹得出奇的好"，阿尔伯特-莫尔在《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历史》中写道--她在黄昏时分从卡洛走到邓布里亚的路上去见她的朋友时，也会吹口哨。拉德克利夫-霍尔还让《孤独之井》（1928）的主人公斯蒂芬-戈登成为倒置女性的医学模型的文学化身，whistle⁶⁰。

"马塞拉是作为埃莉萨的"受害者"出现的，她只是以典型的女性温顺的态度跟随埃莉萨的狂言。在这个意义上，El Suceso Ilustrado提供的采访版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假装是原创，而一切似乎都表明它是《新闻日报》发表的采访的副本。这位葡萄牙记者起初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身份，他在监狱里审问了这两名被拘留者。马塞拉几乎承担了答案中的所有主角，并被认为比伊莉莎"更有同情心"，她完全被伊莉莎支配，甚至到了乞求批准她话语的地步。当采访者质疑这段婚姻的合法性时，马塞拉声称这段婚姻的基础是伊莉莎的雌雄同体，并称其为"亵渎的喜剧"，"老师宣称她是个可怜虫："Fui descendo, descendo, até cair na lama ! ..."。El Suceso Ilustrado向其读者转达的话语如下："是的，这是真的....。我不想.....，但我不自觉地参与了他的意见，接受了他的计划，直到我在这种致命的激情的火焰中燃烧起来"。仅仅凭借喇嘛（泥）和火焰的可能混淆来证明这种翻译（让我们这样称呼它）是过分的；相反，它似乎是以根据记者以前的计划来调整现实的借口为条件的"。

对于不太熟悉医学作品的邓布里亚人来说，女性"反转"有一个不太有文化的名字，但产生了类似的效果："El Marimacho"。当他们在这

两位教师居住的房子前组织了一次围观时，他们就是这样要求Elisa/Mario在场。伊莉莎别无选择，只能逃亡，而马塞拉还能继续当一段时间的教师。

如果在伊莉莎的身上发现了任何雌雄同体的迹象，正如她所声称的和她的朋友所证实的那样，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宾（1840-1902）会将她描述为“雌雄同体”，而劳普茨医生则描述为“先天性雄性倒置”，而且两人肯定会特别注意解剖学检查，因为正如后者所认为的，有些先天性倒置者是雌雄同体的邻居⁶¹。“奥托-魏宁格在20世纪初写道，在“性倒置者”中总是“在解剖学上接近另一性别”，并向环境主义理论的捍卫者提问：“但谁是第一个诱导者？他是否受到雌雄同体神的指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明确地将同性恋欲望与身体上的雌雄同体和性格上的颠倒区分开来，但他在提到妇女时肯定地说，“积极的颠倒者往往呈现出男性的身体和精神特征，并在其性对象中要求女性的特征”，即使他承认女性同性恋中存在多种变种⁶²。

⁶² “相反，马塞拉很可能被归类为偶然或意外的倒置者，并被列入“性心理雌雄同体”的范畴，这是克拉夫特-艾宾区分的四个类别中第一个也是最温和的类别，其定义是对两种性别的吸引共存，强度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最后，事实证明，雌雄同体者很可能是马塞拉而不是伊莉莎。为了解释他们的行为，没有必要求助于科学研究或哲学推测，因为流行的说法已经足够了：是男人的缺乏解释了他们对女人的吸引力。如果阿科鲁尼亚的师范学校是男女同校，而不是女校--也就是说，如果她在第二共和国期间在那里学习，她的性本能肯定会得到适当的引导。她是简单的变态；伊莉莎则是变态。实际上，对于当时的医学来说，马塞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倒置”。”

但是，埃莉萨和马塞拉的心理状况--主动/被动，诱惑者/受教育者，刽子手/受害者--、他们可预测的病因--先天/后天--以及治疗的预后--

不利/有利--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一致。对于就本案发言的另一位医生Daniel Bascuñana Charfolé来说，Marcela并不是Elisa的受害者，而是两人都是"导致最可怕的疾病以及公共和私人障碍的社会传统主义"的受害者：这种传统主义认为妇女需要在结婚前保留"脆弱的薄膜形式的证词，往往是虚假的"，这种传统构成了"反生理的、令人不安的、甚至残酷的否决"。在"相对美德"中保持贞操--绝对美德没有被提及--只允许培养一种不平衡的感官，因为刺激缺乏必要的深度，基本上只限于生殖器官的外部。这种"相对的美德"与埃莉萨和马塞拉所实行的"萨菲式的激烈"是一致的，这在她们身上激起了"与所发展的性感相一致的激情"（附件八）。

"来自阿拉贡的药剂师、犯罪学家和作家何塞-玛丽亚-拉纳斯-阿吉拉尼多则将16世纪庆祝的埃莱娜/埃莱诺-德-塞斯佩德斯和玛丽亚-德尔-卡尼奥的婚姻与我们的两位妇女的婚姻联系起来。在讲述了埃莱娜/埃莱诺的故事（其中出现了雌雄同体、异装癖和鸡奸）之后，他提出了诊断：塞斯佩德是一个"倒置的"或"处女"。她所患的"基本心理病"无疑与她的原始主义有关。她是一个黑奴的女儿，她自己也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她的轨迹表现出隆布罗索归因于"野蛮人"的那种"原始灵魂"的一些特征。持续的游牧生活--拉纳斯-阿吉拉尼多（Llanas Aguilaniedo）统计了多达33个居住地，减少了妆奁，频繁更换职业，情绪不稳定，道德标准下降，遭受残酷的残害，她无耻地谈论这些，她的迷信性格和她对狂欢和斗殴的喜爱。她之所以接近原始主义，还因为她是个女人，因为正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醒我们的那样，人们已经知道，在女人身上"善良的原始野蛮人的倾向"仍然特别强烈63。

"通过与玛丽亚-德尔-卡诺结婚，违背了基本的社会规范之一，埃莱娜/埃莱诺为我们提供了她的反转的最有力的证明。同样证明埃利萨/马

里奥反转的是他与马塞拉的婚姻，阿拉贡作家将其置于同一谱系中：“整个西班牙都在谈论这桩婚姻，并为之感到羞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处女伊莉莎-马里奥的才华胜出，就像埃莱娜[de]塞斯佩德斯的才华一样，婚礼举行了。

然而，这位作者并没有否认“同性恋伴侣”的婚姻便利性。他认为，同性恋者在异性恋框架中永远找不到位置，这只能把他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如果不是一个“疯子”或一个“危险的痴迷者”。“另一方面，与另一个同性恋者交配，他被安抚，可以对他人有用。他最后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如果社会还没有面对这个问题，“肯定有一天，无论今天我们看起来多么悲伤和不愉快”，它都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为什么现在不认真处理呢？”⁶⁴。

“那是在第13/2005号法律批准前的一年，也是整整一个世纪，它给了人们很多的话题，几乎和马里奥和马塞拉之间的联络一样多。事实上，来自阿科鲁尼亚的教师作为同性恋伴侣之间婚姻的先驱的平反变得更加激烈，因为使他们成名的标题“没有男人的婚姻”失去了力量--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悖论。有些人甚至认为，Elisa/Mario和Marcela的婚姻是“西班牙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桩也是唯一一桩同性恋婚姻”。⁶⁵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婚姻，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尽管不是很多。Llanas Aguilaniedo不得不回到16世纪去寻找前人--，而且无疑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人。如果它的两个主人公没有胆量以夫妻身份回到邓布里亚，我们可能也不会知道“没有男人的婚姻”的情况。

“Elisa和Marcela是女同性恋者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一些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甚至是无礼的，在阅读了我们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一切之后，在西班牙皇家学院赋予这个形容词的第一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概念上的标准，也取决于方法上的标准，也就是说，取决于对女同性恋的理解和确定历史事实所需的证据类型⁶⁶。

西班牙女同性恋的主要代表之一，比阿特丽斯-吉梅诺承认，女同性恋的定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女同性恋可以通过女同性恋者的特殊性质来解释，或者它也可以是向所有妇女开放的一种选择，与女权主义密切相关？为了将一种关系定性为女同性恋，是否必须涉及性-生殖行为，或者存在情感纽带、色情吸引和或多或少的性行为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似乎很清楚，女同性恋的经历和身份并不符合单一的模式，正如第一批专家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尽管他们的理论有非常有限的经验基础：女同性恋可能是本质的或偶然的，严格的同性恋或双性恋，早期或晚期，强烈的性行为或较轻的性行为成分⁶⁸。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许多女同性恋者声称出于政治原因选择成为女同性恋者，或者，如果她们没有有意识地做出这种选择，则说她们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女同性恋者，她们更快乐，因为她们发现女性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了她们在与男性关系中所没有的品质。当然，还有许多妇女认为，她们对妇女的吸引力完全是性方面的，而且一直存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她们既能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也能与女人发生感情；许多人知道，在成为女同性恋者之前，她们是异性恋；有些人认为，在与女人发生关系之后，她们再也不会与男人发生关系，但还有一些人回到了异性恋状态...⁶⁹。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鉴于有关妇女的证词并不丰富，有关她们之间关系的证词更少，而且明确提到她们的性活动的情况也很少，对女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苛刻，将大大减少可以归于这种情况的妇女名单。关于异性恋行为的证词也很少，但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具体证据。男性同性恋的历史学家对这种情况提出警告，一些女同性恋的历史学家声称，对她们来说，要证明生殖器接触的存在甚至比男性同性恋还要困难⁷⁰。

从广义上理解女同性恋，即阿德里安-里奇提出的那个有争议的女同性恋连续体，对埃莉萨和马塞拉的女同性恋是毫无疑问的⁷¹。有证据和证词证明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有强烈的情感关系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保持在一起。

"我们没有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的来源。只有伊莉莎声称自己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雌雄同体"。我们知道，她对医学书籍很感兴趣，可能就是在这些书中，她发现了这个术语及其含义。一个与性反转有关的术语，至少在其某些模式中是这样的⁷²。我们还知道，她接受的医学检查并没有证实她是雌雄同体，相反，批准了她是一个女人。

当Elisa/Mario宣布自己是雌雄同体时，她是什么意思？也许她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女同性恋的家谱。或者期待莫尼克-维蒂格的声明，"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或者在她的时代之前宣布自己是同性恋者。尽管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想使他与马塞拉的婚姻合法化。在文化中找不到掩护，他向大自然求助。

"严格来说，我们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性的层面？媒体报道的马塞拉的声明，即艾丽莎可以同时扮演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是我们掌握的少数线索之一。这些话是为了证实埃莉萨/马里奥是雌雄同体而说的，可能有一个经验基础。Elisa/Mario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变成了Maria，她拒绝与Christian Jensen完婚，这与此也不无关系。

似乎伊莉莎还与其他女人发生过关系，尽管我们不知道她是在遇到马塞拉之前还是之后："马德里报纸《Patria》转载了《El Noroeste》的一篇报道，根据该报道，伊莉莎"与拉科鲁尼亚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女士有热情的友谊，太有名了。这位女士曾经和一位"保护她的先生"一起出国旅行。有一次，伊莉莎陪着他们，但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做，因为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表现得如此强烈，不符合保护者的心意"。

"Elisa和Marcela甚至可以被平反，应用被认为适当的过滤器，由butch/femme lesbianism，或sapatão/sapatinha⁷³。为了避免不合时宜，埃莉萨/马里奥将是男装，而马塞拉是女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闻界传达给我们的对这对夫妇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女同性恋的主导性定型观念。我们不知道这种严格的角色分工是否存在于他们的亲密生活中，也就是说，最终是否像马德里部落的妓女们常说的那样，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谁在挥舞棍子⁷⁴。既然我们不知道，我，如果可以的话，愿意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如果我们在最原始的版本中理解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的话"。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他们结婚之前，邓布里亚的邻居们把埃莉萨称为埃尔文。很有可能是她捍卫了她与马塞拉形成的自由而脆弱的结合。她放在维米安佐的桌子上的左轮手枪让人毫不怀疑她的辩护的坚定性，她向马塞拉的一个追求者挑战的决斗也是如此。如果为了维护这种关系，她必须用男人来衡量自己，她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结婚必须成为一个男人，她也愿意这样做。她并不缺乏勇气。

"在埃莉萨和马塞拉的故事中，正如它被告诉我们的那样，可能有更多的性别而不是性，如果这是正确的说法的话。他们的经历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注意，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无疑是由于它所包含的性的内涵，但同时也是由于它违反了规范男性和女性的准则。当时的新闻界在头版重现的新闻潜力更多的是关于Elisa的裤子--有些人甚至提议把它们存放在博物馆里--而不是关于这两位教师的身份和性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把性和性别分开，它们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同样，当涉及到同性恋时，即使这里的对应关系是相反的："男人的灵魂在女人的身体里"是著名的"倒置"定义。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将恰恰是喜欢穿成男人的样子，这一点从案例史中可以看出，其中异装癖的案例比比皆是"。

"当卡尔-奥托-韦斯特法尔 (Karl Otto Westphal) 创造了 "相反的性感觉" 这一术语时，他是基于两个这样的经历：一个女人从小就喜欢穿男装，只对同性的人有吸引力，"而一个男人穿成女人，有不太确切的性偏好。在克拉夫特-艾宾的四个案例中--其中两个包括在恋物癖的章节中，一个是关于同性恋的--也存在某种形式的异装癖，尽管《性心理学》的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具体的病理学来区分。正是马格努斯-赫斯菲尔德在1910年提出了 "异装癖" 一词--由爱德华-卡彭特翻译成英文为 cross-dressing--来描述那些通过采用与其生理性别不相符的服饰形式来体验快乐的人。哈维洛克-埃利斯认为这个名字并不合适，因为他明白在许多情况下，相关的不是服装的采用，而是另一性别的角色，所以他提议先将这种行为描述为 "性-审美的颠倒"，后来为了避免与同性恋的联系，又将其描述为 "性爱主义"。这种说法暗指 Chevalier d'Éon (1728-1810)，他是法国最著名的易装癖者之一，他装扮成女人，代表路易十五在俄国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中充当间谍 75"。

女同性恋文学也记录了跨性别的情况，这是女同性恋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她的童年时期，由拉德克利夫-霍尔创造的 "倒置" 的斯蒂芬-戈登经常把自己伪装成纳尔逊，并且觉得自己的腿穿长裤比穿裙子舒服得多。她自己的父亲，当他看到她穿得像个女人时，有一种印象--毫无疑问，是他为了解释女儿的独特天性而阅读的精神病学书籍所促成的--这种衣服并不适合她。成年后，斯蒂芬将穿上男式西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和她的 "紧张" 的军队救护服务妇女同伴将有 "对制服的真正热情" 76。

"76 1901年，当埃莉萨和马塞拉结婚时，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当时的一些词典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伊莉莎喜欢穿成男人的样子更自然了。她的医疗记录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一位西班牙斗牛

士讲述的故事被保存了下来，这名斗牛士在两名教师被捕时正在波尔图，他向媒体宣称，大约三年前他曾在马德里Calle de Alcalá的一家咖啡馆外看到身着男装的伊丽莎。在阿科鲁尼亚，人们还说“她总是有很大的倾向于穿成男人”，她利用狂欢节的机会把裙子换成裤子。对这种做法的态度因社会阶层而异--富人显然比大众更仁慈--主角的地理来源--外国易装癖者比本国人更容易被接受，这可以帮助解释西班牙和葡萄牙媒体对Elisa和Marcela的不同看法：毕竟他们是“来自西班牙的西班牙人”--以及最重要的动机⁷⁷。

“正如Vern和Bonnie Bullough所指出的，异装癖是一个术语，用于指定不同性质的现象。为了本研究的目的，尽管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简化，但我们将仅限于区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理异装癖和社会异装癖。在第一种情况下，典型的男人，采用另一性别的服装是为了它提供的快乐，这使我们回到了所谓的性变态的多态世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妇女的特点，是为了她们希望获得的好处，这也是非常多样的”。

妇女可以采用男性的身份，以便做一切禁止她们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学习、工作、战争、旅行、写... 或获得同等报酬。或者进入禁止他们进入的竞技场。或者是为了逃避婚姻。或者是因为他们只是觉得穿男装更舒服。或者是为了挑衅，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因此，令人惊讶的不是妇女的打扮：奇怪的是，如果她们没有打扮，那就奇怪了。而且肯定还有比历史学所记录的更多的人，因为这些人最终被发现并取得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某种程度上的名人。

“鉴于鼓励“晋升”的愿望，这种做法可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合理的⁷⁸。当其动机是手持武器为祖国服务，为了在不利的情况下生存而行使男性的职业，为了与心爱的人团聚或为了培养美德时，就是这种情况，异装癖圣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故事的主人公

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要迷惑社会并证明分隔男性和女性的话语障碍的脆弱性，所需的智慧和狡猾是如此之大”。

“在艾莉莎的案例中，持续的司法和警察迫害与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的钦佩共存，后者在描述她时不遗余力，在附件九中可以看到：灵巧、果断、不寻常的智慧、狡猾、艺术和非凡的技巧是艾莉莎在这位加利西亚作家眼中的一些优点。即使是埃翁的骑士也没有把“骨灰放在卡洛女教师的额头上”。

如果异装癖与妇女之间的性关系有关，特别是如果这种关系是由婚姻决定的，那么异装癖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它失去了所有的理由，即使迷恋依然存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女性鸡奸上，如果没有其他添加剂，鸡奸的特征相当分散，难以证明，但它被异装癖出卖了。⁷⁹正是这两种现象的结合--男人的性和社会角色被篡夺，体现在三性人和后来的颠倒人的形象中--导致了犯罪化。

“对于来自阿科鲁尼亚的法官佩德罗-卡尔沃-卡米纳（Pedro Calvo y Camina）来说，就像16世纪末审判埃莱娜-德-塞斯佩德斯的托莱多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一样，决定性的指控是非法婚姻，因此他领导了简易程序，该程序“因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和埃丽莎-桑切斯-洛里加于[1901]年6月8日在该市的圣若热教区教堂缔结教规婚姻，后者冒充男人并使用马里奥这个名字”。

“与其他女性异装癖的案例一样，在这个案例中也有对传统的认识。通过把自己变成马里奥，伊莉莎知道她正在走一条别人已经走过的路。马塞拉也知道这一点，根据她对一名葡萄牙记者的采访，她在采访中为这段婚姻辩护，理由是Elisa是个雌雄同体的人，而且西班牙法律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记者认为这个解释很荒谬，但马塞拉“显然是两人中比较开明的”，她坚持说：“我读了很多她国家的法律。有一些例子表明，在同样的条件下缔结的婚姻，多年后才被发现，甚至在配

偶之一去世后才被发现。为什么他们的情况不能这样，他们在策划婚外情时一定是这样想的。

"这位医生在《加利西亚之声》的版面上匿名写道："没有男人的婚姻"，他还援引传统来解释，甚至找到了他可能的灵感来源：1901年2月28日出现在杂志《Alrededor del Mundo》上的一篇纪事，当时马里奥刚受洗不久。它的标题是"冒充男人的女人"，除其他外，还讲述了默里-霍尔的故事。他的死亡发生在几周前，这使得人们发现这个以美国为基地的苏格兰人，在政治上很活跃，先后与两个女人结婚--与第二个女人生活了20年--实际上是玛丽-安德森。"

"就她而言，伊丽莎帮助延长了异装癖的传统，这显然是会传染的。1901年7月底，当所有人都在猜测来自阿科鲁尼亚的两个女人的下落时，马德里警方决定跟踪一对夫妇，他们在凌晨时分沿着普雷西亚多街（Calle Preciados）行走，交换着无以言表的感情迹象。他们肯定注意到了一些可疑之处，因为他们着手辨认那个扮演者的人，原来他是个寡妇，为了谨慎地追踪她爱人的游踪而伪装了自己。这两个女人被带到了警察局，围观者流传着他们是"拉科鲁尼亚的著名夫妻"的谣言。报道此事的《祖国》杂志记者不想打消人们的期望，于是他问自己："是他们吗？"

"妇女之间的婚姻并不总是出于性的动机。一个女人可以假装成一个男人，并怀着欺诈的目的与另一个人结婚，就像„18世纪的几个英国女人所做的那样；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就像荷兰女人玛丽亚-范-安特卫普在1762年所做的那样，以证明她的婚姻--她作为一个假定的男人--与科内莉亚-斯瓦特伯格结婚，后者已经怀孕，因此需要一个丈夫；或者坚持一个男性的身份，这显然是恩里克塔-法贝尔在181980年与古巴人胡安娜-德莱昂结婚的主要目的。反过来，准新娘要么知道她要嫁给谁，就像马塞拉一样，要么相信她的丈夫真的是个男人，从而不知不觉地实行女同性恋，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Elisa显然没有打算欺骗Marcela，因为Marcela完全知道她要嫁给谁，正如A Coruña的法官在起诉书中强调的那样。她也没有像恩里克塔-法布尔那样诉诸于婚姻来巩固她的异装癖；相反，这里的异装癖似乎是为婚姻服务的。她是否像玛丽亚-凡-安特卫普声称的那样出于利他主义动机与科内莉亚-斯沃滕伯格结婚，还是更多的是出于女同性恋动机，还有待观察。毕竟，婚姻是宗教上和社会上合法的性关系框架，所以一个人指的是其他人。尽管古巴法院和阿科鲁尼亚法院都没有明确指责恩里克塔-法布尔和埃莉萨是女同性恋，但通过谴责或假装谴责这两段婚姻，他们同时也在谴责他们所掩盖的不正当的爱情关系。"好吧，以严格的利他主义为基调解释"没有男人的婚姻"--Elisa会同意结婚以挽救她不可分割的朋友的荣誉--呈现出几个不一致的地方。我们知道马塞拉确实怀孕了，这可能会给她的教师身份带来问题，因为教师职业，尤其是女性，必须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模范道德行为；否则她会受到纪律处分，可能导致她被解雇。但是马塞拉面临的问题有几个解决方案，而她选择的方案是所有方案中最特别和最冒险的。"假设她想生下这个孩子，她可以嫁给一个男人，要么是孩子的父亲，他显然愿意娶她，要么是另一个男人。或者她可能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就像加利西亚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那里有大量的所谓私生子。诚然，如果她这样做，她会有被谴责的风险，但如果发现没有男人，一个单身母亲总是比"没有男人的婚姻"更有理由，因为情况就是如此。事实上，在同一时间，还有一些女教师在婚外生子，也没有被开除出教师队伍⁸¹。

有一个关于利他主义的替代假说。马塞拉和伊莉莎并不满足于成为"波士顿式婚姻"。他们想组建一个具有所有必要条件的家庭，包括孩子，至少是单数。马塞拉，在行使"的时候

"她的 "心理性雌雄同体", 无论是意外, 还是故意, 并与她的朋友一起计划怀孕。她将成为一个母亲, 而变成马里奥的伊莉莎则是一个父亲。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将避免同性恋伴侣的一个限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体验到这种缺乏: 不可能有后代。孩子也会给这段婚姻带来可信度, 使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他们的证件齐全, 还有一个女儿在身边, 谁能怀疑他们正在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 他们只犯了一个错误: 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回到了邓布里亚。即使是费利佩-特里戈,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不敢这样做"。

"EPILOGUE

2008年, 《Elisa e Marcela》出版。《Alén dos homes》及其在2010年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后, 在书面和视听媒体, 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尽管没有像我们两个女人的冒险在她们那个时代引起的兴趣那么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家报》, 2008年12月12日, 曼努埃尔-里瓦斯在其加利西亚版面--现在已经消失了--发表了一篇题为 "A máis extraordinaria historia de amor" (最特别的爱情故事) 的文章。应Libros del Silencio的创始人冈萨罗-卡内多 (Gonzalo Canedo) 的要

求，这段文字将成为西班牙版的序言，生活中他几乎没有时间发展他的出版项目。

当Libros del Silencio版本出现时，上述报纸专门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作者是Cristóbal Ramírez，于2010年3月14日在El País Semanal发表。该书的读者之一是伊莎贝尔-科塞特（Isabel Coixet），她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急忙阅读该书，并承诺将拍摄一部电影。"虽然这个项目花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艾丽莎和马塞拉的故事的电影版正在拍摄，将于2019年上映。同时，他们值得作为2011年A Coruña Visible节的一部分举办展览，他们的生活在2017年被A Panadaria团体带到了剧院，A Coruña市议会在2018年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他们的轨迹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特别是LGTBI集体。"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则为他们保留了一个日子，即6月9日--记得他们的婚礼是在1901年6月8日举行的--在那个名为Los hijos de los días的特殊日历中，并将他们遭受的迫害与阿根廷关于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辩论联系起来。

他们的敌人发起了上帝对地狱婚礼的战争，但该项目克服了障碍，沿着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直到[2010]年7月15日，阿根廷成为第一个承认所有人在性多样性的彩虹中完全平等的拉丁美洲国家。

这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伪善的一次失败，它邀请我们以服从为生，以谎言为死，这也是对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一次失败，它改变了它的名字，但总是有火的木材。

"加莱亚诺在我们离开的地方告别了埃莉萨和马塞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逃犯的踪迹消失了。"82 在《Alén dos homes》出版十年后，

我们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然而，我想说的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填补他们被截断的传记中的空白，更不是要解开他们生活中的谜团。前者可以实现，至少部分可以实现，尽管需要进行漫长的调查，而后者则是虚构的，我也不确定它是否可取。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掌握的新事实，而这些事实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Cristóbal Ramírez报告的读者之一Juan Carlos Miranda García与El País联系，说他有关于这个故事的新信息。报纸通知了冈萨罗-卡内多，而冈萨罗-卡内多又向我转达了关于艾莉莎的“噩耗”--这是他的话--。来电者正在研究他的祖父拉蒙-加西亚-图埃罗（Ramón García Tuero）的历史，他在研究中发现，在这位著名的吹笛人的遗产中，有一份1909年4月29日的马德里杂志《新世界》（Nuevo Mundo）的副本。它包括“没有男人的婚姻”的照片，并附有以下说明：“前段时间媒体大肆渲染的著名的'Casadas de la Coruña'，著名的卡门-桑切斯，在我们的照片中装扮成男人，最近在韦拉克鲁斯“从船上”投海自杀了83。新世界》杂志在1901年以这对著名夫妇的照片为广告，在两天内卖出了三个版本；我们不知道八年后以同样的呼吁所记录的销售情况，尽管它们肯定会更温和。

“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没有男人的婚姻”的新情节。一些报纸，如ABC--根据马德里Cómico的说法，同样的报纸，在Nuevo Mundo之前就实行了“衰减的笑话”。在其4月24日的版本中，标题为“El matrimonio de la Coruña. La boda de dos mujeres”（两个女人的婚姻），它呼应了墨西哥报纸上发表的内容，它总结如下。埃莉萨-卡门-桑切斯为了与她的朋友康苏埃洛-格拉西亚（Marcela）结婚而采用了一个男性身份，“她怀孕并被未婚夫遗弃，目的是为了 avoid 母亲的耻辱并为未来的后代提供一个父亲，这很光荣。一旦骗局被发现，他们就被迫逃离司法，选择墨西哥作为他们的目的地。在那里，康苏埃洛做奶妈，而伊莉莎在一个爱尔兰农民家里找到了管家的工作，这个农民爱上了她，让她

成为他的妻子，尽管他很快就告发了她，"由于怀疑，使得法医必须介入"。果不其然，被告发的妇女"乘上了一艘汽船，在看到韦拉克鲁斯时，由于担心踏上陆地后会被抓获，她自杀了，把自己行为的秘密埋在了海底"。由于在她存放珠宝的公文包中发现了文件和信件，她的身份可以被确认。同样来自马德里的报纸El Globo在第二天转载了同样的信息，几乎用了同样的话，最后对没有说到康苏拉的下落表示遗憾："让我们等待发现她未来生活中的任何新事件"。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逃犯被安置在墨西哥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尤其是《加利西亚之声》和《庞特韦德拉日报》等报纸，在他们那个年代曾详细描述过他们在阿根廷首都的冒险。后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提供现有信息，而是借助其一位编辑的想象力来填补空白，调整数据，使故事变得生动。在这个版本中，自杀的动机似乎是伊莉莎对与朋友的新分离感到悲伤。这就是为什么"她登上了一艘远洋轮船，绝望、疯狂、灵魂受伤，她把自己交给了大海的愤怒，被埋葬在泡沫的波涛之下。这是一个故事，两个生命的美丽而可怕的故事，他们融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输血，在一个最美丽的无私奉献、感情和毅力的表达中结晶"⁸⁴。

"这个消息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不一致之处。主要的问题在于事件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克里斯蒂安-詹森和玛丽亚-桑切斯--请记住这是伊莉莎在阿根廷对自己的称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是在墨西哥相遇并结婚：我们有一份结婚证书的副本。第二条是指"所谓的自杀动机，不可能是Elisa害怕在踏入韦拉克鲁斯时被逮捕，因为负责解决Jensen提出的申诉的法官决定驳回该案。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马德里的外交部档案馆和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总局档案馆进行了一些查询--在我的遐想中，存放在某个墨西哥档案馆里的艾丽莎保存信件的公文包

不时出现。咨询很简短，主要集中在西班牙驻韦拉克鲁斯领事馆产生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中，我没有设法找到与可能的自杀有关的任何信息。

"如果说1901年媒体报道了"没有男人的婚姻"，1902年报道了马塞拉女儿的出生，1904年报道了两个女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逗留，1909年报道了伊莉莎的所谓自杀，那么后者在1915年重新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我最近利用数字报纸档案提供的设施，得以证实这一点。她这次出名的原因是克里斯蒂安-詹森去世时没有立下遗嘱，因此他的遗产，估计有14,000比索，归他妻子所有。这是《加利西亚之声》1915年1月8日的头条新闻。

没有男人的婚姻

即使是伊丽莎-马里奥的婚姻

继承14,000杜罗的遗产"。

"首先，读者的记忆被重新激活，提醒他们这条新闻与1901年著名的婚礼有关--现在被描述为"惊人的和褻渎的"，依次为--其庆祝活动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并成为几个月来戏谑和辛辣谈话的主题。从这一点上看，该编年史非常混乱，我们将尝试通过括号来澄清其真正的参考。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牧师，现已去世（Victor Cortiella），曾与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英勇青年"（Mario）和"玛丽亚-卡门-桑切斯"（Marcela）结婚；由"伊丽莎和马里奥"[原文如此]组成的夫妇已移民到阿根廷，在那里的分歧导致他们分离，随后"玛丽亚-卡门-桑切斯"（伊丽莎）与一个男人结婚，"这次是真正有效"。这个人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安-彭森（Jensen），人们对他的出身有疑问，但他可能是瑞士人。这场婚姻发生在大约五年前，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听到主角们

的消息，记者对此表示遗憾，尤其是关于“艾丽莎，征服者，穿裤子的那个”。

“直到昨天，即1月7日星期四，”纪事的作者继续说，“一个来自阿科鲁尼亚、担任‘权威’职务的人，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根廷首都的亲戚的信。他在信中得知，第二次婚姻也以分居告终，尽管具有“友好的性质”，而且克里斯蒂安-延森于190985年去世--顺便说一下，这一年与我们的女主人公所谓的自杀相吻合--死于„遗嘱和无继承人。”

果然，他的财产似乎属于寡妇，或者如果不是这样，属于寡妇的亲戚。但这位寡妇不知所踪，据阿根廷线人说，有人正在安排保管这14,000比索，所以他要求提醒她在阿科鲁尼亚市可能有的任何亲属。收信人做了一些调查，例如访问了位于Calle del Mercado的“Carmen”母亲的故居，但那里没有人可以给他任何关于她下落的消息--在这条街上住着Marcela一家，我们已经知道，她在阿根廷采用了Carmen这个名字。当这些尝试都不成功时，就请媒体帮忙了。

“住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Elisa的母亲急忙写信给报纸的编辑，告知他遗产不属于María Carmen Sánchez，而是属于María Elisa Carmen Sánchez。这封信是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日期是1月9日，第二天就被公布了。

尊敬的先生：在阅读本月8日的贵报时，我看到一则继承广告，由于我的女儿玛丽亚-伊丽莎-卡门-桑切斯的下落不明，无论如何查询，都在寻找她的父母和最亲近的人，为此刊登了该广告。因为我是上述伊莉莎的母亲，我想请你帮个忙，把你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所有细节告诉我，由于我缺乏经济来源，我不能如愿以偿地亲自来和你谈。

“为了保证得到您的关注，我重申您的意见，并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MARIA LORIGA

John Dodds的寡妇

其他报纸转载了《加利西亚之声》发表的内容。El Diario de Pontevedra在其1月11日的版本中也这样说。由于没有更多的报道，13日，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些本土的信息，尽管有点旧："。

"小说的章节

没有男人的婚姻

马里奥的自杀

编年史的作者准备叙述"真实事实的新篇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著名的马里奥-伊利莎夫妇"[原文如此]离婚后，他说："伊利莎留在阿根廷，马里奥去了墨西哥"[原文如此]。显然，伊莉莎的多才多艺，她可以与自己结婚和离婚，同时留下和离开。自杀的日期是1911年--之前这家报纸把它放在1909年--具体是11月10日或12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11日被排除在怀疑之外--并且没有放过任何有关情况的细节：这艘汽船属于墨西哥航行公司，名为塔巴斯科，从坦皮科到韦拉克鲁斯，其船长是海梅-奥茨。他做了"一切人类可能的事情来拯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但是.....她想"死"，几天后她的尸体出现在图斯潘酒吧旁边。该记者承认，这不是要处理的问题，而是继承问题，这对伊莉莎和马里奥都没有影响，而是"卡门-桑切斯，作为伊莉莎出现的人"[原文如此]。但这件事很让人好奇，因为它涉及到"无主婚姻"的两个主角之一。人们怎么能相信媒体呢？

El Noroeste在La Voz de Galicia报道此案后的一天，在Elisa母亲的信被发表之前，非常简短地处理了此案。它的信息也很混乱，因为它似乎把继承权归于马塞拉而不是艾丽莎。但我们特别想强调的是，这位所谓的女继承人"在美国继续与她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她的朋友马

里奥甜蜜相伴”。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消息--在这个场合，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我们的两个女人将设法在阿根廷的土地上恢复她们的同居生活”。

2015年3月25日，一位阿根廷女士（我们称之为María⁸⁶）与我联系，向我询问Elisa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伊莉莎阿姨代表着“勇气”和“反叛”，这在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中是罕见或不常见的。

玛丽亚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大约7岁时--她出生于1934年3月29日--在她祖父的家里遇到了伊莉莎，她祖父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桑托斯-卢加雷斯。所以大约是在1941年，伊莉莎躺在床上，患有癌症，很快就结束了她的生命，可能是在1941年至1943年之间。尽管如此，她仍有力量与女孩交谈，并问她是否有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她“照顾好你的朋友，因为她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之一”。可以认为，在说出这样的话时，他想到的是他心爱的马塞拉。

“她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克里斯蒂娜通过她的父亲，即卡里尔（Vilagarcía de Arousa）人Adolfo Sánchez Pedrosa（1875-1949）的儿子，听说了“Elisa姑妈”的事。这是一个有缺口的家庭记忆，有奇怪的扭曲--就像其他记忆一样--也是带着某些保留意见传下来的。María说，家人对Elisa的一些冒险经历并不特别自豪，所以“他们试图抹掉它们”。无论如何，她提供给我们的通过她母亲和她祖父得到的信息，我认为是相关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在埃利萨和另一位来自阿科鲁尼亚的杰出女性之间建立的联系：“埃利萨在帕尔多-巴赞伯爵夫人的指导下，去费罗尔教书。我们知道她在1879年完成了学业，有可能她在被阿科鲁尼亚的师范学校聘用之前曾从事过私人教学工作，从事行政或服务职能。然而，我们对她与多娜-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Doña Emilia Pardo Bazán）的可能关系一无所知，尽管我们一直觉得后者将她称为“卡洛的老师”，而她“只在这个镇上当过几个月的老师”。配得上“卡洛

的老师"这个称号的是马塞拉，如果有的话，她几乎有七年的时间，几乎总是由她不可分离的朋友陪伴。这一表述，加上附件九中转载的文章中对她的高度赞扬，可以证明对所提到的人有一定的了解。我认识到这只是一种忽悠，但我们将其归结为玛丽亚的祖父和曾祖父，认为他们会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建立毫无根据的联系，也是一种巨大的想象力。

„流传下来的关于婚姻存在理由的说法有一些奇怪之处，尽管主要是与前几页转载的说法相吻合。在请求并获得其朋友的批准后，马塞拉与一名男子发生了暧昧关系。结果，新娘怀孕了，但新郎拒绝娶她。伊莉莎觉得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因为她同意订婚，于是与新郎对峙，"手拿刀威胁要阉了他"。威胁是没有用的，因为被威胁的人已经结婚了。"看到他不可能承担自己的责任，伊莉莎决定给孩子一个姓氏，冒充死去的哥哥的身份，并与她的朋友结婚。

结婚的庆祝活动在阿根廷的家庭版本中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英雄主义。牧师认定马里奥是'伊莉莎的魔鬼'，所以她'用手中的枪强迫他与他们结婚'。他们一结婚，就去了维哥，在那里踏上了前往哈瓦那的旅程。这艘船被当局拦下，这两个女人被关进了监狱，但伊莉莎的母亲设法让摄政王赦免了她们。最后，他们选择移民到阿根廷。

2018年6月3日，我的电脑上收到了另一封来自阿根廷的邮件。这封信上有诺玛-格拉西拉-穆雷的签名，还包括一张马塞拉-卡门-格拉西亚的照片，这是来自阿科鲁尼亚的曼努埃尔-洛佩斯-卡奥的作品，他的摄影工作室位于圣安德烈斯街13号，几乎就在何塞-塞利耶的工作室旁边。第二天，塞利耶的另一幅画像，可能是马塞拉的母亲和祖母的画像，以及诺玛和她母亲的出生证明的复印件，完成了这次派遣87"。

"我们的举报人的母亲叫奥罗拉，她于1925年6月4日出生在布卡多（科尔多瓦省的罗卡将军）。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出生后几天就死了，她的名字是马塞拉。她是曼努埃尔-萨福雷斯和玛丽亚-恩里克塔-桑切斯的女儿，前者38岁，阿根廷国籍，后者23岁，西班牙国籍。她的外公外婆是阿道夫-桑切斯和马塞拉-卡门-格拉西亚。

马塞拉-卡门-格拉西亚是我们的马塞拉-格拉西亚-伊贝斯。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而在我们的故事中，疑问的副词层出不穷，那么上述的照片就消除了疑问。这样看来，这位来自邓布里亚的老师嫁给了一个叫阿道夫-桑切斯的人。

"玛丽亚-恩里克塔-桑切斯（María Enriqueta Sánchez）很可能是1902年主显节之夜在葡萄牙出生的那个"漂亮而坚强"的女孩。由于诺玛的研究，我们知道她于1902年9月24日从加的斯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那是船离开的港口--在"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号船上；她的国籍是西班牙，据说她当时只有一岁大。陪同她的是卡门-诺亚，"28岁，同一国籍，寡妇，家庭主妇，天主教徒。令人惊讶的是，她没有母亲陪同，尽管有可能马塞拉采用了卡门-诺亚的身份--伊莉莎的外祖母出生在里安克索，叫弗朗西斯卡-诺亚--以便办理允许她移民的手续。在拉丁美洲移民研究中心的搜索引擎中，没有对应于卡门或马塞拉-格拉西亚的条目，而葡萄牙当局在上面转载的电报中记录的她的登船日期与卡门-诺亚的日期一致，这可以支持这种可能性。我们还知道，马塞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采用了卡门这个名字。总而言之，我们所掌握的论据很差，需要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才能更有说服力。

尽管如此，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关于马塞拉女儿的信息，当媒体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时，几乎都会向我询问她。En „riqueta结了婚，生了十个孩子，在1943年左右由于不确定的原因离开了她的家庭--如果我们之前的来电者提供的信息属实的话，这个日期与伊莉莎的死亡日期很接

近--关于她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也没有保存任何可以让我们重建她的传记的文件，因为有人让所有提到她的文件都消失了。

马塞拉的母亲和祖母的形象由何塞-塞利耶扮演。照片由她的曾曾孙女诺玛-格拉谢拉-穆雷借出。

当诺玛还是个孩子时，她的母亲奥罗拉经常和她谈起她的祖母恩里克塔和曾祖母马塞拉。对于前者，她告诉她，她出生在阿科鲁尼亚，对于后者，她来自旧卡斯蒂利亚--正如她一样，因为她出生在布尔戈斯--并且被迫逃离西班牙。他还告诉她，这个家族与葡萄牙宫廷有关，这个信息可能来自于阅读一些葡萄牙报刊的副本，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些副本可能是恩里克塔保存的文件中的一部分，后来被销毁。

"马塞拉嫁给阿道夫-桑切斯是谁？我们同意称为玛丽亚的那位阿根廷女士的曾祖父就叫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他与伊莉莎有关系，他把伊莉莎带到他在桑托斯-卢加雷斯的家中，他与一个女人再婚--我们知道她的身份--并在1909年与她生了一个儿子。由于诺玛的研究，我们现在还知道，1882年，一个叫阿道夫-桑切斯-佩德罗萨的7岁男孩住在阿科鲁尼亚A Mariña街24号的一楼，由28岁的多洛雷斯-佩德罗萨陪伴，她很可能是他的母亲。两人都是卡里尔的本地人，他们在那里有惯常的住所，并在阿科鲁尼亚市住了一年，与胡安-多德、玛丽亚-洛里加-兰代拉和埃莉萨-桑切斯-洛里加组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这是否就是那个将与马塞拉初婚并承担恩里奎塔的父亲"阿道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提供经验性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阿道夫-桑切斯-佩德罗萨的第一次婚姻一定是在1909年之前发生的，而且在这之前，他要么已经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他的情况下是马塞拉--分居，要么她已经去世"。

"但这并不是唯一出现在我们故事中的阿道夫，因为伊丽莎的哥哥叫阿道夫-桑切斯-洛里加。他出生于1855年，根据诺玛找到的1887年的数据，他是个鳏夫，住在阿科鲁尼亚艾利斯门广场7号的一楼，身边有他的妹妹--伊莉莎说她比实际年龄小三岁--、他的母亲玛丽亚-洛里加-德-多兹和她的丈夫胡安-多兹。这是否就是那个与马塞拉结婚的阿道夫-桑切斯？再一次，不仅缺乏证据，而且没有什么线索，尽管有一条：诺玛的母亲总是用桑切斯-洛里加这个姓氏来称呼恩里克塔。事实上，诺玛自己通过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输入她祖母的名字和这两个姓氏，找到了艾丽莎和马塞拉的故事。

"无论如何，不管这个阿道夫-桑切斯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与恩里克塔有关的是伊丽莎的姓氏，而不是马塞拉的姓氏。此外，我们对这场婚姻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无所知，对其性质、范围和动机也一无所知。这可能只是为了登记恩里克塔的存在而对桑切斯这个姓氏的一种让渡或挪用。

甚至还可能有另一种可能性。这个假设有些鲁莽，但并不比在这些页面中陪伴我们的两位女性赋予生命的一些项目更鲁莽。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第一位阿根廷通讯员玛丽亚的话："看到这个[与马塞拉在邓布里亚有关系的男人]不可能承担他的责任，伊丽莎决定给孩子一个姓氏，以死去的兄弟的身份与他的朋友结婚。在这个故事中，会不会有两段婚姻被混为一谈，即马里奥和马塞拉的婚姻以及阿道夫和马塞拉的婚姻？伊莉莎会不会采用她哥哥阿道夫的身份与马塞拉再婚，从而重新确认"没有男人的婚姻"？"